

中國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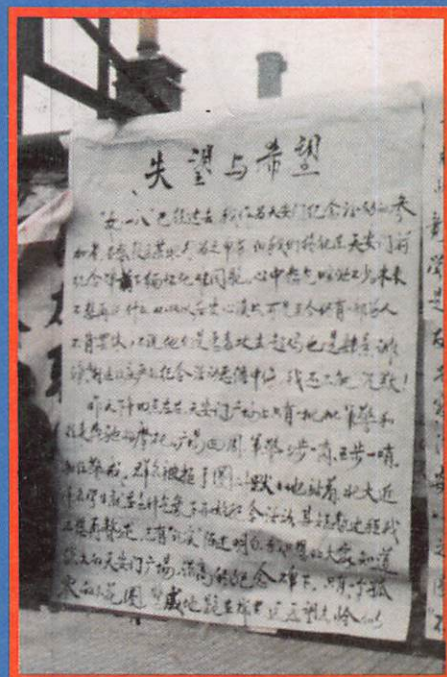


CHINA SPRING

No. 40 OCT. 1986

軍委會議惹怒鄧小平 趙紫陽放收之謎

傅申奇獲釋 · 李鵬政策禍延洋人



中國民主思想搖籃北大(左)及北大去年九一八民運大字報(右)

10月號

總40期

1986

寶貴文獻

北大年九一八民運資料運海外

- 獨家專訪 / 莫靈平教授談中國留學及教育政策
- 獨家發表震撼全俄的蘇聯異見者告全國同胞書

有獎徵集大陸留學生新通訊錄

自九月起，新學期開始了。各校迎來了新出國的同學，並將編輯新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訊錄。本刊特有獎徵集這些新通訊錄，以利於與各校留學生們的交流。如有可能，本刊將嘗試編纂全美、全日、全歐、全澳中國大陸同學總通訊錄。

▲凡寄本校全套的新通訊錄者，本刊贈寄過去十二期中國之春，並將贈閱中春二年；

▲提供不了全套通訊錄也無妨，凡提供十名以上大陸留學生通訊處者（寫出姓名和院系），獲贈未來一年及過去六期中春；五名以上者，獲贈閱中春一年。

▲本刊尚缺乏下列中國大陸留學生較多的大學的整套大陸同學通訊錄：耶魯，康乃爾，俄亥俄州大和俄亥俄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西北大學，喬治城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等，這些學校為急徵之列。此外，美國五十個州，各州至少有兩所重要學府——州大和州立大（如堪薩斯州有堪薩斯大學和堪薩斯州立大學），這些學校的新通訊錄，以及哈佛等各名牌學府的新通訊錄，本刊都非常需要。

▲日本、澳洲、歐洲各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通訊錄，均請寄至中國之春雜誌美洲編輯部。

感謝您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援！

萬里講了是真理 徐文立講了進監獄

中共準備進行政治改革的輿論正扶搖直上。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七月卅一日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讀着萬里的講話，大有似曾相識之感。翻開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時期的各種民運刊物，與萬里的講話進行對照，我們發現：萬里今天所倡導的，正是民運人士數年前一再主張的。

讓我們試舉徐文立主辦的「四五論壇」和他在「一九八四年於獄中寫的「我的申辯」為例，與萬里的講話做一番對照。

關於決策的監督

徐文立在「我的申辯」中指出：「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教訓，我認為都是社會對執政黨缺少有效的群眾監督，因而重大決策上的錯誤不可能及時發現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致給無產階級事業帶來重大損失。『四人幫』倒台之後，這類問題仍未解決。」

萬里則說：「我們至今仍然沒有建立起一整套嚴格的決策制度和決策程序……，決策的科學性無從檢驗，決策的失誤難以受到及時有效的監督。直到今天，領導人憑經驗拍腦袋決策的作法仍司空見慣，暢通無阻。」

關於科學與民主

徐文立主編的「四五論壇」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卅日印發的「元旦特刊」中，曾發表評論員文章「民主與科學」，指出：「以往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沒有民主是不會有科學的，同樣，沒有科學也是不會有民主的！」

萬里則說：「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裏，科學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沒有民主，談不到真正發展科學。沒有科學，也無從建立真正的民主。」

關於馬克思主義

徐文立在一九八〇年下半年，曾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庚申改革建議書」，「建議黨中央公開宣佈，在確立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不搞獨尊，而提倡『博採衆家』，廣泛地學習全人類一切先進的思想和成果。」徐文立還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是科學。」

萬里則主張：「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不是聖經，而是行動的指南，它本身也是在不斷發展和豐富的。決不能在維護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借口下，把當代人類創造的許多新理論、新成果當作『糖衣砲彈』、異端學說拒之門外……」。

關於言論自由

徐文立主編的「四五論壇」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五日出版的第六期上，發表了「要言者無罪」一文，指出：「在我國社會的現實中却經常地、大量地出現『言者有罪』……這種『言論獄』必須結束！」

萬里則認為：「過去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正確的，但還有點消極。積極的說法應該是：『言者有功』，『聞者受益』。」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對照例子，但上述幾例已足以說明問題。

對比之後，我們欣慰地感到：民運先驅們的思想，已逐漸影響中共高層改革派的觀念。

欣慰之餘，我們也感到萬分遺憾：就在萬里在講台上發表上述激昂的講話、提倡言論自由的時候，幾年前因發表過類似言論而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徐文立，正在無窗的單身鐵牢之中受到非人的虐待。而且，徐文立近來又因言論「罪」——在海外發表「我的申辯」，被加重懲罰，連其妻女探監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前些日子，徐文立的女兒小瑾因要動大手術請求見父一面，竟遭到官方無情的拒絕。

獨裁專制的一條基本特徵是：「只准我講，不許你說！」「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翻翻毛澤東的一些著作，也能找出不少開明理性的言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要保護少數」、「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而且被實踐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等等都是毛澤東的口頭禪。然而，毛澤東是不准別人（當然包括萬里）講這些話的。在毛澤東、四人幫統治時期，萬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不但沒有講話的權利，連做人的尊嚴都給剝奪了。想想自己被打成牛鬼蛇神而在牛棚度過的時光，溫習一下徐文立的著述，萬里難道不應該有所良心發現嗎？為什麼萬里講的就是真理，而徐文立講了同樣的話就要進監獄呢？

另外，就在上層提倡自由民主的時候，北京大學的二名歷史系學生張曉輝和李毅安因撰文批評中共領導，而遭受逮捕和秘密審判。這種言行矛盾，何以自圓其說？

我們願向改革派獻上諍言，現在是少說多做的時候。想一想，倘若人民日報在一個角落裏刊登一小條消息——無罪釋放徐文立，要比整版整版刊登萬里的講話，更能爭取人心吧！

九月份，中共要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研究政治改革。海內外都在期待着中共改革派的具體行動。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六年十月號總四十期·九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六年十月號總四十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3 ■萬里說了是真理，徐文立說了進監獄

●讀者●作者●編者

6 ■劃入罪犯·等 (西德)黃鳳祝 魏長弓等

特輯

紀念北大九·一八民主運動一周年

9 ■北大學生的正氣歌 (中國大陸留學生·本刊責任編輯)楊漫克

10 ■北京大學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大字報選 (本刊資料室)

●留學生新移民服務台●

36 ■關於H簽證的幾點說明 (中國大陸留學生)魏中民

特別專題 經濟改革如何打破惡性循環

19 ■如何打破「放—亂—怕—收—死」的惡性循環

——從經濟改革到政治和意識形態改革 (中國民聯)王炳章

28 ■突破經濟改革瓶頸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譚家琦

32 ■為什麼中共的改革停滯不前?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高揚

37 ■三論官商 (國內)張靜

39 ■權力價值之演變 (國內)肖平

41 ■關於「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中國旅歐經濟學家)雷萬蝶

●特稿●

45 ■就蘇聯現狀告全國同胞書 蘇聯(社會主義復興運動)

50 ■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上) (政論家·香港)李玉

●人物專訪●

57 ■專訪莫靈平教授：談中國大陸教育及留學生政策 (本刊記者)楊漫克

●民運策略●

61 ■中國社會與中國民主 (中國大陸留學生)李草葉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62 ■軍委會議惹怒鄧小平 (北京)柳平

編者的話

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已經發現，中國領導人正在經濟領域進行若干新的嘗試，如：發行股票；允許企業破產；用合同工制代替終身工制；試建獨立的社會保險制度；……等等。為什麼改革派已從物價改革轉向？為什麼改革派最近大造政治改革的輿論？怎樣才能打破經濟改革的惡性循環？本期王炳章、譚家琦和高揚的文章，有助於您解答這些問題。

本刊刊登有重要價值的獨家資料：（一）北大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的第一手資料——大字報選編，已轉到本刊。值運動一周年之際，予以發表。（二）最近蘇聯要求改革的人士在國內廣泛散發了一份「告全國同胞書」，內容具有震撼性，本刊獨家譯出。

上期出了一差錯：西德著名漢學家馬漢茂教授的報導稿已排上目錄，但其文章在最後調版時漏掉了。我們已向馬教授致歉，並於本期補上。

下期預告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最近公開提倡多元觀念，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進展。中國之春運動從一開始就倡導多元。然而，現代的多元觀念是什麼，對當今中國社會的轉型有何指導意義？本刊下期推出專題，詳加討論。

中國民聯成員黃奔先生最近訪問大陸歸來，感觸極深。本刊對他的採訪，頗具啟發性。

連續專題 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二）

64 ■ 評毛是為了前進！

——評「我對評價毛澤東的看法」

（中國大陸新移民）嚴瑛

68 ■ 「史學三權威」與毛澤東

（美洲）柯奇

74 ■ 毛澤東長短論

（中國大陸留學生）袁大戈

國內快訊·時評

79 ■ 從柏恩斯事件看中國開放政策

（中國大陸留學生）朝開騰

87 ■ 是高爾夫球場、還是新租界？

（國內）林小玲

報導

31 ■ 國際中國文學討論會記

（西德）馬漢茂

82 ■ 國際性中國現代文學會議在西德召開

（西德）棋語

民運報導

78 ■ 上海民運領袖傅申奇獲釋

（國內·上海）顏君厲

台灣專欄

84 ■ 矯枉不要過正

（台灣旅美作家）劉添財

85 ■ 談國民黨海外遴選立監委

（美國）李目

86 ■ 曙光漸露，解「嚴」在望

（台灣旅美研究生）凌天鳳

文藝園地

88 ■ 小說「浪淘沙」及作者江文（訪問記）

（中國大陸新移民）卓璞

81 ■ 詩的欣賞學（詩）

（中國大陸詩人）嵐之凝

89 ■ 詩兩首

（國內）林島

56 ■ 冰上的夢（詩）

（中國大陸詩人）嵐之凝

44 ■ 夢魘（雜文）

（國內）孤子

90 ■ 不再偉大的會見（獨幕狂想劇）

（中國大陸旅美作家）江文

98 ■ 祖國我希望（詩）

（中國大陸作家·西德）遇羅錦

封面

●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左）和去年九·一八大字報（右）

劃入罪犯

讀了貴刊七月號永斌的文章，很有感觸。我們也是李鵬不准陪讀的受害者，不禁要借貴刊說幾句心中話，以表心中的怨和恨。自從李鵬的留學政策下來後，我們有妻小在國內並在申請陪讀的，十分氣憤，因為這等於宣佈從現在起我們留學生今後只能過光棍生活。（嫖妓女，與其他異性同居另當別論，不屬禁止之列）留學生配偶子女在一夜之間劃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法中不能出國的罪犯類了。

那些自稱關心留學生的領事館官員，那些像父母掛心在外兒女一樣的官方刊物（見留美通訊第十一期），却不但不為我們講句公道話，反而成了政策的擁護者。有時，只有貴刊能站出來為我們講句公道話，佩服！這一下就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老實講，過去我們對貴刊了解不夠，並有很多成見，現在總算明白了。究竟誰是我們留學生的朋友！

這裏的台灣學生說：「你們大陸留學生真可憐囉，夫妻活活拆開，這就是共產嘛？過去我們還以為現在大陸比台灣開明了，現在看來，大陸政府連自己的留學生也不相信，把老婆

當人質，何況對我們台灣人。台灣也有人一天到晚叫人才外流，但蔣經國還沒幹出這種不人道的事來，看來大陸政府比蔣經國還不如。」

這裏美國師生、美國人民的不可理解、失望和對中國留學生的同情則更多了。他們說：「到美國學習的外國學生都可以帶配偶，只有中國政府作出如此不人道的規定，太不可理解了，這不像一個泱泱大國的風度。」

我們認識的一個老華僑嘆息道：「歷代中國政府也派出留學生，都沒有如此的規定，現在共產黨幹得出，要不是看報真不敢相信，如這樣下去，中國無前途可言。」

中國大陸留學生 衆雅口等

惡劣的國際影響

我對中共縮緊留學生政策有如下看法：

(1) 公派研究生的名額分配到用人單位，只會助長走後門，隨之產生一系列弊端，像王寬誠貸款那樣的全國統考才能選拔出真正的人才。

(2) 在不具備相當的指導教授、科研設備、信息資料以及學術競爭氣氛的情況下，一味強調並強迫留學生回國做「博士後」研究，只會卡斷科研的延續和進度，使留學生的系統訓練半途而廢，誤人子弟，扼殺人才，還浪費了美國校方及教授們的多年心血。

(3) 取消伴讀是一種極為愚昧專制的手段，這種不人道的做法，是對留學生及其家屬人權的公然踐踏，不僅會影響留學生及其家屬的學習和工作，而且會造成惡劣的國際影響。望「中國之春」積極向中共中央及各界呼籲，阻止這一做法的實施。

大陸留學生 魏長弓於日本

何不統戰民聯？

我是剛出國的一位研究生。

在大陸上最初聽到「中國之春」是去年年底左右聽一次傳達文件——關於台灣方面編的「中國之春」在紐約的一次活動，按語則是「中國之春」及王炳章係台灣操縱」等等。第二次是出國集訓時，教委一處長訓話：「出國後不與中國之春來往，王炳章此人很壞。」所以，來加後就注意找「中國之春」。

看了你們的雜誌，使我很感動，中國還有這樣好的熱血青年，而在大陸上時，則感到一點希望都沒有。當然，中國的民主之路還很長，我並不是很關心政治的（在大陸上），但也有些簡單的想法。對台灣與香港，由於多年來中共封鎖與歪曲真實情況，我不敢說有多大了解。但對中共的殘暴與腐敗，却有切身的體會。這並不是說周圍的黨員個個青面獠牙，腐化墮落，而是整個制度與機構，已將人性中美好的東西貶到最低，將謊言與虛偽視為常規，將中華民族置於可悲的境地。你們的雜誌，總的觀點是支持國內的改革進步力量，反對保守勢力，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恰當。儘管如此，你們仍然不能為中共所容忍，反說你們受台灣操縱等等。其實中共嘴上不是成天唱著要與台灣統戰嗎？既然你們是台灣操縱的，為什麼不統戰一下呢？虛偽啊！謊言啊！我最厭惡中共的一點就是騙人，口是心非，言而無信。沒有在中共統治下做過多年老百姓的人是難以體會的，所以，出來以後看到一些外報的報紙，接觸一些留學生，感到有許多人對中共的本性還是缺乏深刻的了解。

一位大陸留學生於歐洲

香港人民不再冷漠

你好，我是香港的讀者。也許你們身在美國，所以只知長江三峽工程計劃進展表現中國政治動態，而不知大亞灣核電廠影響更大！

原因是自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件發生後，香港反核呼聲高漲，各壓力團體，組成了「各界關注大亞灣核電廠計劃委員會」，並發起全市性簽名運動，已收集有超過百萬的簽名，準備呈交給北京當局，足見香港人民已因核電事件，開始進一步的政治覺醒。

我認爲這一事件充分反映香港人對前途關注。核電計劃的目的本爲安撫人心，現在反而使香港更恐懼中國政府。政府內部討論，亦趨於分歧，表現香港更趨多元化，而反對的議員多是民選議員（香港議會制度特殊，同時存有官守，委任非官守，間接民選；在「立法局」和「行政局」下有「區議會」，有直接民選議員，可被視爲由殖民過渡到本地民主化的中間形態）。同時，香港人的「胡士托精神」亦開始成長，流行歌星大聲疾呼關心社會和香港前途，聯聲高歌和平，更舉行一九八六國際和平年音樂會，幾萬張門票在三小時內售清！雖不是以反核爲主題，但宣揚和平中已多少隱含對「核」的恐怖感；而這次收益全捐給香港紅十字會，足見香港人，尤其年輕人已不太像以往般對藝術和公益事業冷漠。

我認爲現民聯不應只搞高度專業化的政經理論和運動，而應走到廣大民衆中；尤其香港人民，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一方面政治知識極少又不夠關心，另一方面富熱情且比老一輩人更反對專制政治；如何指導和組織這強大的力量是決定香港乃至全中國幾十年內發展的極重要因素。對全球將意義深遠。

琳姆於香港

水載舟之理？

最近在中國之春第卅七期上看到黃鳳祝先生「對遇羅錦政治庇護的進一步答客問」一文中，對其中所借用的舟浮於水上，是水之力還是舟之力這個哲理性的問題，提出我的一點見解。

我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去年才從中國大陸移民加拿大，對中共的政制可謂「受益不淺」，毫無疑問，舟浮於水上靠水力，這是個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這個事實確是不能套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們的身上的。試問，憑一句「您辦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就能旋即步入青雲，雄踞在十億人民之上，這是水之力還是舟之力呢？又試問第二、三梯隊的接班模式，又何來水載舟之理呢？

如果中共的領導人是由民主投票選舉產生的話，舟浮於水這個道理還可引用。而事實却是恰恰相反，中共的一黨專制，何容得民主選舉，他們只懂爲自己宣傳：「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大陸如果想謀得一官半職，那是需要相當的努力的，這種努力來自巴結上級，拉關係、送禮、……；如果要當上某某地方之官的話，則萬事大吉。因爲做官的只有升而沒有降，倘若在這個地方幹不出成績或犯了某些錯誤，調到另一個地方繼續當其官去也。這是和本身的「努力」所分不開的，這種現象在中國是相當普遍的了。

他們雖不是水載着的舟，但是水能覆舟的道理他們却是相當清楚的。血腥鎮壓四·五運動，殘酷迫害民運人士，就是例子。王希哲、徐文立那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他們之所以站不出來，還不是懾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

今天我離開了中國，我覺得我是自由的，

二十多年來無形的精神枷鎖打碎了，我很希望能借中春一角發表我自由的言論。

還有一點補充的是：關於在中國搞政治運動的問題，我很同意遇羅錦的說法：運動是由上邊要搞或不搞而掀起或停止的。

亦雲 於加拿大

致介柳先生

看到中春三十八期上的貴文「關於朝鮮戰爭之我見」，我個人有不同的觀點。

第一，介文中提到「四五／八五」，該片只是表現發生的歷史事實，並沒有「價值判斷」地說何是非。而介柳先生却「價值判斷地」結論說「連美國人自己都沒有否認過。（中國政府別無它擇，做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

第二，袁文說中國出兵是因毛澤東的好戰成性，但並沒有說「麥帥的叫嚷：要國民黨反攻」是對的，而介柳先生却結論地說「按照袁文的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俯首就擒，做開大門把反動透頂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請回」。介柳先生這樣地推論「袁文的邏輯」，是否和我們常見的判斷型態——說張三好就表示李四壞——一樣？我們不能因爲張三受稱讚就表示李四的不良。同理，批評並不表示否定，袁文對毛澤東的批評，絕不表示他對國民黨蔣政權的支持，而介柳先生却犯了這種「二分法」和「絕對論」的錯誤，這種「不是正就是負，沒有零——中性——的存在」以及「批評就是反對，就是對他的贊同」的邏輯推論的錯誤，身爲現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應該避免。否則我們無法客觀的分析任何事實，包括歷史在內。

香港留學生 陳宏

仍有信心

不論劉賓雁先生對倪育賢先生在美國的活動如何「表態」；但我對這個「現代包青天」的一貫風格仍是抱有信心的。隨手翻了一下資料，就翻出了五七年「鳴放」運動中劉先生的幾條「語錄」來：

「官僚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而產生的」。註：二十九年前劉就挖出了官僚主義的老根。

「在整個黨內，除了毛主席外，上面是一群頑固的保守勢力，中間是一批土皇帝，下面是一堆懵然無知的笨蛋」。註：彼時劉尚不敢直接摸毛澤東的老虎屁股，但他能如此一針見血地揭批了中共統治階級，非常難能可貴了。

「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個二十多年前膽敢與周揚抗衡的魯迅，乃是由於一個作家與黨委宣傳部長的關係不同。」註：一語道破了中共黨委與作家的基本關係。在此關係下，作家欲獲得「創作自由」，出版自由、人權保障……均無異於緣木求魚。正是這樣，女作家遇羅錦之害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並加以支持的。

但竟有人誣蔑遇羅錦是「沒有原則的人」；甚至影射一切向共產黨爭民主、自由的人是為個人，不是為了「人們和社會」；還把遇羅錦害怕回去的那個社會，美化為「馬克思所講的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民主社會」，而不是一個「特權的社會，一個人吃人的社會」。不禁令人慨嘆：中國知識份子的知識良心何在？難道顛倒黑白，賊喊捉賊就是他的博士論文嗎？還有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

片黑暗」，因為「中國畢竟從一個四九年前被列強肆意侵略，分割的弱國，變為今天……的強國」。這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大救星」的調子完全合拍。應嚴厲指出：這是對眼前中國革命歷史的重大篡改。誰都知道，早在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前，中國就取消了滿清時代的不平等條約，而成為創始聯合國的世界五強之一了。在此順便加以糾正。

讀者劉安第於南加州

剝掉畫皮

徐文立寫的獄中申辯寫得實在好，就是要這樣，剝掉克格勃的畫皮。我在文革期間被判刑，當時全是秘密審，公開判的。現在審徐文立總算是開庭，有幾十人參加的「公開」審判了，而且還有辯護律師。可實質上，和審判我及許許多多的政治犯時毫無區別。特別要指出，克格勃們在正式判處政治犯之前，在肉體及精神上的折磨，他們不必動用肉刑，但是在營養、空氣及陽光這方面用刑，一個人如果在半年內不見陽光，精神就會接近于崩潰，會產生分裂及種種毛病，這就是徐文立與克格勃妥協，交出材料的原因。營養、空氣及陽光的極度缺乏，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待政治犯的三大法寶，這是不用傳統的肉刑的刑法，我們在海外的人，怎樣去援助徐文立這樣一些政治犯呢？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中國大陸新移民 何本行

給讀者信

我們如果要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深入理解，就必須將馬克思的哲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這

兩個概念分清。馬克思曾經說過，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自認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並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人道主義等同。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即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目的。

蘇聯、東歐與中國，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我們對制度缺陷上的批評與爭論，並不是實行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為立國基礎的問題，而是哪一種政治體制在現今階段中更能體現人民需要及其可行性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是「目的」問題，如果我們將「目的」定為人道主義，那就是一種無所謂的爭論。體制是一種「手段」問題，而「手段」問題是能夠客觀地科學性地加以評價的。這樣，就可以避免陷於意識形態爭論的泥沼之中。

至於愛國與回國的問題，大家必須了解的：

「愛國」與「回國」是兩回事。回去的並不一定愛國，愛國的並不一定要回去。

一個人是愛中國人，愛國，愛黨或愛自己，可從一個人的行為中證實。

以我個人來說，我從沒有認為自己是「愛國人士」，我亦不必按照別人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去做事，所以我也不在乎別人以為我愛國與否。

我反對的只是一種錯誤的邏輯思考，一種使理性判斷陷入深淵而不可自拔的邏輯——以偏蓋全，哲學用語即「普遍化」，俗語即「一棍子打翻一船人」。這種邏輯是獨裁制度的基礎，一個阻礙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絆腳石。

中國人如果不向這種邏輯進攻，就不可能產生有較高判斷能力的人民與較好的政治體制。有判斷能力的中國人是以事論事的中國人。

黃鳳祝於西德

北大學生的正氣歌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本刊責任編輯 楊漫克

「九·一八」！「九·一八」！每年的今天，有血氣的中國人都不會忘却這國家、民族蒙受恥辱的日子。去年「九·一八」，北大學生衝破政府的重重封鎖阻撓，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愛國民主示威遊行。此舉，震動中外。

在「九·一八」前後的紀念活動中，學生們在北大校園內，張貼了大量噴溢着浩然正氣、飽蘊着醒世諷言的文章和詩歌。在當局禁止和沒有新聞自由的環境下，這些珍貴的文字一直無法面世。時隔一年，在各方朋友的支持協助下，我們終於收集到一批當時以大字報形式貼出的各種文章，值在北大「九·一八」示威遊行一周年之際，予以部分發表，對北大師生的大無畏的愛國氣節和爭取民主的精神，寄予我們的崇高敬意。「生活是沒有旁觀者的」，願這些振聾發聵的心聲能夠喚醒那些對民族國是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人，願這些熱血青年的勇敢事跡，能夠鼓舞那些對中國的民主前途悲觀失望、無所適從的人。

由于封鎖消息，北大「九·一八」事件的真相鮮為人知。去年，外國記者報導時，多認為是一個排外性事件。現在，大字報的內容告訴我們，這是一場真正的愛國民主運動。

北大學生的「九·一八」遊行，是因為當局對學生紀念活動橫加禁止而引發的。北京領導人出此舉動有兩個原因：首先，中共自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大學選舉風潮之後，禁止大學生參加一切涉及政治的非官方活動，對大字報

、結社、示威遊行則更是嚴加禁止，唯恐學生運動蔓延開來，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其次是，開放後，中日經濟貿易往來中，中國多次受到日方的欺騙，公衆早有憤懣，當局因有求於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唯恐學生紀念活動會引起「友邦驚詫」，故想方設法加以阻止。

公安人員曾在「九·一八」前後關閉北大校門，并設崗封鎖內外消息往來，不許學生出校，外界只知「北大鬧事了」。不料學生們巧妙地想出各種辦法分散離校，又在天安門廣場集合，按期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為避免事態擴大，當時並沒有學生被捕。然事過後不久，上方便開始了縝密的調查活動，懲處了組織紀念活動的骨幹，在今年年初逮捕了兩名學生。這種事後整人的做法是極不光彩的。消息傳出，曾引起了海外輿論的譴責和聲援。

學生的血總是熱的，而北大學生的血是最熱的。在中國現代史上，北京大學素有不畏強權、救國救民的光榮革命傳統。民國初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之際，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學方針，開了「百家爭鳴」的風氣，北大出了不少國家棟樑之材。胡適、蔣夢麟、陳獨秀、李大釗等都曾在北大任教。馬克思主義也是在北大始得傳播的。毛澤東就是在北大作事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辛亥革命至今，每當中華民族面臨災難危亡的時刻，北大學生總是奮勇當先，不惜以青春和熱血，喚取民衆的覺醒，拯救國家于危難之中。

從「四·五」新文化運動到「一二·九」抗日救亡學潮，從天安門「四·五」運動到八〇年大學生選舉風潮，北大師生譜寫了一部光輝的史詩。

遺憾的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權雖已更迭過數次輻輳，統治者更是如走馬燈般變換沉浮，然中國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專制傳統却未能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得到洗滌。任何時期的統治者都有一個靈犀相通的痛癢，就是害怕學生運動。因為學生們愛國家、愛民族、愛真理、愛正義、愛民主自由、愛人間美好的事物。他們是不會屈服于任何招牌下的專制獨裁的。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上升時期，曾參與、組織過一系列的學生運動。抗戰時期，也有無數學生投奔延安。不想建國後，毛澤東治下的中共，大搞反智主義，四九年即開始「思想改造」，對知識分子展開洗腦，繼而有五七年反右，文革大批判，中國的大學生受過無數的凌辱和利用。文革後的一代中國大學生和青年們，在認識真理、獨立思考、知識廣度和追求民主、自由等現代社會目標上，具有比以往任何時期的大學生更為優良的素質。而北大學生正是這一代杰出青年的縮影。從紀念「九·一八」文摘中，人們會看到，中國的民主希望寄託在青年的身上。而未來的歷史將證明，他們會不辱使命的！

最近中國大陸政治改革、要求民主的輿論大興，中共高層領導人也公開表示要發揚民主，消除政弊。要實行政治民主化，必先有言論自由。中共若真有決心實行民主，修明政治，就應該儘快釋放因發表政治言論或從事政治活動而被捕的學生和民運人士，方能取信于天下，並使政治改革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烈烈青春北大人·浩然詩篇振國魂

■北大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大字報選

「九一八」與憲法

(北大法律系研究生·中共黨員)陳小平

最近幾日，同學們貼出來的大字報，總覺得有幾句話要說，我是學習憲法的，有義務對大家解釋憲法和宣傳憲法。一些同學的大字報把話鋒指向憲法，這是失之公正的，憲法本身是無可指責的，它規定了廣泛的公民權利，只是在「九·一八」這天，神聖的憲法受到了踐踏。

歷次的北大學生事件中，有不少是涉及憲法問題的，過去那種可笑的，認為學生寫大字報是違憲的觀點已經沒有人再堅持了。今天，人們又從新的角度提出了憲法問題，這不能不說憲法意識已漸入人心，不少同學從憲法角度談「九·一八」就是證明。我認為從憲法角度全面看「九·一八」事件，必須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北大學生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舉行遊行活動是合憲行為應鼓勵提倡。

第二，校方與軍警、保衛部門配合，封鎖校門禁止學生到天安門遊行，是嚴重的違憲行為，實為八二年憲法實施以來重大事件。校方應承擔因違憲而引起的一切法律後果。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遊行示威的權利。」從法律上看，對公民權利自由的限制，只有依法才能行使，依照我國憲法規定，只有當公民的行為損害國家、社會、集體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時，才能對自由加以限制。北大學生行使遊行示威的權利，並未違反憲法的禁止條款，這是校方都承認的，既然如此，校方有何理由禁止學生到天安門遊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呢？校方所列理由種種皆為法律以外的限制，對公民行為不具有任何約束力。在這種情況下，封鎖學生遊行以及關大門的行為已構成侵犯公民權利行為，是地地道道的違憲。

第三，以黨代會召開為理由並以中央和北京市委批准為藉口，禁止學生到天安門遊行的做法是黨大於法的餘毒在作怪。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黨章中也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些都強調憲法的法律效力是至高無上的。既然如此，就不應當有任何高於憲法的東西存在。黨中央、北京市委以及北大校方皆無權在憲法之外對公民施加限制，否則，那又是黨大於法，這與黨的要求都是相悖的。據說一些系的黨總支規定：只要哪個黨員參加遊行，就處分誰，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是憲法意識低下的表現。既然黨也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既然強調黨員要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又有什麼理由去處分那些帶頭參加「九·一八」遊行的共產黨員呢？這種處分決定是違反憲法的，而違反憲法的決定是應該撤銷的。

第四，依照我國憲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一切違犯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憲法序言也規定：全國各族人民都必須以憲法為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障憲法實施的職責和要求，依照上述規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控告有

關當局違憲（此條被告方可為北京大學）。

第五，當前，黨中央和全國人民都要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並在大刀推廣普及法制教育，廣大同學可以從「九·一八」事件中進一步學習憲法，充分認識和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利及其義務。為此，我認為：

以「九·一八」事件為基礎，進一步在北大開展學習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活動，針對校方在「九·一八」事件中的違憲行為，進行公民護憲簽名活動，並可組織聯名提出法律訴訟。

第六，對近幾日校園內出現的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必須予以制止，一些人以電影為誘餌

，企圖趕走看大字報的同學，這種卑鄙手段實屬罕見。

北京大學的廣大師生們，憲法是我们的根本行動準則，維護憲法就是堅持維護「四個堅持」，為了實現黨中央和人民的依法治國要求，讓我們努力學習憲法，維護憲法吧。

■北大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大字報選■

我的話

「九·一八」紀念活動感想

（北大研究生）
龍的子孫

(一)

在黑暗的、專制的年代裏，中國人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他們堅信：「秋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麼！」是的，春天來到古老的東方大地上已經三十六年了。可是，正如魯迅先生曾經預言過的：「春天過去了，秋天還要來的！」我們悲哀，在煦暖的春風裏也夾雜著絲絲秋寒，陣陣冰雹。

「於天上看見深淵」，我看見了深淵。

早在幾十年前，魯迅先生就冷酷地告訴我們：「將來就沒有黑暗了麼！」我曾經多麼希望這不是事實。然而遺憾，一次次的和平和憤怒使我確信現在不是天國。魯迅還說過：「我疑心，將來也會有叛徒處死刑。」我們的旗手，我們的參加天安門遊行的「叛徒們」，不是也有被處死刑的危險麼？

啊，叛徒，能做一個真正的叛徒是偉大的，不朽的！郭沫若曾作「匪徒頌」，我今要作

「叛徒頌」。

(二)

然而我要問：那些洋洋得意的阻撓者們，那些猖獗狂吠的鷹犬們（寫到這裏，我忍不住吐一口唾沫），他們的血管裏並沒有流著日本人的血液，他們的兜裏並未揣著大把大把的日圓，他們的腳也未踏在紙醉金迷的日本四島上……他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嘴巴搬到少數日本人的腦袋上去？他們為什麼要揮舞「警棍」執行日本人的馬刀的使命！究竟有什麼東西橫隔在同樣是炎黃子孫的我們和他們中間？

(三)

領導，領導……是的，我們何曾不希望他們正確地領導我們，可是，事實證明，他們是領而不導！「四五」運動他們領導過沒有？「振興中華」是不是從他們口裏喊出來的？領

導曾是群眾，但又不是群眾！他們一旦袍帶加身，藍翎上頭，便認為自己有了天然的優先權。在他們眼中，群眾是群氓，而群氓的一切行動都是胡鬧。他們要把群眾的一切活動都納入他們規定的範圍：群眾只能亦步亦趨的跟在他們的後面，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是最大的不相信群眾！這是最大的愚民政策！可是歷史的創造者仍然是廣大群眾而不是少數官僚！

(四)

北大熱愛自由，因此對提出「學術自由，實行兼容並包主義」的蔡元培故校長無限懷念，無限尊敬。

當然，我們並不拒絕適當的紀律，我們願意有良好的紀律。然而，紀律一旦不是推動而只限制正義的群眾運動，它就變成了專制的工具！那些官僚們說不准遊行，就不能遊行；說不准去天安門，就不能去天安門；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紀律。然而這是些什麼樣的紀律呵！我們有必要爭取自由，爭取民主。

「不自由，毋寧死！」

(五)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然而我應當說：「欲阻擋學生運動，何患無辭！」什麼「外

國記者造謠」呀，什麼「股票價格下跌」呀，什麼「政治影響」呀，什麼「黨代會」呀，什麼「李光耀來訪」呀，什麼……呀，呀，呀，然而結果呢？這一切如果不是有意賣國，便是愚蠢和糊塗。它們不過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的叫囂的翻版！而且我懷疑，黨代會早不開遲不開，偏偏在國恥日「九·一八」來開，是不是他們淡忘了他們曾經歷過的屈辱和災難？沒有經歷過的我們，不會忘記！

(六)

躁動的年輕的靈魂豈是愚蠢的循規蹈矩所能拒制的麼？澎湃的躍動的熱血豈是可怕的小心翼翼所能凝固的麼？人的尊嚴，民族的尊嚴又豈是少數要挾者們的苦口婆心加威脅逼迫所能放棄，所允許褻瀆的麼？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呼聲也終究要衝破幾千年封建專制所設置的重重藩籬。

未名湖有知，不會忘記我們今天的呼聲；博雅塔有眼，不會忘記我們今天的行動！

我們堅信，正義和真理在我們一邊！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龍的子孫
寫於一九八五·九·廿一

我的話 (續一)

(一)

中國素稱為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但中國為什麼沒有亞里士多德，沒有柏拉圖，沒

有畢達哥拉斯，以至於沒有達·芬奇、拉斐爾、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

答案是令人深思的：中國長期以來沒有自由！

古希臘有自由（請別加以絕對化），所以有亞里士多德，有柏拉圖，有畢達哥拉斯。

中國沒有自由，只有專制統治與儒家倫理道德的「緊密結合」。

中國只有專制統治，所以有萬里長城，有大運河；中國只有儒家倫理道德，所以有一批又一批不朽的古聖先賢。

作為專制統治象徵的萬里長城，我們要推倒。作為精神控制支柱的古聖先賢，我們要摧毀。

我們要自由。

(二)

以至於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當他們放下了那根牽著我們的鎖鏈時，我們反而茫無所從。傳統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吃到的苦頭難道還少嗎？

列寧說：身為奴隸而歌頌舊制度者，是奴才；麻木不仁者，是奴隸；奮起反抗者，是歷史的主人（大意）。

當我們奮起反抗傳統的思維模式時，他們舉起了「屠刀」。

(三)

「曾經潤氣者，要復古；正在潤氣者，要保守；未曾潤氣者，要改革」。

我們要改革，但我們不要潤氣。

我們要改革，不但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觀念上的、道德上的……

(四)

歌舞昇平，朝歡暮樂……一派多麼誘人的盛世景象啊！殊不知，福兮禍之所伏，樂極必生悲。

在某些人看來，似乎我們醉生夢死，麻木不仁倒是好的，是社會繁榮的表現。而當我們磨快尖銳的思想，噴湧熾熱的鮮血，敲響盛世的警鐘，倒是胡鬧，是幼稚，是發洩，是吃飽了撐的！

我的可敬的先生們，當一聲聲鼓動天地，驚破霓裳羽衣舞時，你們總要來得及在腳底板下抹些油！

(五)

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就「某些」學生紀念「九·一八」發表了一篇軟綿綿的答外國記者問，充斥其中的是一些溫文爾雅的詞句「希望……要求……遵守諾言」好像發言人不是代表中國人民講話，而是以中立國或調停國的身份講幾句沒有輕重、不負責任的兩面之詞（即使是外交辭令吧，我也認為那太軟弱了）。

希望，中國人最愛作美麗如肥皂泡的希望。當年蔣介石國民政府不希望披著羊皮的狼——「國聯」——主持我東三省的公道麼？當年某些人也不會希望越南當局勿忘恩負義、恩將仇報麼？

希望，希望是什麼？是獻給你虛幻的歡樂的妓女，却榨取你作為男人的品格和尊嚴。我們不要綿軟無力的希望，我們要腳踏實

地的行動！

(六)

「憲法是人民的根本大法」，他們這樣教導我。作爲人民之一的我，也欣然地接受了。

但是權利呢？他們說，有！立法、司法、監察……

但是這一切都要在他們規定的限度內。爲了裝飾門面，他們在一部龐大的憲法中也加上了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罷工、自由等美麗的字眼。他們把並非群眾使之蒙受羞辱的大

字報等正當權利堂而皇之地取消；他們攥緊了司法的鐵手，法律是他們忠順的奴僕。

我們要求三權分立！要求最大限度地實施憲法！

龍的子孫

寫於一九八五·九·廿二

■北大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大字報選

失望與希望

(北大學子)頑石

「九·一八」已經過去，我們作爲天安門紀念活動的參加者，雖感校方某些行爲之卑劣，但我們終能在天安門前紀念碑下緬懷死難同胞，心中怨氣喧洩不少。本來不想再說什麼，從此以後安心讀書。可是，至今仍有一部分人，不肯罷休，不說他們是惡毒攻擊，起碼也是肆意誹謗。面對這次莊嚴的紀念活動惡語中傷，我還不能沉默！

昨天下午四點左右，天安門廣場上只有一批軍警和往來奔馳的摩托車。廣場四周，軍警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擔任警戒，群眾被拒於圈外默默地站著，北大近千名學生就在這種氣氛下開始紀念活動，其短暫過程我不想再贅述，已有「紀實」陳述明白。我只想讓大家都知道偌大的天安門廣場，偌高的紀念碑下，只有一個孤零零的小花圈，悲戚地跪在那裏，遠遠望去，恰似一朵悲哀憤疾的小白花。花圈上字跡：「紀念二千萬死難同胞的冤魂」，署名：「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八三年級」。其景之淒慘

，其象之冷落，可想而知。然而，護送這個小花圈的同學竟被警方攔截六次，這究竟是爲什麼？爲了阻擋北大學子，「毅然」出動衆多警察，沿途設防，從西單到廣場更是崗哨遍佈，步話機、摩托車、警車比比皆是。校門、黃庄、友誼賓館、木樨地、西單（六部口）、天安門，屢屢受阻，特別在西單，被阻在六部口胡同，達半小時之久。警察們明著說是奉上級命令嚴禁北大學子到天安門廣場去獻花圈，他們所持理由是：黨代會期間天安門戒嚴，李光耀來訪。我們不理解我們紀念「九·一八」與政府對外政策和其它國策有何不堪之後果！「九·一八」作爲國恥日，要是紀念碑下無一花圈，外人不知對此作何感想。我們據理力爭，在「不發表演說，不集會，不遊行」的條件下，才達成妥協，允許我們去廣場。到了廣場，又有人企圖拿著「北京市通告」進行阻攔。最後在廣大同學和群眾的強烈要求下，才批准我們進行紀念活動。我們列隊入場，井井有序，沒

有任何不合適的口號，沒有任何偏激行爲，請問誹謗者：這樣的活動能造成什麼壞的國際影響？再來看我北大吧，輝煌的「北大」門牌下，高懸慶祝黨代會召開的大橫幅，其下則壁壘森嚴的鐵衛門緊緊關閉，裏面學生群情激憤，外面警察威然挺立，毋用說有人喜歡造謠，不了解內情觸此情景會作何解釋？不良的國際影響是何處所滋？我想有腦者皆知。有些人對這次活動懼怕不已，我們學生一無權勢，二無錢財，怕什麼？無非是怕「友邦驚詫」，怕外國輿論，唯獨不怕中國的落後，不怕國人的麻木。有人以「驢子披獅皮」來比喻我們的行爲，本人愚拙，只能作此理解：「中國人是一個驢子，不需作出任何喚醒的吶喊，靜聽洋人愚弄、擺佈。」

這次活動，在目前看來，參加者——群孑然一身的學生，其前途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校團委一君對我們會婉言相勸：「你們的畢業可能成問題。」但終究還是有「膽大」的人，還有爲國家昌盛甘願犧牲的人，不顧自身利益，奮然走出北大，默哀於紀念碑下，挺直胸膛，喊出我們內心的郁念。這才是中國的脊梁！

我們的紀念者都是自願參加者，沒有人組織，沒有人領隊，沒有人鼓動，沒有人演說，我們都是自發者。

我哭泣，我更振奮，因爲失望後有希望。

大字報摘編部份

北大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大字報選

▲如今北大祭烈士
爲何把道攔？

千年中華立世林
今年何懼怕日本？
做經濟，搞買賣
不讓友邦驚詫，太意外
却把學生怪。

——摘自北京林學院學生貼在北大的大字報。

▲任何「向前看」之類的美言都掩蓋不了
血淋淋的歷史！

「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們無意仇視日本人民，但我們忘不掉
中華民族的災難，不能忘掉中華民族的恥辱！
我們沒有對「食人者」放下屠刀的希
望，我們只想借我們的吶喊讓那些沉緬於安樂
、不思國事的人猛醒！

——摘自「告北大人」

▲某天，我遇見一電台記者，問他：北大
發生了那麼大的事，怎麼不見記者去採訪？也
未見電視台去錄相，以便向全國各族人民及全
世界人民說明真相。誰知他却說出一番令我驚
詫的話來：我們才不願去湊這份熱鬧呢？

我不明白，怎麼我們北大學生的愛國之情
在他們看來是瞎鬧，他們怎麼不來看一看那一

篇篇炙手可熱，充滿着多少同學情意的愛國詩
篇？那是叫頑石也會落淚的愛國之情！那是令
冷血動物也會動感情的篇章啊！終於，經過百
般思索，我恍然大悟：十多天來我們北大學
生所噴發出的火山一樣般的愛國之火，燒來燒去
却只在北大內燃燒。而少許的外界人偶然染指
，受到些許影響，但終究是少數！還不及汪洋
大海中的一滴水，而絕大多數國民却對此一無
所知！他們所聽到的只是北大在鬧事，上面也
這樣說！奇怪，好像我們學生鬧鬧事似的，也
未弄清楚北大爲何鬧事，也不來實地調查一番
，也忘了「九·一八」爲何日，又受到「大東
亞共榮圈」的深刻影響，中日親善感情近日又
在上增，於是乎就相信了！嗚呼！哀哉！悲哉！
惜哉！他們似乎忘却了我們民族的歷史上
竟還有個屈辱的階段，似乎忘却了還有日寇侵
華史，似乎忘却還有過倭子殺我祖先之事，似
乎忘却了還有「九·一八」事變，似乎忘却了
四十年前我們還有過……

——摘自大字報「愛國之士聯合起來！」

▲記得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人善於忘却，
在淡淡的氣氛中使那血色漸而微落，以至消失
，然而在今天吃盡了健忘苦頭的中國人難道不
會健忘嗎？要知道兩千萬同胞的血肉雖然化爲
塵土，然而大地的各方無不呻吟着苦痛的魂靈

，我們又怎可忘却。

「九·一八」，我們不行動，怎對得起我
們苦難的同胞，不行動，不吶喊，怎能喚起沉
默的國民。

千年的重壓，使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習慣
於沉默，習慣於壓抑自己的感情，然而在這個
沉重的「九·一八」，我們能再沉默嗎？我們要
喊起號子，我們要吶喊，要最終讓「九·一八」
這大號的巨石砸碎在我們的腳下。

我們要遊行，我們要吶喊。

「九·一八」——硝煙、槍聲、炮聲、血
——汨汨橫流的血，乾涸的血，刀——帶血的
刺刀，滴血的洋刀，人——剖肚的嬰兒，斷頭
的屍身……「九·一八」，中國人怎能忘懷
！怎能忘却啊！

行動起來，只要都是中國人！

我們不光要吶喊，一樣也衝鋒。

——摘自大字報「我們要吶喊，要衝鋒」

▲我又想起那塊掛在櫥窗前等待人們按上
血印的孤零零的白布。我佩服掛這塊布的人的
膽識，佩服他的犧牲精神，至於那預先按上的
一塊是否是真正的指血，是否是眞血（或許是
鼻血，也未可知），可以先不去管它。不管怎
麼樣，我還是很欣賞他的，因爲他至少作出了
一點犧牲，或者說至少他想喚起一部分人，然
而竟沒有人響應。如果一時鼻子不出血，那即
使是從不管那個地方「借」一點血來，或乾脆
滴點紅色液體，也算是表白了一下自己的心迹
呀！然而竟沒有!!!

——摘自「真正的悲劇」

▲……紀律一旦不是推動而只限制正義
的群眾運動，它就變成了專政的工具！那些官

僚們說不准遊行，就不能遊行；說不准去天安門，就不能去天安門；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紀律。然而這是些什麼樣的紀律呵！

我們有必要爭取自由，爭取民主。
「不自由，毋寧死」。

——摘自「我的話」

▲尊敬的民主老人，我知道你是怎樣死去的，扼住你咽喉的是壘中的敗類；封住你手脚的，是狂妄的違憲者。內外夾擊，連呼吸都艱難，何況吶喊！連手脚都無自由、更無法掙扎着去顯示你的存在。你是被野蠻地蹂躪，你是被粗暴地踐踏，你是被無情地扼殺！你是何其痛苦地逝去啊。在新中國，在八十年代以法治國提倡民主的今天，你本該，但以未有的健委在這春風沐浴中舒暢地活下去，而且還要以滿腔的熱血積極推進法治和民主的建設，去完成你神聖而光榮的使命，却不想，你在這前進的途中夭折於混蛋們的手中，可悲啊，可恥啊！

——摘自「復活吧，民主」

▲我們每個人都冷靜而認真地想一想，怎樣才能使我國的政治生活趨於正常？愛國學生的正義舉動怎樣才能取得領導的支持？

——摘自「我之見」

▲民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是我國公民的高尚權利！民主是社會進步的最偉大的精神體現！民主是宣傳真理，發揚善良的絕好手段！民主是鞭笞謬誤，揭露醜惡的最有力武器！民主是科學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

民主是競爭前進的基本條件（它能破壟斷），民主是選賢任能的唯一途徑（如競選），民主是打破專制、徹底改革的根本保證。

沒有民主我們將任謬誤牽引！沒有民主我們將受庸愚之人的驅使！沒有民主我們將遭污穢的浸染！沒有民主我國將永遠落後終受欺侮！沒有民主我們將退回過去！沒有民主我們都將成爲奴隸！

我要我民主，我要我民主！堂堂中華民主不可無！我們要大聲疾呼，還我民主！還我民主！

親愛的北大人，你們是祖國民主的象徵，切勿（丟）了民主，切勿吞沒了祖輩的血汗；你們是祖國的精華，一定要保護我們的民主，你們是血性的人們，一定要用民主之武器爲祖國的發展開闢道路!!!

——摘自「對遊行失敗後果的沉思」

▲鐵門的聯想

無情的鐵門，
鎖住了熱血的北大人。

眼裡含着淚，
心裡壓着憤，
兩手抓着鐵門，
我呼籲——
同胞們，
我們要去天安門！

二

世上有各色各樣的門，
有家門、校門、國門和鐵門，
過去，我走出家門，
跨進了民主的北大的校門；
今天，我要衝擊緊閉的鐵門，
我要去天安門！
可是，我無法衝破鐵門，
是誰，關閉了我們的

報國之門？
是門內誘人的安撫
和層層壓下的恐怖聲，
是門外疑惑和呆滯的眼神；
和那些看不見的悶棍；

我無法衝破鐵門，
只能遙對二十萬之靈，
灑下苦澀的淚，
咽下滿腔的憤，
我悲，我憤，我要門——
爲什麼，今天還有
囚禁正義和自由的鐵門？

三

正義遭到了壓制，
卑鄙沾污了神聖。
竊竊自喜的，是仇人，是中曾根，
悲切憂憤的，是二十萬不死的靈魂，
難言苦衷的是丁石孫
大聲疾呼的是光榮的北大人！
起來，抗爭，
我們不要鐵門，
我們要的是正義。
和自由女神！

憤怒的，但又是愛國的北大人
一九八五、九、二二。

▲我會爲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壯舉而激動和自豪。三年前，我爲我成爲北大人而驕傲，然而，在許許多多逝去的日子裡，我麻木了，冷漠了。我感到我們是在被捆束着，壓抑着。一代代的，在沉默中，墮落。

……
——不是一時的衝動，更不是瞬間血液的膨脹。這是冷靜的反思，是偉大的壯舉，是正

義的呼聲，是理智的選擇。

然而，正義被擄殺着，民主被剝奪着，至高無上的憲法被踐踏着，又一次的，我們被壓抑，被捆束。

——摘自「我對九·一八壯舉的反思」

▲「九一八」運動的焦點是什麼？

北大形勢嚴峻的真正內涵是什麼？

是有法不依，以權好法。嚴重的違憲活動竟出現在這素以民主傳統聞名於世的北大，竟出自於北京市政府。這一點，我們將何言以對？能否對違憲行為追究責任？真理何在？正義何在？「友邦人士」真的驚訝了。

——摘自「寫在『九一八』過去之後」

▲鐵柵，令人心寒的鐵柵！鎖住了！我們要問，鎖住的是什麼？是北大的熱血青年，是中華的男兒！鎖住的是北大的光榮傳統。北大的光榮歷史都被鎖進鐵柵裡面！但是，鐵柵鎖不住我們的心，因為，正義和我們同在，人民和我們同在；因為愛國無罪，振興民族精神，人人有責！

流在我們血管裡沸騰殷紅的液體，不會因為區區的鐵柵而冷卻！身體可以鎖住，但誰能鎖住我們的聲音？請聽吧，「松花江上」，還有「義勇軍進行曲」，幾十年前我們的先輩會高唱着它們進行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今天，我們要讓民族醒來，我們的歌聲何等悲壯，何等激揚！

但是，我們不僅要問：為什麼，我們不能享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什麼人，竟能將憲法任意褻瀆和踐踏？

不要忘了，歷史的使命在我們。

——摘自「鐵柵的聯想」

▲我們要問：除了經濟以外，難道政治領域不需要改革嗎？思想意識、社會心理方面不需要改革嗎？幹部隊伍年輕化、廢除終身制，諸如此類，都是太表面化的政策。我們常常強調民主、強調法制；可民主和法制，在中國又有多少保障？

——摘自「『九一八』紀念活動的再思考」

▲鑒於憲法屢被踐踏，憲法的立法者應考察如何護憲的切實方法。為此，應制定和頒布違憲行為懲治法。明文規定各類違憲行為的懲處條款。應使違憲行為者受到行政、民事、法律等方面的責任追究。這樣，人民的根本權利才能被人民自己制定的根本大法有效地加以保障。

——摘自「應建議和敦促人大制定違憲行為懲治法」

▲……為了阻擋北大學生，「毅然」出動衆多警察，沿途設防，從西單到廣場，更是崗哨遍佈，……特別在西單，被阻在六部口胡同，達半小時之久。警察們明着說是奉上級命令，嚴禁北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去獻花圈。……再看看我校友大門吧，輝煌的「北大」門牌下，高懸慶祝黨代會召開的大橫幅，其下則壁壘森嚴的鐵柵門緊緊關閉，裡面學生群情激憤，外面警察威然挺立……

——摘自「失望與希望」

▲「人民警察」列隊燕園，何等「威武」，何等「氣魄」！誰知道與他們對立的竟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學生。太不「自由」了！在八十年代，在中國，在首都北京，為了防止學生的

遊行，竟出動軍警封鎖校園，緊閉鐵門，更何況遊行僅僅是悼念「九·一八」死難的亡魂，以喚醒沉迷的國人，絕無反政府之意，何必如此膽怯呢？使用的手段竟如此卑劣、笨拙。學生上街遊行的權利竟然給剝奪了。試問民主何在？民權何在？

請問幾位官方人士，出動軍警，「武力鎮壓」這樣的國際名聲果真那樣好嗎？要知道，學生運動單是武力強制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武力，北洋政府動用過，國民政府也動用過，結果如何呢？青年們的愛國熱情，較之那些「自鳴世故」，「深思熟慮」者，強之何止百倍!!!

——摘自「聲援書」

▲要求學生會研究生會向本屆黨代會提出抗議書，年輕的朋友們，路正長着呢！

誰能拯救中華？
腐敗的政府，末日將要來臨。

——中國人

▲落後、屈辱、挨打的根本原因在哪裡？老爺們不正是在開會嗎？聖地不可不去！到天安門去，任何人也不可阻擋！

——中國人 九/十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八二年第三十五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同時又在第五條規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必須遵守法規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而「九一八」之日當廣大北大大同學要進行自發的、愛國的、紀念「九一八」活動時，却遭到校方、團委和學生會的蠻橫阻攔，還有門外那些「威嚴」的軍警把門，顯然與憲法精神相悖，神聖的公民權利橫遭踐踏！至高無上的憲法被一群故意裝出來關懷同學的人所蔑視。在舉國宣傳普及法律知識的今天，竟然會在堂堂北大發生這種侵犯公民、無視憲法的事，實在令人痛心。

為伸正義，維護憲法，我建議，基於丁校長在「九·一八」所做所為已經觸犯憲法，彈劾丁石孫。同時，也給予重要負責人、學生會幹部以彈劾！

——摘自「彈劾書」

▲改革現代化不僅在於科技，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現代化和理性的光芒。有目共睹，幾十年的整黨收效甚微，我們的幹部官僚主義，求穩思想甚重，對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缺乏真正的愛和同情。這次趁黨代會召開到天安門弔唁死難的民衆，對振興與邦大有裨益。

——摘自「九·一八」

▲凡是不願睜着眼睛說瞎話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存在着一種「官僚階層」。他們享有高於一般公民的「特權」，因此，也被叫做「特權階層」或「貴族階層」，社會上現

存的許多弊病這裡無須羅列，只要稍加思考就會發現，所有這些弊病的產生幾乎都是和「特權階層」的存在緊密相連的。……

「特權階層」的本質意義就是不公平，處在這個階層的人就是要竭力保持這種不公平以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並有擴大（相對）這種不公平以取更多利益的願望，在政治上，他們依靠的就是不民主的政體，而不民主的政體又由這些人來維持。……

有人說，現在首要問題是經濟落後，生產力不發達，所以政治問題是次要的。不錯，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科學技術等確實可以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這種促進作用在很大程度必須在建立了先進的政體這一前提之下才能實現，現行的帶有嚴重封建專制殘餘的政體已日益成爲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成爲生產加速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因此，在現階段，政治問題仍然是首要問題。……

——摘自「告同學書」

▲同學們：

沒有人擔心你們紀念「九·一八」，但有人擔心你們的自由演講，更懼怕自由演講所導致的其他呼聲。試問：中國連「一堵牆」都不容存在，自由演講能容嗎？請思考！

——社科同學

▲我們沒有理由去指責我們的學校或者北京市人民政府。原因很簡單：造成這種恥辱的不是學校或市人民政府的無能而是制度的弊端！換句話說，學校也好，市人民政府也好，歸根結底，都不過是雖然有着弊端，但依然存在和運轉的制度一顆螺絲釘！

——摘自「九·一八」紀念活動的再思考」

▲中國以傳統的歷史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而著稱，對於任何外來者都是以禮相待，「禮尚往來」的結果在百年來並沒有使洋人滿意，我們曾一味地責怪自己的經濟落後，政治腐敗。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偽道傳統學說對中國人民思想的禁錮，國人習慣於以君臣相稱，對外維維諾諾，對內爾虞我詐，且有一「天不變道亦不變」之勢。

中華民族富於吃苦耐勞的忍耐精神，但中國人也不乏惰性、奴性，這與封建的思想影響誠然是分不開的。

——摘自「需要自省，更需要激奮」

▲學生的熱情，是正義的愛國活動，得出的結論是什麼？是我們生活中缺少民主！後果是什麼？是「一小撮壞人」對你們懦弱的譏笑！痛心啊，我不得不接受國家機器不僅僅是爲了對付敵人，而且也是爲了對付人民的現實！我真不敢接受這殘酷的現實！

——摘自「回憶與思考」

▲歷史的教訓還不慘痛嗎？我們的上層建築的作用是在束縛經濟基礎，五八年的大躍進就是一例，不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是上層建築指揮經濟基礎！開放的經濟基礎應有與之相應的開放的政治政策！隨經濟的發展，政治政策必應有相應的調整，關鍵的就是給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權利。

——摘自「回憶與思考」

▲中國只有專制統治，所以有萬里長城，有大運河……

作爲專制統治象徵的萬里長城，我們要推

倒。……

我們要自由。

……

傳統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吃到的苦頭難道還少嗎？

當我們奮起反抗傳統的思維模式時，他們舉起了「屠刀」。

……

他們纂緊了司法的鐵手，法律是他們忠順的奴僕。

——摘自「我的話（續一）」

▲血 血 血……

同胞們：

我們的血就這樣澎湃

得到的血就這樣冷卻？

——警察和電冰箱

中華民族就永遠如此凍結？

奮起啊，同胞！

血流多了，是要

貧血的！

楊××

▲不！我們不能這樣！我們不能這樣！我們要在天安門前「自由演講」！我們要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祭奠亡靈！我們要發動至少北京高校聯合對政府提出建議。我們要衝出去！

否則，在「校內」自己對自己高喊一遍，與乾脆發動在每個宿舍舉行集會，或者乾脆發動每個北大人內心對自己「演說」一遍，又有什麼區別？試問：這就是我們作為正直不屈的中國人的願望嗎？

（原文未署名）

▲組織起來，這才是當務之急，在深刻的反思之後，最需要是奮然前進。WITHOUT (ANY) 組織，我們的紀念九·一八活動已經失敗。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學生組織，領導我們繼續奮鬥。紀念抗戰勝利有一個「九三學社」，紀念九一八是否也應該有一個「九一八學社」？

「九一八紀念協會」呢？北大同學們，起來吧，「做個勇敢的中國人」，為民族的自強，中華之振興而努力，喚起民眾心中潛在的力量，喚起對祖國深沉的愛，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犧牲個人的一切也在所不惜，又何懼小SHOES 夾腳呢？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只因為我們自己在跪着，而跪着是不可能喚起民眾的。北大人，「站起來吧！」團結就是力量！

不願沽名釣譽的 MACHINTOZH9.21

▲行而不思則罔，思而不行則殆。

幾天來，我們在反思，可是如果僅僅是反思，行成於思而不付諸行動，那我們便是完全澈底地失敗了，如果大家甘於得到這小結果，那麼這篇拙文也失去了寫的必要，您也就不必費神讀下去了。不是有人預言我們「胡鬧」幾天，發熱的頭腦就會「冷靜」下來（滿腔的熱血也會隨之冷下來嗎？）嗎？可我不相信，北大人會是這樣，不相信，北大的血性青年、男子漢已所剩無幾了。犧牲精神也已消滅了，如果（第三個了）我們的沸騰的熱血還未冷卻，那麼起來吧，為了民族的自強，中華的振興！為此，也為達到紀念九·一八的目的，我建議，類似「九·三學社」「九·三抗戰勝利日」我們也成立一個「九一八紀念學會（社）」（或稱九一八學社），為振興中華做出貢獻，見

下文所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這次九一八運動的偉大目的！想一想我們行動的深遠影響吧！

作者 1985.9.22 晚補於北大三教 105

▲北大的同學們：

北林的一千七百多名學生支持你們，無數愛國同胞支持你們，向你們學習！看到你們的旗手倒下了，我們緬懷，我們哀悼：昔日的烈士，今日的勇士！向你們致敬！

附述懷詩一首：

不用擔心，不用害怕，為何？

扛起大旗，昂起頭來，走向前去！

有無數愛國同胞，

站在你們一邊，為的是，

雪念國恥日，勁爭自由花，

頂抵內纖弱，反抗外重壓。

我們搞四化，願把汗水黃土上灑，

紀念我同胞，心甘以血牙還血牙，

志同道合的人們，

難道還怕嗎？

三千香港同胞刷血者，

我廣大同胞少有用

不知為何故？

如今北大祭烈士，

為何把道攔？

千年中華立世林，今朝何懼怕日本？

做經濟，搞買賣，

不讓友邦驚詫、感意外，

却把學生怪。

歷來只叫受少數人利用呀！

却君不見愛國之心，

着實可愛。

（原文未署名）

如何打破

「放—亂—怕—收—死」的惡性循環

——從經濟改革到政治和意識形態改革

（中國民聯）
王炳章

編者按：八月份，在中國民聯總部召集的一次部份中國大陸留美文科研究生的內部討論會上，本文作者就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形勢，做了系統的發言。由於資料詳實，與會者建議整理發表。作者根據發言提綱及錄音，整理成此文。原發言中，涉及了大量人名，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作者成文時，多予刪除。中國的經濟改革一直為世界所矚目，但它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放了又收？為什麼最近改革派將輿論導向政治改革？本文對這一系列問題做了深入淺出的論述，讀後有頓開茅塞之感。

給癌症病人動手術時，常有這種情況：打開腹腔一看，腫瘤已經擴散，若全面清掃，病人身體可能不支，反而加速病人死亡。於是，醫生們關上腹腔，改行姑息療法（亦稱保守療法）。

中國城鎮的經濟，在改革一放一收之後，正處於保守治療之中。

病人的腹腔一開一關，其身體狀況在手術打擊之後，反較前惡化。此外，癌症仍在腹中，病根未除，病人終將不治。

中國城鎮的經濟，在一放一收之後，狀況曾一度不如改革之前，而且，大鍋飯病根未除

，前景不可能樂觀。

用癌症病人手術的例子，來形容中國經濟改革「一放就亂，一亂就怕，一怕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惡性循環，是頗為恰當的。中國的經濟改革，仍未脫出這個惡性循環。

自然界中，還有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蠶繭自縛，為的是保護蠶蛹。可是，蠶蛹要獲得新生，必須要變成蛾子，破繭而出。否則，蠶蛹就會閉死在繭中。

共產黨創造了多套封閉式的官僚體系，既保護了自己，也綁死了自己，如同做繭自縛。共產黨要獲得新生，就必須突破原有的官僚體系。而要破這個「繭」，共產黨就要先行蛻變，即只有非共產黨化，只有揚棄公有制的教條，共產黨本身才有出路，改革才能打破「放—亂—怕—收—死」的循環而闖出路子。

目前，中國共產黨正在蛻變。可惜，在一段經濟改革中，它似乎變得非蛹非蛾、不倫不類，所以，未能破「繭」。

共產黨高層的有識之士，當前正在大造政治改革的輿論。這是共產黨進一步蛻變以尋求新生的再次嘗試，值得鼓勵。

下面，我們回顧一下前段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主要是城市經濟改革的歷程及出現的問題，並以政治的眼光加以透視。

設立新機構 架空舊機構

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問題。鄧小平為了推展其經濟改革計劃，聯合了陳雲的勢力，用了三、四年時間，從華國鋒集團手中奪得政權。然後，他任用了趙紫陽，具體制訂經濟改革的政策。

雄心萬丈的趙紫陽進「京」之後，面對滿朝保守的陳雲派的文武舊臣，頗有當年光緒皇帝百日維新前的無力之感。為酬壯志，他使用了政治上的常規手腕——起用新人，架空老朽。

一如軍機大臣翁同龢向光緒保薦康有為、譚嗣同，趙紫陽的近人向他推薦了幾位頗具才華、在經濟學界初露鋒芒的青年改革家。據說，其中就有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哈佛召開的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第二屆討論會中備受矚目的朱嘉明（見「中國之春」一九八六年八月號）。這幾位剛剛三十出頭、風華正茂的初生牛犢，被召進了中南海。趙紫陽語重心長地說，這是黨中央建國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召年輕人進入中南海商討國家經濟決策，希望他們伸展抱負，為改革出力。以這幾位年輕人和他們的年輕好友為實幹者，以一些老經濟專家掛帥，趙紫陽成立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和國務院農村經濟發展中心等新的機構，主持制訂經濟改革方案。後來，趙紫陽又設立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廣招人才，做為他和田紀雲重要的幕僚隊伍。

當政者推行新政，大凡有兩項選擇：或一下子清除舊有機構和人員；或另任用新人，借設置新機構而架空舊機構，以奪取制訂政策和推行政策的權力。後一種方法，來得較為緩和，不易被政治庸人所警覺。趙紫陽用的，就是

這種策略。歷史上，王安石設「制置三司」（度支、戶部、鹽鐵）條例司，光緒設「制度局」、「民政局」和「十二局」，乃出於同理。當年，毛澤東設立中央文革以架空政治局，鄧小平恢復中央書記處以架空華國鋒，也都尤出一轍。

的確，趙紫陽在制訂經改政策時，主要依靠的對象，就是他新起用的幕僚班子，而將保守機構如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家計委等，撇在一邊。這在運作上是必要的，因經濟改革開刀的對象就是計劃經濟體制，要國家計委參與最初決策，一定會爭執不休，遲遲做不出決議。

用新班底架空老機構，雖然是一項高明的策略，但畢竟是改良性措施，它制造了新的磨擦，給守舊派的反撲留下機會。

一個放字

經濟改革的主要政策，說穿了，就是一個放字——中央放權。共產黨的病根就是管得太，它不但管人們的行爲，也要管人們的思想，最後，一直管到廚房和臥室。這樣就扼殺了人們的積極性，也使共產黨的領袖們勞累不堪。這一現象，用政治語言說，就叫集權。改革，就要放權。

首先是農業上放權——把土地的使用權分給了個體（包產到戶）。改革立即見效。

農村經濟改革的成效鼓舞了鄧小平和趙紫陽，他們決定把改革推向城市工業。

工業改革也是放權——企業管理權下放、外貿權下放、財政金融權下放，並解除部分物價的控制權等。

一道道放權（其中主要是一九八四年國務院下達的國營工業擴權十條）的命令下達後，

自一九八四年底至一九八五年初，短短幾個月之內，全國一片熱氣騰騰——出現了非生產性基建投資膨脹、消費基金膨脹、信貸膨脹和通貨膨脹等一系列膨脹現象（黨內保守派則稱爲大混亂）。

▲非生產性基建投資膨脹：這個現象用通俗的語言講，就是各企業把賺來的錢都用來蓋職工宿舍和托兒所等福利事業上了，而沒有用來蓋廠房、買機器以擴大再生產。資料顯示：一九八五年一至八月份，非生產性基建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四十三%；而住房一項，即佔非生產性投資的四十五%。住房投資增長率爲五十四%，比一九八四年的十二%猛增了數倍。在任何一个國家和企業，賺來的錢不用於再生產性投資（即錢滾錢），而是分光吃光，都是嚴重的問題。中國城鎮工業實行利改稅（財政權下放的一種形式）之後，企業有了較多的自主資金，立即出現了住宅基建的特大膨脹。大家都不去關心如何擴大再生產，而是急於改善生活條件，似乎是基建膨脹的直接動因。

▲消費基金膨脹（又稱消費飢餓症）：其特點是，人們期望消費水平提高，從而要求增加工資，但當工資及消費增長的速度超過了消費品的生產限度時，則呈消費過度——錢多貨短的現象，實際上，這是一種需求過多而供應不足的通貨膨脹形式。

據全國十八個大城市的資料統計，一九八五年一至六月，與上年同期比，國家工資支出增長二十%；獎金支出增長高達九十%，國家對個人其他支出增長六十三%，遠遠超過了國民經濟的增長率。這些統計數字還未能包括各單位私設的「小金庫」和以物代錢的獎金。此外，各行政、企業單位的集體消費同時上漲

。一句話，國家給職工和各企業單位發出了過多的鈔票，使可供消費的基金急劇膨脹。一九八四年，我國城鄉居民結餘購買力已達一九四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年居民貨幣收入的六十%和國民收入的三十六%。一九八五年，結餘購買力預計增至二六〇〇億元。這麼多餘款，足可將市場上現有的商品一購而空。

造成消費基金膨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爲調動職工的生積極性而亂發獎金

二、扭曲化的「攀比」機制：如北京出租汽車公司在改革所得分配制度、實行汽車包租後，出租汽車的司機收入極高（有的月入數百元）；公共汽車司機要求調走去開出租汽車而不許，爲了平息他們的不滿情緒，只好增加工資和頒發獎金。職工工資增加了，幹部也要增加。汽車公司幹部增加了工資，其他單位也隨之跟進……

▲信貸膨脹：即各銀行出現信貸約束軟化症，超量向外貸款。銀行的金融權下放後，個人、集體、國家的企業，爭先恐後地向各銀行的基層單位貸款，甚至出現基層銀行送款上門的現象。據統計，一九八五年一至八月，全國各企業和個人，用國內銀行的貸款而完成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上一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一百三十。其中，很多貸款是無力償還的。一時間，各基層銀行單位紛紛向中央銀行要錢，中央銀行則開足了印鈔機，日夜趕印，快速送往各地，到後來，發展到必須用飛機趕運鈔票的程度。一九八四年，貨幣淨投放達二六二億元人民幣，比原計劃多發了二點二倍。

▲通貨膨脹：物價管制放權後，由於鈔票發得過多，物價必然上漲。還有，壟斷性企業的產品（如鋼材）在黑市上任意抬價，也一時

難以控制。城市的水菓、蔬菜和魚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價格成倍增加。一個月薪一百元的職工，要想吃上像樣的伙食，至少要花掉工資的一半。

▲外匯流失與外貿內戰：外匯使用權和對外貿易權下放後，立即出現了進口狂潮，導致外匯儲備驟降。其中，海南島汽車進口事件震驚海外，這裏不再贅述。

外貿權下放後，國內各省市之間，很快發生「內戰」，即互相削價、競爭出口。如一件瓷器，甲省向外商索取三元；外商跑到乙省，乙省聽到甲省的要價，便開價二元，以利本省的出口；外商又跑到丙省，丙省乾脆降到一元……這種不惜「血本」的內戰，一時虧了國家，便宜了外商。

一亂就怕，一怕就收

上述一系列經濟膨脹現象與外貿失調，再加上大量的所謂「經濟犯罪」，使黨內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們抓住了反撲的把柄。改革派由於事先未有充分預料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沒有準備好應對的措施，在失控面前，自然產生恐慌心理，在保守派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快速下達一批批文件，採取緊急的收縮措施。包括：控制信貸、收緊銀根、急欲基建、壓縮獎金、取消皮包公司、打擊經濟犯罪、收回外匯使用權和外貿權等等。總之，把放下去的權，又收了回來。在收的過程中，保守派特別起勁，順勢把很多中層單位的青年改革者拉下了馬。

歷史大概做了一個諷刺：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只維持了一百零三天，獲得百日維新的稱號；鄧小平的城市經濟改革，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的決議起，至一九八五年二月實施大規模收縮措施終，大約也是一百多天，這或許是國內青年作家建森創作「百日縣長」的靈感由來（小說「百日縣長」發表於「芳草」一九八五年四月號）。

出於對人性的了解以及對中國社會制度的體會，遠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下旬，即鄧小平剛剛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我就寫了兩篇文章，預測其城市經濟改革之後果（此兩文發表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中國之春」第十八期上）。十分不幸的是，一些關鍵的問題被我言中。

比如，我在文中指出，城市經濟改革之後，必然導致急劇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經濟犯罪。我還警告，必須「汲取南兩國的教訓」。我甚至詳述了南斯拉夫經濟改革的各種弊病，其中，第一條就是「盈利的企業不願擴充，只願多得多分，照顧眼前利益，如增加住宅建築等。」我問鄧小平等領導人：「中國現在決定要走摻雜著南斯拉夫模式因素的匈牙利道路了，南甸的現有弊病，又如何避免呢？」

現在，結論已經做出：照著中共原有的方案走，住宅投資膨脹和通貨膨脹是無法避免的。那麼，有沒有更好的方案呢？有的。當時，我就在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是所有制問題」，「只有保障私有產權，允許私有制、集體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和公私合營體制等多元經濟體制自由競爭，才能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才能造成經濟的快速起飛。」

在城市經濟改革遭受重大挫折的一年多之後（即今年五月份），「人民日報」等官方的公開發表，才允許發表有關呼籲改革所有制的文章（如北大厲以寧教授指出，經濟改革的關鍵不是價格改革，而是所有制改革）。試想

，如果一年多之前，中國大陸有言論自由而允許「中國之春」出版發行，所有制的改革可能早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國內的青年改革家們，也早就向中共當權者們提出過改革所有制的建議。然而，視私有制為萬惡之源的中共保守派們，怎能接受？

我們這些公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事先就預見到，不變革所有制的改革不會有好結果，從而向北京當局出謀獻策，但換來的，竟是「叛國」和「破壞四化」的帽子！此時，真有「有心救國，無力回天」之感。

一收就死

改革措施一收，熱氣騰騰的景象立即變得死氣沉沉。

一收就「死」——這裏我想到兩件真正的死亡事件。其一，某些專業戶孵化了大批小雞，只要他們從銀行取到已經答應的貸款，就可以買到飼料，餵活小雞。但中央文件一卡，貸款完了，眼看著小雞一只只餓死。

而更不幸的是，甚至發生了死人事件。如四川省某銀行負責人，在接到中央立即停止貸款的緊急命令後，無法向他已經允諾的客戶交待，良心的譴責使他走上了絕路。至於清查海南汽車案而導致的自殺事件，就更不用多提了。

當然，一收就死的「死」，並不是指生命的喪失，而是指市場機制的扼殺。

「收」令下達後，大批基建工程下馬，半截的樓房到處可見；不少合同被迫撕毀；很多即將盈利的經濟項目（如剛才舉出的養雞例子）突然夭折；大批私人貿易公司（皮包公司）關門；獎金被卡；大批中轉貨物滯於中途……

接著，全國普遍出現怠工（個別地方罷工）的現象，人們的積極性受到挫傷。最為重要的是，中央政策的大幅轉變，大大地降低了政府的信譽，所謂「中央政策不變」的諾言，再也沒什麼人相信了。中共在這方面的損失，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難以彌補的。

在討論政策是否該收的時候，一派人士曾力主不收。因為，政策的搖擺會使群眾喪失對改革的信任感和信心，一旦產生這種心理，下次你再把「大米說成綠豆」，也無人相信了。可是，這派人的意見未被採納。今天，改革派領導人帶頭鼓吹政治體制改革，聲調不可謂不高，但群眾的響應却很冷淡，其經濟政策的擺動而失信於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為什麼改革一收會出現普遍性的怠工、甚至罷工？這是因為一收了之後，人們的經濟行為不是倒退到改革之初的一九八四年，而是幾乎倒退到四人幫時代。工人們的獎金被卡，住宅停建，再加上幹部特權造成的分配不均，他們怎能沒有怨氣？

損失超過五八年

大放大收造成的經濟損失是無法估量的。據計委和國家統計局內部人士透露，這次的經改躍進，其損失遠遠超過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七八年的洋躍進，損失總值至少在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以上。

損失是多方面的，包括：（一）類似辦小雞企業的關閉導致的直接損失；（二）大批貸款無法收回；（三）基建中途停工的浪費；（四）過度生產熱門產品造成的積壓；（五）進口狂潮中所引進的大批派不上用場的貴重儀器

，如數十萬台的電腦（中共官方未透露具體數字，但國家統計局有人估計最少有數十萬台。為處理這批電腦，當局不得不又將它們廉價返銷香港）；（六）各省外貿互相削價的損失；（七）撕毀合同的損失；等等。至於收縮政策之後怠工所造成的損失，便無法計算了。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暖氣片、炒菜鍋都被砸了煉成廢鐵，造成了經濟大損失，但幾噸廢鐵怎敵得上一台閒置電腦的損失？一九七八年華國鋒洋躍進時，盲目引進了幾項落伍設備，但比起這次進口狂潮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國營經濟一度呈現負增長

一九八五年初，中央急令緊縮之後，國營經濟一度呈現負增長，並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這是實施緊縮和調整政策後，在一段時間內難以避免的現象。田紀雲副總理最近講，從今年三月份開始，工業增長率呈現逐月上升趨勢。三月份之前呢？他沒有說。雖然官方公佈，今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四點九，但內行人在問：這個統計數字有沒有水份？這個「增長」，是由於國營企業的效率提高，還是由於個體和集體企業的發展？

耐人尋味的是，在人民日報八月六日公佈今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四點九的同時，香港出版、由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創辦的「鏡報」月刊，於八月十日出版的八月號上報導說：「今年上半年，大陸出現了嚴峻的社會經濟態勢。發展速度顯著呈現滯緩，工業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下降了十八點二個百分點：：：」（「鏡報」一九八六年八月號第八十七頁）。「鏡報」是否在有意糾正人民

日報的誤報，我們尚不得而知，但國營經濟（並非指工業總產值）呈現負增長，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有一點不容否認，自從外貿權重新收歸中央後，外匯存底已有回升。這是因為，政府實行外貿壟斷後，外商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情況下，不得不用高價來購買某些只有中國才出產的必需品。

導致經濟暫時負增長的主因是全國普遍性的怠工、投資銳減和資源耗竭等。

誰殺死了小雞？

巨大的經濟損失導致中共高層人士的爭論。用具體的例子來描述這種爭論，就是：誰殺死了小雞？

改革派中有人認為，收的政策殺死了小雞。如果繼續放下去，養雞者再貸到一筆款子，就可以買到飼料，剛孵出的小雞就不至於餓死。在經濟過熱發生後，他們曾主張以熱對熱，即不要使原有政策倒退，而是以制訂新政策，如提高銀行存款利率，制訂新的個人收入累進所得稅法等，來適應消費膨脹和通貨膨脹的新形勢。持這種觀點的人士認為，用飛機趕送鈔票的現象並不足懼，這是中國的銀行系統極不健全的必然現象。西方的銀行，量多面廣，觸角伸到城鎮和農村的各個角落，個人和企業隨時都能將現金存入銀行。另外，銀行的信譽系統已甚完備，支票和信用卡的普遍使用，代替了現金在市面上的流通。中國的情況不然，經濟剛開始活躍，銀行系統未跟上發展，市場貿易、人們外出只能攜帶大批現鈔，這是現鈔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他們建議，立即改革銀行制度，允許集體、甚至個人集資與辦信用社

等民間金融機構，開放民間資金市場。青年改革家們並提倡用勞動力市場開放、用企業股票化來改造所有制、制訂破產法等較為徹底的改革方法，使經濟改革渡過瓶頸階段。

中共高層的守舊派們，則認為小雞死亡是改革派的責任。他們振振有詞道：如果雞蛋不孵成小雞，現在還可以吃嘛！言下之意，是放鬆和改革導致了經濟損失。

黨內守舊派在改革出現混亂時的猖狂反撲是可想而知的。有人煽動：五八年大躍進出了問題，毛澤東被迫把權讓給劉少奇；七八年洋躍進出現了問題，華國鋒被迫把權交給鄧小平；這次經改大躍進出了這麼大問題，誰來承擔責任？的確，在經濟過度膨脹和進口狂潮的失控階段，鄧小平和趙紫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要沒有農業改革的成績做為資本，鄧小平和趙紫陽真可能頂不住了。

需要回答的是：是誰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經濟損失？誰是殺死小雞的元兇。

三個不怕

有兩個問題值得深思：

第一，自中共建國以來，有過數次城市經濟放權，為什麼每次都導致非生產性基建投資膨脹？

第二，農村經濟改革同樣是放權，為什麼農村沒有出現亂花錢的情況？

答案是：農村放權，放到了近乎私有制的程度——土地的使用權歸屬為個體。城市經濟放權，只放了小權，最根本的內涵——公有制並未改變。

人們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下的經濟行為是截然不同的，問題就這麼簡單！

在公有制下，出現了可怕的三個「不怕」。

一是工人不怕被解僱：企業留成多了，可供企業支配的錢多了，工人自然要求多發獎金，改善住房條件，增加福利待遇。而在私有制下，工廠是老板的，工人不可能要求太多，否則，老板請你走路，另僱新人。可是，在我們國家裏，「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保障了工人不受解僱的權利。工人拿不到高獎金，就不努力幹，廠長奈何他如何？為了刺激工人多幹活，廠長只好有求必應，濫發獎金。

二是企業不怕破產：廠長很快就會想通：反正工廠也不是自己的，何必那麼死心眼兒？何必與工人為敵？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攀比」心理的推動下，很快形成「工人要——廠長給——工人再要」的惡性循環，出現分光吃光的傾向。這就最要命的一點：廠長不怕企業虧損，不怕企業破產，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允許企業破產，企業虧損了，可坐吃國家的補貼！

三是外貿不怕虧本：外貿權下放後，各省各地區削價外銷，爭取外匯。他們不去計算成本，成本虧了有國家頂著；但是，賺了外匯，本單位就有留成，個人就會分到好處。試想，如果向外商拍賣的是你自己的產品，你能不計工本嗎？

銀行向外貸款也以同樣機理釀成膨脹：銀行不是自己的——垮掉與我無關（社會主義制度下也不允許銀行破產）——關係好的客戶有求必貸——基層銀行貸空——向上伸手——中央銀行加足馬力趕印鈔票……

為什麼基層銀行願意向外多貸款？因為，貸款多了，回收的利息錢就多，基層銀行就能多盈利、多留成，職工獎金也會增加。還是這

種心理在作祟：銀行虧了，由國家補，自己不受損失；銀行盈了，自己要分上一份兒。

於是，一夜之間，人們手裏有了鈔票，購買力大大超過了消費品的生產能力，消費膨脹，通貨膨脹隨之出現。

三個不怕，像三隻看不見的手，導演了這齣好戲。而這三隻手，是放權之後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軀體上生長出來的。結論已很明顯：或者中央完全統死，走回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老路；或者一放到底，放到私有制或近乎私有制的程度。半統半放，難免生亂。

現在，中央又統回去了，就好像癌症病人打開腹腔又關上一樣。

癌症如何根治？

診斷至此，病根已經查出：那就是過去我們自吹自擂的所謂「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俗稱大鍋飯制度。在經濟上，它具體表現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控制制度。前者造成企業不怕倒閉；後者造成工人不怕失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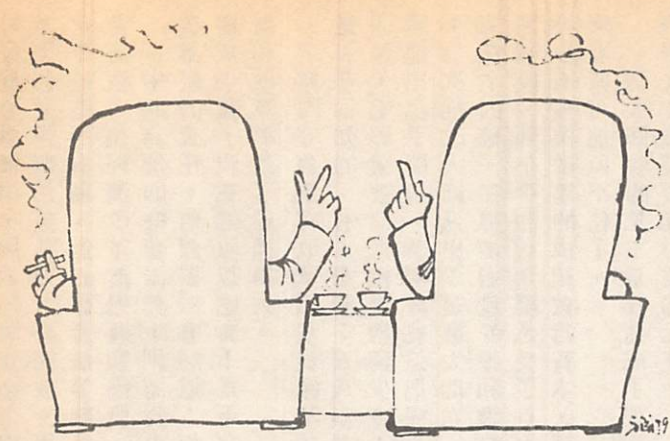
找出了病根，治療方案也就有了。

第一，一定要變革所有制。目前的國有制不行，變革成南斯拉夫式的職工集體所有制弊病也很多（見「中國之春」第十八期文章）。最好的辦法是轉變成私有制。當前，世界不少國家的政府在拋售國營企業，原因都差不多——很多國營企業成了政府的包袱（見「中國之春」第三十七期三十五頁）。中國政府向外出售國營企業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沒有大的私人財團。於是，趙紫陽的班子建議：先實行企業股票化。小型企業較好辦，鞍鋼、寶鋼等大型企業怎麼辦？有人主張可將企業的百分之一、甚或千分之一的股份賣出，爾後，企業交由

這部分股票持有人經營。儘管很多技術性問題尚待解決，但股票化的理論已被中共改革派所接納。

可喜的是，最近，瀋陽市開設了全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全國若干工廠也開始試發股票。當然，這些還處在試點階段。一旦將股票的發行予以政策化和法律化，經濟體制改革必將大大向前跨進一步。

第二，必須開放勞動力市場，即廠長有權解僱和招聘工人，允許勞動力流動。這是解決工人「不怕失業」的唯一有效辦法。勞動力市場一開，很多問題迎刃而解。比如，前面提到出租汽車（計程車）司機收入太高，則必然吸



國事閒談：我廠又虧了一百萬，你們呢？
兩百萬。

引很多人來開出租汽車，出租車一多，必會自動削價。

最近，國務院決定，各企業今後招工採合同工制。即：幹好了再續合同，幹不好請你走人。這是勞動力市場開放的第一個綠燈，值得重視。然而，今年新招收的合同工僅佔職工總數的極小部分，目前的狀況距離真正的勞動力開放還相差甚遠。

開放勞動力市場的政治價值在於，它將解除各單位黨委和政工人事部門對本單位職工的人身控制，恢復「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老傳統。在農村，人身控制已大為減少。一搞分田到戶，誰還買大隊黨支書的帳？所以說，一項經濟措施，有時可帶來巨大的政治效應。

第三，資金市場要繼續大大開放，即鼓勵私人或集體集資，開辦各種民間金融機構，如信用社、錢莊、搖會、甚至銀行。不打破現在銀行公有和壟斷的性質，一旦國營銀行放權而搞活經濟，信貸膨脹就不可避免。

第四，允許虧損的國營企業倒閉。七月份，瀋陽防爆器械廠正式宣告破產，開國營企業破產之先河。

第五，建立新的獨立的社會保險制度和機構。保險業，也是企業的一種。要鼓勵私人 and 集體合資與辦保險業，切忌由政府獨辦，以免再造一個大鍋飯制度。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允許企業破產和工人失業之後，迫在眉睫的任務。這方面的試點工作，正在深圳進行。

第六，外貿體制徹底改革，允許非官方企業直接與外商交易。

第七，上述改革措施必須賦予法律保證。你或許要問，共產黨這樣一改，不就放棄

共產主義了嗎？不就變質了嗎？是的，問題妙就妙在這裏，中共要自救，就要不斷更新，就要不斷非共產黨化，這就是我開頭講的由蛹變蛾的道理。以人類的智慧，何必拘泥於僵化過時的教條？機智的改革派可以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悄悄進行一系列變革，但要做得巧妙，就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了。

共產黨如果真正實行上述改革，可能會將中國由集權主義社會轉變為權威主義社會，類似於今天台灣的情況，即政治上一黨專政或一黨獨大，經濟上則實行自由經濟體制。

問題是，中共改革派有這種魄力嗎？

困難所在

必須承認，中共進行上述較為徹底的改革，困難是多重的。

首先，中共改革派要突破自身的意識形態限制，把「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原則，落實為「不管什麼所有制，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所有制」。

其次，中共改革派要排除高層保守派的干擾，要把陳雲一派的權力徹底架空。否則，國務院下達一個文件，陳雲的中央財經小組和紀委就要干擾你一次，政策還怎麼貫徹？下層各單位大大小小的陳雲式人物也要撤除，不然的話，改革派的廠長剛上台幹出點成績，就被黨委罷了官，改革當然無法進行。前些日子，中層改革者紛紛中箭落馬，就是某些基層黨官僚們動用了人事權的結果。大家都已注意到，中共改革派正在大造改革政治體制的輿論，他們想做的，就是用黨政分家的辦法，來排除從中央到地方的陳雲式人物的干擾。

第三，要給大批專職的黨政幹部安排出路

。勞動力市場一開放，各單位專職的黨政幹部就會變成多餘人員而面臨被裁除的危險。這批人拋入社會，會成為社會的重大負擔，因為，中國沒有西方民主國家那麼獨立而健全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制度與機構。中國的特點是集權式分工不細的社會。各單位都是一個小集權社區，職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傷統統都管，職工退了休，有事還是找原單位。政工幹部被解僱後，如果仍由原單位包下來，等於沒有真正被解僱。拋入社會，社會又一時承受不起。他們失業後，生活無保障，政治特權又喪失殆盡，其社會行為將不同於從來就沒有工作的待業青年——他們會走上造反的道路。

可以說，這是中外歷次改良運動所碰到的最頭痛的問題。與革命（推翻原來的統治階級）不同，改良是一部分統治階級解除另一部分統治階級特權的活動。古今中外常用的策略是，用經濟利益贖買其政治權力。

如秦始皇用河南封地，換取了呂不韋的宮庭權力；日本明治天皇也用類似方法，巧妙地將幕府、武士的政治權力剝奪下來。

如果不把原來的特權階層份子的出路安排好，他們必然會拚死反撲。光緒皇帝和康有為、譚嗣同等，在短短的一百天之內，就撤除了清廷的大批臃腫機構，解除了衆多官僚的特權（包括經濟特權），以至於老官僚們嘆道：「下月我們府上到哪裏去領銀子？」光緒甚至動員八旗子弟（滿人貴族）遷出北京，自謀生路。利害關係趨使這些人聚集在慈禧周圍，進行反攻倒算。

蘇聯赫魯曉夫下台也是一例。赫富於理想主義色彩，進行了某些政治改革，結果，損害了大批舊官僚的特權利益。舊官僚集團擁出勃列日涅夫，罷了赫的官。

美國歷史上也有類似例子。早期，有的美國總統被前任官僚刺殺，與前任官僚被解僱後丟掉飯碗有關。後來，美國國會立法，規定政府的職業官僚（注意不是長官）不能因行政首長的更換而被隨意解職（政府長官則由新總統任命）。

我舉這些例子，在於說明，清除阻礙進步的特權階級，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在共產黨國家，難度更大，因為，共產黨政權不能明目張膽地使用封地等大手筆的經濟贖買措施，鄧小平只能用「原薪、轎車、小別墅」的小手筆贖買政策，而且，由於國庫空虛，贖買的人數非常有限。

有沒有更為高明的策略呢？有的，那就是實行西班牙卡洛斯王子直接動員群眾、直接與人民群眾掛鉤的開放黨禁政策，用群眾的力量，而不是只用贖買、安撫的辦法，消除保守官僚階層的阻力。然而，現在我們還看不到鄧小平有這樣的政治膽識。

為了給大批職業黨政幹部提供出路，我們建議的辦法有：（一）政府給他們辦專業培訓班，並負責分配專業工作。這方面可藉鑑台灣安頓大批退伍軍人的經驗；（二）政府發給他們一筆離職費，並優先給他們貸款，鼓勵他們辦個體或集體企業；（三）暫時找不到工作的，要養起來，並向人民講明「給出路政策」的道理，等等。

共產黨歷來宣傳「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的理論，造成幹部能上不能下和唯權主義的單一出路結局，這大概是共產黨創始者們所始料不及的。在多元民主社會，官的出路也是多元的。不當官了，可以開公司，做教授，寫書，辦刊物等等。我們國家，也必須開創出路多元化的環境。

官商的意義

如何把黨政幹部從權力的寶座上請下來而又不使他們不阻礙經濟改革呢？其實，最高超的辦法是走「官商」路線。即：黨政幹部開公司、辦企業——使用特權賺些錢——由純官變為官商——再變為純商。形象一點說，局長的招牌換成董事長就是了。從政治上講，這是官僚的一條好出路，相當於變相的贖買政策。此法運用得當，可把整個官僚階層帶入經濟改革的漩渦，甚至使他們變為經濟改革的推動力。趙紫陽改革派集團可能會經意識到官商在政治上的價值，在改革初期，出現了大批以高幹為背景、以幹部子弟公開出面的皮包公司。按理，這是一個社會前進的徵兆。

提起官商，很多人恨之入骨。這是一種未能站在政治高度看問題的觀點。試想，局長發了財，他還能譴責普通群眾（民商）發財是資本主義嗎？他掉進經濟改革的蜜罐子，嚐到了甜頭，他還顯得上反對經濟改革嗎？是的，這裏面有「不公平」，是資本重新分配和積累的一種畸型形式，但總比英國當年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圈地運動，要少些殘酷吧！而且，發展下去，官商不見得賽得過民商。

在中共一元化的集權社會中，只有「權」字說了算。官商、民商繼續發展，「錢」字就開始講話了。當社會上「錢」能與「權」相抗衡時，社會結構已至少變成了兩元。

我們常聽到共產黨當權者批判什麼美國社會乃由大財團支配、錢決定選票、總統受大財團控制等等。這種偏見說明，他們根本未能理解，「錢」做為社會的一元，在多元社會結構中是有其意義的。如果一個社會中，「錢」不

能影響政治，而只有「權」才能決定一切，那麼，這個權力肯定是絕對的。「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化人」，這句名言，就是中共當今社會的寫照。實際上，美國社會中的決定因素是多元的：權力，金錢，學術、藝術和體育上的成就，新聞界，宗教界和工會等壓力團體，都有其政治影響力。球星可選為議員，演員可當上市長，都是例子。

在一九八四年，中國大陸官商剛剛興起時，我們就意識到了它的政治意義。一九八四年底，我曾撰寫「歷史的關鍵性轉折」一文，對官商做了如下分析：「這些官商結合的新公司將會獲得較快的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將形成新的經濟利益集團。……從長程看，官商結合的新經濟利益集團的出現，或許有助於中國政治權力的分散和多元趨勢。」（此文發表在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國之春」總廿一期上）。

中國民聯國內某支部出版的民刊「野草」，在一九八五年三月號和四月號，連續發表文章，肯定官商的政治意義（見「中國之春」一九八五年八月號轉載「野草」的文章）。

在當時，我們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並沒有點破「官商是把政治官僚帶入經濟改革漩渦的好方式」的命題。我們原以為，做為政治家，改革派首領應該是通曉這個命題的。點破了，反而會使黨內守舊派首領產生警覺。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官商勢如破竹向前發展時，個別改革派領導人竟帶頭抨擊「官商腐化了黨」，主張取締和打擊。這是政治上的短視！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官商與貪官污吏不同，後者應該懲辦。但

在法治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裏，兩者是以公正地加以區分的。以「人治」來定義和打擊貪官污吏，就會把官商一齊打掉。如果法律不健全，人們自然要鑽空子。在民主國家，鑽法律的空子，是律師的一項工作，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本領。法律漏洞太多，讓人鑽了空子，不能說人家違法，而應從完善法律著手。比如說，中央規定可以倒賣舊汽車，不可以倒賣新汽車。但是，舊車的定義是什麼？開了三天，不算舊車？海南島倒賣汽車案，就鑽了這方面的空子。結果，中央某些人不是首先檢查政策、法律不健全之處，反而怪罪下面「犯法」。請問，我倒賣的是開了三天的舊汽車，憑什麼犯法？文件規定不是可以倒賣舊汽車嗎？

「局長新裝」



在法律不健全的情況下進行經濟改革，一定會出現一段亂哄哄的時期。不要怕，不要動不動就發起一場又一場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重要的是，要盡快制訂相應的法律，讓人們賺錢時，有法可循，法院辦案時，有法可依。否則，永遠脫不出「我說了就是法」的人治現象，冤假錯案就會層出不窮。

中國有句名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要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叫人們不愛財，是辦不到的。前一階段，北京總是在打擊「君子愛財」上下功夫，發起一場場運動。錯了！重要的是要在「取之有道」上狠下功夫，這個道，就是法律，要使「君子們」遵循共同的法規，去玩賺錢的遊戲。這是保障經濟改革順利向前的重要觀念。

農村包圍城市

經濟改革可分為兩個戰場：一是對原有國營企業的改造；二是新企業的建立和發展。前面，我們分析的主要是第一戰場。現在談談第二個戰場。

如果改革派們真的實行國營企業（或它的股份）向民間拍賣的政策，即刻出現的問題是：國內誰能買得起呢？這就涉及到私人和集體企業的建立和發展問題。

將一座古老的宮殿翻修成現代化的大廈，是非常麻煩和困難的。然而，在一塊空地上修建一座新樓，却較為容易。這個比喻的意思是，倘若還沒有找出好辦法去改造原有的國營企業，我們不妨將注意力移向第二戰場上——發展新的私有和集體企業。

最明智的辦法是，不但不要給私人和集體合股企業設立太多的限制，反而要給予各種優惠，讓它們平地起高樓，發展起來。鄉鎮中，

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大批個體或集體合資企業（包括金融機構），就是將來私人或合股大財團的胚胎，應備加愛護，令其盡快發展。為達此目的，應盡快加強相應的立法工作，即落實前面所說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觀念。

今年六月十八日，鄧小平在人大會堂以近乎接見外國元首的規格，接見了在北京團聚的榮毅仁家族，指出：「榮氏家族對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做出了很大貢獻，是有功的。」既然鄧小平這樣讚賞老資本家，就沒有道理不允許中國大陸出新資本家，出新的「榮氏家族」式的私人財團。對北京領導人來說，急迫的任務不是去拉攏過去被中共逼出海外的華人資本家，而是自己培養出新的私人大財團。

鄉鎮個體及合股企業（包括金融業）的發展，或以鯨吞的形式收購整個國營企業，或以蠶食的方法購買國營企業的股票，以對原國營企業進行質的改造。這種形勢，有的青年民主派稱之為「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

實際上，改造原國有企業的第一戰場和發展鄉鎮非國有企業的第二戰場，應該是相輔相成、交錯進行的。

必須再次指出，這一切設計的實現，都基於四個前提：一是中共高層的意識形態要徹底轉變；二是中共高層改革派要從保守派手中進一步奪取權力；三是中共高層改革派要實施民主、發動群眾的力量；四是要實行法治。

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法律改革，應該協調進行，這是中國民聯和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一貫主張。現在，中共高層改革派終於開始

鼓動政治改革了，我們肯定這一重要進展。

如果分析透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及碰到的問題，就不難理解中共改革派提倡政治改革的原因。

很多中層改革者（從地方企業的廠長到省級負責人），在幹出成績之後，竟被同級或上級黨委，或被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揪住帳目或生活作風上的一些小問題，撤職罷官。中共高層改革派為保護這些人，不但要撤除黨委對企業的生產干涉，還要取消黨委對企業的人事干涉。這就涉及到了黨政分家、政企分家的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共高層改革派通過國務院下達的經濟決策，不應被陳雲的中央財經小組和中紀委橫加干涉。要保障這點，中央高層各機構的權責，就必須明確界定。這是高層政治結構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切政治改革，歸根結底，都是權力的重新劃分。向守舊派奪取更多的政治權力，是中共改革派提倡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目標。

中共明年即將召開十三大，在這之前，要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幾個重大的權力轉移和權力重新分配的問題，擺在中共面前：

- 一、趙紫陽的總理繼承人問題；
- 二、鄧小平的軍委主席繼承人問題；
- 三、陳雲的中紀委主任繼承人問題；
- 四、彭真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繼承人問題；
- 五、胡耀邦的總書記繼承人問題，等等。

除第五項較為明朗——胡啓立接班——之外，其餘都在未定之天。

改革派如果在這二次重要會議上，不但不能鞏固和發展自己的權力，反而喪失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權力，那麼，經濟改革也就真正的壽

終正寢了。改革派在前段經濟改革中，已被保守派抓住了很多辮子。他們若想在十三大的權力角逐中，穩操勝券，就必須幹出一番政績。在此形勢下，嘗試政治體制改革，以爭取民眾的支持；在政治改革的基礎上再進行經濟上的下一輪放權，以取得一、兩項顯赫的經濟成果，就自然成爲改革派希望做的事情了。

從改革看民運前途

在經濟改革「一放就亂、一亂就怕、一怕就收、一收就死」之後，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生死抉擇。

它或者逐步蛻變爲非共產黨：允許私有制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開放。這樣，中國人民將獲得重大的人身解放，民主運動將蓬勃興起，代表新經濟利益的政治集團將會出現。至於中共本身，也會在蛻變中獲得新生。

它或者抱著教條不放，僵死在城市經濟改革現階段的「一收就死」的困局之中。這樣，要求前進的人民群眾，終將尋求新的政治力量，取代中共而完成經濟和政治體制變革的歷史任務。

此外，還有第三條道路嗎？有的！那就是重複「放——亂——怕——收——死」的惡性循環，而每一次循環，都將削弱中共的控制力，在某一次循環的「致亂」階段，中共可能完全失控，社會處於大崩潰之中。此時，民主運動將做爲一支收拾亂局的政治力量而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

無論何種結局，民主運動都必須盡快聚集力量。我們應該體會到歷史的緊迫感了！

突破經濟改革的瓶頸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譚家琦

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自一九七八年醞釀生產責任制開始，至今已有一七、八年。毋庸置疑，改革取得了相當的成效。這概括地體現在近七、八年來國民經濟持續較高的增長率上。然而，當人們稍為深入地了解中國的經濟狀態時，就會感到，儘管已經實施和正在實施種種改革措施，但就整個社會來看，國民經濟仍然缺乏活力；社會經濟功能低下，市場機制不健全；企業缺少強有力的內在動力，經濟效益低；服務行業質量未見改善，官商作風依然嚴重；外貿逆差巨大，等等。這就促使人們提出這樣的疑問，經濟改革的瓶頸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經濟改革的回顧

為了認識經濟改革的瓶頸所在，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這些年改革所走過的路程。

農村經濟改革方面。迄今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生產責任制，經過幾年的演變最後穩定在「大包干」這一形式上，亦稱家庭承包制，其實質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生產責任制能夠取得

較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對土地以外的生產資料（包括大型農機具）擁有所有權，對土地在承包期內心理上視同己有；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具有高度的決策權，種什麼，種多少，經營什麼副業均可在較大幅度內作出選擇。生產責任制的特點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但土地與勞動者等條件緊密結合。在家庭承包制下，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只剩下空殼，它在經濟上無法得到具體實現，只具有一定的法律象徵——農民不准從事土地買賣。

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二步農村經濟改革，一方面注重於產業結構的調整，促使整個鄉村經濟更為多樣和活躍；另一方面則着眼於建立一個較為自由流暢的外部經濟環境，這包括取消統購統銷制度等一系列流通領域的改革。

城市經濟改革。迄今為止的城市經濟改革可歸納為下面五個方面。

一、所有制和經營方式的多樣化。在保持大中型企業公有制不變的條件下，將四萬多個國營商業和小企業轉為集體經營，將五千多個國營商業和小企業通過租賃等形式轉為集體所有，同時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全國持照的個體工商業已達一千二百萬戶。

二、對國營企業簡政放權，使得企業在生產計劃、產品銷售、價格、資金、人事、橫向聯合等方面有較大的自主權，把國營企業逐步變成相對獨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三、改革價格體制。

四、發展橫向經濟聯合，鼓勵地區、部門、企業、城鄉間實行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或合作。

五、對外經濟開放。

經濟改革表現在各個領域，還包括工資、勞動制度、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等等。

經濟改革的瓶頸所在

上述城鄉經濟改革在所有制方面造成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這樣一個格局。雖然這比以前的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兩權合一情況是一種進步，但這種分離也帶來若干難以克服的實際問題。

農村方面，最明顯的就是農民對土地的投資積極性不高，土地肥力普遍下降。工副業較為發達地區的農民對種田缺乏興趣，把土地當作一種「保險」而不願放棄，而一些種田能手想擴大經營規模而又無土地來源。這種情況導致適度經營規模的擴展過程十分緩慢，生產率難以進一步提高，一些地區的糧食生產出現停滯狀態，農業發展顯得後勁不足。

城市方面，已經實現了承包制等各項改革措施的企業，大都只顧眼前利益，對企業的長遠利益考慮較少。不少企業拼設備，不重視人才培養和技術改造，不重視企業聲譽，不重視產品質量；還有些企業則在偷稅漏稅上做文章。企業的領導人不論是上級任命的還是民主選

舉的，一切籌劃也多着眼於自己的承包期內。這種情形導致國營企業的活力仍然不强，產品質量上不去（國家經委每次抽查的產品不合格率均高達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成本高，經濟效益依然比較低。由此可見，導致所有權和經營權趨於分離的種種改革並沒有能徹底解決企業的內在發展動力問題。

對於上述這些出現的難題，幾年前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就有所預言，最近一個時期，要求在所有制方面作更大突破的呼聲也更為強烈。當然，中共具有較強改革意識的領導人和經濟專家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些。趙紫陽今年年初在會見西德著名經濟學家施奈德時曾詢問西德有沒有所有權同經營權分開的問題，並問這個問題是怎樣解決的。這說明中共領導人開始意識到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這一體制並沒有像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兩權分離那麼有效。但是，有兩個因素使得中共領導階層對所有權方面的根本突破持否定態度。

第一是政治上的考慮。私有制是與共產黨的宗旨，與「四個堅持」根本對立的。中共領導人一般認為進一步擴大私有制成份將有損共產黨的領導，甚至導致最終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一些領導者雖然有進一步擴大私有經濟的傾向，但因這個問題政治上過於敏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禁區，因而即使是在表達這種傾向時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以避違背「四個堅持」之嫌。

第二個原因是，中共領導人以及一部分經濟專家逐步形成了這樣一套設想，即只要在所有制結構方面放開一點，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共存，國營和集體經濟不足之處由個體經濟拾遺補缺；同時，通過承包制、利改稅、用工合同制、橫向聯合等措施為國營企業注入經濟活力

，通過建立和完善市場體系為國營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整個國民經濟就會活躍起來，並能持續地高速度發展。這種所謂體現中國特色的改革指導思想，比較集中地體現前不久通過的「七五」計劃之中。

誠然，利改稅等等都是很重要、很必要的改革措施。但必須看到這些改革與所有制方面的變革並不具有相互替代性。如果所有制這一瓶頸問題不能突破，利改稅等方面的改革要麼推不動，要麼效果會受到很大的限制，要麼相互間呈現出矛盾的局勢。價格體系改革的得失就是一個例子。由於不願意在所有制這個問題上有大的突破，中共對利改稅這一類改革就總

隨着企業自主權擴大工人的積極性可望提高。



是期望過高。先是把承包制、利改稅等改革看作經濟改革的靈丹妙藥，近來又稱橫向聯合是經濟改革的「突破口」。雖然這些改革（尤其是對企業簡政放權的改革）使得企業的一些潛在能量被釋放出來，因而在近期內將有顯著成效，但暫時被掩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矛盾終究要暴露出來，從長期來看，所有制方面的突破是不可避免的。

怎樣突破經濟改革的瓶頸

首先應該看到，在經過城鄉一系列改革之後，在所有制方面作進一步突破的條件已趨成熟。當然，對於今日之中國來說，這一變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非常複雜。可以說，這是目前中國社會科學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而又艱難的系統工程，筆者提出一些初步的設想，作為引玉之磚。

城市工商業可以考慮以下一些方式。

一、將固定資產不大的國營、集體商業和小企業更多地以租賃或轉讓等形式轉交給個體經營，一定年限後折價歸個人所有。之所以要在一定年限後折價歸個人，是因為要讓經營者有一個資金積累的過程。

二、大中小型國營企業股份化。這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由國家、地方、企業職工及民間等共同認股，企業由這些股東共同所有。在此階段，作為一種過渡，國家可以大股東的身份繼續下達一些指令性計劃。第二步，國家與地方逐步向民間出售所持有的企業股票。企業經營好，企業的期望收益高，不愁股票賣不出去。同時，國家與地方政府作為行政力量逐漸從企業的董事會退出，而管理者由董事會民主產生，企業過渡為在民間私有制基礎上經營權和所

有權相分離的經濟實體。

三、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如鐵路、航空、能源、電訊、電力等等採取公營但向民間發放股票的方法，這樣既便於籌集民間資金，儘快發展這些卡脖子的基礎工業，同時又可通過股票增加行業的經營責任感。待以後條件成熟，再逐步向私營轉化。

四、允許國外資本的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及國內的私人小企業通過發放股票或資產、技術入股等形式籌集資金，擴大再生產；允許通過發行股票組建新的工商企業。

這些設想的出發點，是想通過企業資本的股份化，為企業注入新的持久的經濟活力。由於三十多年來對商品經濟認識的局限，對於這樣一類的設想，人們難免有很多疑慮。主要的疑慮有：

一、股票由誰來買？這種疑問往往基於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即中國人都比較窮，那有錢來買股票呢？誠然，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是非常低的，但中國人儲蓄傾向（PROPERTYSAVING）很強，全國城鄉儲蓄存款超過一千六百億元（相當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去年僅城鎮居民儲蓄存款增加額就達二百五十億元。因此，如果大量發行股票，民間的購股潛力是很大的。

二、和銀行存款相比，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又有什麼優點呢？企業通過銀行獲得的貸款與通過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無論在性質上還是在付息方式上都有不同。最大的區別在於，人們把錢存入銀行，並不了解資金的去向和用途，而人們購買股票，則通過股東大會或股票買賣可表示自己對企業經營效益的關心，督促企業改善經營管理。

三、需要開放股票交易市場嗎？回答是十

分肯定的。如果允許股票的發行，就必須允許股票的貼現和買賣。否則，企業的期望收益和企業資本置換價值就得不到體現。

四、企業股份制度導致兩極分化嗎？首先，應該說兩極分化是模糊數學的一個範疇。經濟學常用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來表示收入的平均程度，但所謂兩極分化是無法用經濟學的一個系數來確定其界限的。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以後，雖然中共口口聲聲說並未導致兩極分化，但實際上農民收入的差距（INCOME DEVIATION）比過去大為擴大。當然不可否定，隨着私有經濟程度的提高，人們絕對收入水平的差距會有所擴大，但歸根結蒂，收入差距程度不應是衡量某項改革的唯一尺度，更重要的是要看整個社會效益和平均收入的高低。

當然，所謂兩極分化並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像印度那樣巨大的貧富不均應該盡量避免。對於今後可能出現的很大的收入懸殊，可以運用累進收入稅、消費稅及改善社會保險等來進行社會收入的再分配。

五、如果實行企業股份制，大中型企業仍將出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這和目前公有制基礎上的兩權分離又有什麼區別呢？區別將是很明顯的。首先，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一種必然趨勢。然後，不同所有制基礎上的這種分離，效果却大不一樣。看看西方發達國家的共同實踐，我們對不同所有制基礎上兩權分離的區別是不難理解的。

農村的所有制變革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土地問題，有二種基本的選擇。

1 一種是將耕地分為兩部分。口糧田歸農民所有，在特定的法律下允許買賣，其餘仍歸

集體所有，通過招標的形式向農民出租，向種田能手適度集中。

2 土地無償或折價歸戶，通過土地歸戶，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統一起來。

另外，村舍、荒山荒地、公共道路及水利設施等仍為公有，水利設施和荒山荒地可承包或出租給農民。

邊遠地區可先行土地私有的試驗，鼓勵人口密集區的農民向邊遠地區疏散。

二、鄉鎮工業。鼓勵戶辦和聯戶辦小企業。已具規模的鄉鎮企業可逐步通過租賃等形式轉為私有和私營，或者通過股份制由股東聯合經營。

上述有關城鄉所有制變革的種種構想都基於一個基本的思想，即所有制的變革是經濟改革的必由之路；這種變革必須分幾個階段逐步完成。

結束語

縱觀中國這幾年的經濟改革，所有制的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個體經濟有較大的擴展，國營、集體經濟依次向集體和個體經濟轉化。但這種質的變化又是十分有限的，所有制的問題已經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瓶頸。

從長遠戰略上看，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着兩種選擇。一種是堅持公有制，在城市通過擴大企業權限等方法刺激企業的經濟活力。宏觀上建立一個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參半的經濟格局，這在很大程度上將繼續保持政府對經濟的強大干預；在農村長時期地保持土地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通過延長土地承包期，對土地投資實行補償，鼓勵農民轉包責任田，以鄉鎮工

中國、台灣、香港和海外的專家、學者 濟濟一堂，共同探討中國當代 文學的創作和發展

(西德) 馬漢茂

業收入補貼農業等種種方法保持農業的持續發展。另一種選擇，是在所有制方面作更大的突破，充分發揮億萬經濟細胞的活力，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宏觀上，政府最大限度地減少直接行政干預，而通過完善經濟立法，完善稅收制度，通過財政和金融政策來對經濟進行調節和控制。這兩種戰略選擇上的取捨或有側重，對於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初中國經濟的發展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同時，所有制方面的變革對於促進中國政治法律制度的變革，對於促進中國社會的民主、法治、自由和多元，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最後，筆者想強調兩點。第一，我們在強調所有制變革重要性的同時，並不否定其他各項改革的意義。所有制方面的變革與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價格體系的改革）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又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同時，不能認為所有制方面的變革是一勞永逸的。所有制變革以後，其他有關的經濟政策必須不斷地調整和完善，否則所有制變革就難以充分奏效。第三世界一些國家土地改革以後農業並未被刺激起來就是明證。

第二，所有制的變革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需要一整套可行的政策，需要一系列法律做保障。這無論對於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法律工作者都是有意義的歷史課題。近幾月來，中國的政經和學術氣氛又趨寬鬆，學術界和文藝界都在熱烈討論一些素來有爭議的課題，醞釀着重要的突破。現在是對所有制這一類敏感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作深入討論的時候了。我們既不能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能只停留在「一二個口號」上。只有海內外民眾共同努力，集思廣益，敢於探索，敢於突破，中國的經濟改革才有望取得成就。

(全文完)

今年六月卅日到七月四日，已在慕尼黑附近、多瑙河畔的萊聖斯堡舉行由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亞、歐、美的作家、評論家和學者參加的國際性中國當代文學討論會。主要議題是「中國文學的大同意境」(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討論的中心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峽外華人的最新文學創作。這些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文學創作，也是外國讀者了解日新月異的當今中國社會的橋樑。

通過這次會議，我們可以看到，正如德國國家或英語國家的文學發展情況一樣，雖然歷史給不同語言的國家或地區造成許多局限，然而，中國文學作為一種統一的文化現象，其創作是跨越地理界限和政治影響的。

會議由聯邦德國研究協會 D F G (DEUTS 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資助，由波恩魯爾大學馬漢茂 (H. MARTIN) 教授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劉紹銘教授主辦，邀請了李昂、黃凡、陳映真、李之云、李陀、許覺民、張辛欣、楊煉和其它國家或地區的專家、學者共六十多人參加。會上的發言將用中、英文出版論文專輯。

中國廿世紀的文學在西方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歐美的漢學家們把她作為研究的課題，

爭相翻譯和介紹當代文學的作品，並且經常組織學術討論會。

在德國國家，尤其是聯邦德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當代文學是中國社會生活的寫照，學者們把她做為了解中國和台灣的橋樑，理應得到重視和正確的評價。目前，在聯邦德國主要有三家出版社翻譯出版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法蘭克福的蘇爾肯 (SÜHRKAMP) 出版社、慕尼黑的漢澤 (HANSER) 出版社，以及科隆的帝德里希斯 (DIEDERICH'S) 出版社。後者從八五年起，出版一套由魯爾大學馬漢茂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叢書，每年出三本：八五年出版了王蒙等著的「小小說」，馮驥才的「啊！巴金的「隨想錄」」；八六年五月出版張辛欣、桑擘的「北京人」，在西方引起很大的關注，並將在錢鍾書的生日紀念日出版他的「人、獸、鬼」，還將出版台灣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八七年計劃出版北島寫中年知識份子的作品「波動」，李昂的「殺夫」和選自「晚清小說」的集子「文明小史」。當然，研究和出版當代文學作品是有限的，出版社也有困難，一般發行量不超過五千冊。

文學的發展是同社會發展緊相聯的，西方的專家、學者正是這樣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辛勞地耕耘。

爲什麼中共的改革停滯不前？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高 楊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規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要進行多方面的改革以來，至今已七年多了。在這七年中，我們必須承認，農村的經濟改革已首戰告捷，儘管還有六千萬農民糧食不足、錢不多，但畢竟是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已解決了溫飽問題。勝利的原因並非因為經改政策如何英明偉大（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改革政策是英明的。如果不讓改革呢？）而是過去鄉村確實是太苦了，大鍋飯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已把農民搞得近乎絕望，使其喪失了任何進取的信心。這時，只要當政者高抬貴手，給農民些許喘息餘地，他們中多年積壓的熱情就會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勢迸發出來。但必須看到，此勢來得快，走得也快；鄉村的經改很快就會趨於飽和。因爲土地的面積是有限的，單產又總是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同時鄉村的專業戶、聯合體及鄉鎮企業，在城市的經改未突破前，限於產、供、銷上的種種問題，又很難進一步發展，所以對於農村的改革不能寄於過高希望，充其量它只不過是始於「包產到戶」，而又只限於「包產到戶」罷了。

真正的硬仗是在城市的經濟改革。在農村的改革中，只要土地包產到戶，農民馬上各自

爲戰，與政府、社會及現行制度的其它方面牽扯較少，所以只要他勤勞、頭腦活，自然收效快。但城市的經改却不然。經過建國後長達七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此後多年的苦心經營，城市經濟已形成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爲基礎幾乎是通盤計劃的經濟體系。這一體系與黨的組織和行政管理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對企業事業及所屬的幹部和群眾從思想、工作到日常生活，實施全面的控制和監督。由於黨政官僚機構的多重控制，加上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一個企業往往處於異常複雜的關係網中；這些關係縱橫交錯，盤根錯節，實有「牽一髮則動全身」之感，企業和個人幾乎是處於層層的枷鎖之中。所以城市的經改遠比農村的經改複雜得多。

中共根據「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總體構想，自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已批准了深圳等四個沿海城市爲「經濟特區」，開放了大連等十四個城市和海南島，並決定將長江三角洲等三個三角地帶爲「經濟開發區」，特別在一九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所有這些決定，以及其他陸續發出的規定，使城市經濟改革運動在大陸全面開展起來。但令人十分遺憾的是，城市改革實施後，效果極不理想。物價飛漲、市場混亂、黑市猖獗等現象十分嚴重；一些幹部乘改革之機以權謀私、貪污勒索、大發橫財；沿海開發區靠「內地輸血」賴以維持，出現混亂現象，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所有這些使中共領導深感頭痛，引起上下一片怨言，使人們對城市經改充滿疑慮。最苦的是廣大下層幹部和普通群眾，城市經改的甜頭尚未嚐到，但苦頭却吃了不少。在這種背景下，歷來主張經改要「穩步探索」、經濟成長要量力而行的陳雲「穩健派」，似乎在黨內佔上風；而以鄧、胡爲代表的「改革派」則暫時處於守勢，不得不宣佈改革暫緩進行。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城市經改本身的複雜性之外，尚有更爲深刻的原因。對這些原因不深入研究，並加以解決的話，城市經改可以說很難順利進行。

一、缺乏堅實的理论基礎

城市經改之所以不能順利進行，概括起來有如下幾方面原因：

中共在建國後數十年內，整天集中精力搞政治運動、抓路線鬭爭，從來也沒有認真地坐

下來研究一下經濟問題。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歲月，學術領域更是萬馬齊喑，經濟領域裡根本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來。就連那知名度很高的所謂黨內政治經濟學權威于光遠和孫冶方等人，前者也只發表些有關經濟問題的空洞講話和編寫了在體系上、內容上都與蘇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完全一樣的一兩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後者除提出「利潤掛帥」之類籠統的觀點之外，也沒有什麼突破。（當然，這也是必然的。很難想像在一個沒有政治民主的國家裡，會讓學者們自由地討論經濟問題。）真正的理論突破是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屆三中全會」兩次全會的決議。前者決定



國內一工廠宣傳報：吃大鍋飯搞不了社會主義。

「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要「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後者則進一步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經濟理論，提出了在城市進行經濟改革的方針和措施。兩次全會的精神和文件構成了當前中共改革的理論基礎。

但是，這兩次全會的許多論斷都缺乏堅實的理論作依據，既缺乏明確的理論指導，又缺乏大量的事實證明，因此大量的主觀直覺判斷甚至武斷，經不起仔細的推敲。例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是必然地要求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革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繫的環節和方面」。但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現階段是落後的生產關係與先進的生產力的矛盾，還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如果是前者，那就必然承認社會主義公有制落後了，它已不能適應當前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是後者，那就必然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搞早了，如果建國後不搞土地改革，不搞合作化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現在就會更好。但這兩點都是中共所不能承認的。因為承認前者，無異於承認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就是承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如果承認後者，將會導致否定中共建國後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長達七年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這段改造幾乎被中共認為是建國後唯一「幹

得不錯」的時候。中共現領導的意圖是，什麼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改革都可以不管，「反右鬥爭」、「三面紅旗」、「十年浩劫」等等災難的政治根源、思想根源都可以不顧，我們只要埋下頭來搞「四化」，「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就是了。但又覺得不提出些理論根據似乎不妥，於是就搞出一個籠統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矛盾之說，以為這樣做，既符合了馬列的教條，又適應了改革的需要。但這種說法由於缺乏對歷史的回顧和對政治的思考，所以顯得非常牽強。

改革的其他一些理論根據也都存在類似的問題。例如「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所提出的城市經改的幾個主要理論概念：「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建立合理價格體系」、「鼓勵合理消費」等等，都缺乏理論根據和事實論證。這些東西都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各方面專家，不受任何干擾地好好研究一下，總結建國後幾十年的經驗，比較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理論以及蘇聯、東歐的經濟實踐，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套確實可行的經改理論和方案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靠少數人偷偷地在搞，然後「大爆冷門」，又來「運動群眾」；彷彿只要武斷地在那些資本主義東西的詞彙前冠以「有計劃的」、「自覺的」、「合理的」等等形容詞，就變資本主義的東西為社會主義的了，一切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

理論基礎的薄弱從另一個例子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現在從上到下都在唱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高調，但如果問一下中共領導人「什麼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誰也回答不出，只能籠統地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對外開放，對內

搞活經濟」云云。但與其他國家一比，就可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並不是中國的首創。例如，對於南斯拉夫，這一政策早已執行多年了。所以，現在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為時過早，只有改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取得重大突破時，才能談得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缺乏長遠的改革規劃

由於中共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和意識形態改革相互脫節，以致沒有堅實的理论基礎，也可以說思想非常混亂，所以中共領導對改革的前途和步驟心裏無數。他們採取的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對了，繼續前進；不對，就退回來。」（鄧小平語）陳雲歷來主張步子不要邁得太大，「要摸著石頭過河」，「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而胡耀邦則更加明確地說：「有的同志問：能不能拿出一套什麼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成答案來？我們說，這種預先想好的一套現成的答案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的。我們只有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不斷地通過實踐來豐富我們的認識。」從中共核心人物的這些講話不難看出，他們對改革根本沒有長遠的規劃。因而在行動上就表現為「拆了東牆補西牆」，不斷地「捅婊子」，又不斷「補窟窿」；在政策上就表現為斷斷續續，時緊時鬆，忽左忽右。當然造成這種局面自然與中共黨內「小烏籠派」（主張「口子」開得小些，改革的步子邁得慢些）與「大烏籠派」（主張「口子」開得大些，改革的步子邁得快些）之間的鬥爭有關，但那是表面現象，實際上與整個黨對改革沒有明確認識，缺乏長遠的改革規劃和改革理論有密切關係。

當然，在處理複雜事物時，先小規模地搞試點，摸索經驗，然後大面積推廣，也不失為一種方法。但正如一句馬列主義名言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沒有系統的有關改革的理論，就不可能有系統的改革實踐。所以中共的改革其表現形式幾乎為「要花槍」，東扎一下，西扎一下，風風雨雨地有時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根本看不出「內在的邏輯」和「內在的連貫性」。有時群眾眼望著幹部，希望中層幹部拿主意，而中層幹部則眼巴巴地望著上面，等著上面下文件。而上面又反過來讓下面「拿出方案」。上下僵持著，誰也不動。上級領導往往敦促中層幹部：「改革不能再等了！」，而中層幹部又催促下級幹部：「改革不能再等了！」，下級幹部向群眾照本宣科：「改革不能再等了！」。但就是誰也拿不出方案，叫改革如何進行？有時工廠告到公司，請求「鬆綁」；而公司又告到局，請求「鬆綁」；市局又告到省局，也要「鬆綁」；省局再告到部，部再告到中央。究竟誰綁誰？實際上是你綁我，我綁你，大家都動不得。這都是由於沒有統一規劃，分工不清，改革工作不能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造成的。

廣大群眾根據多年的經驗，對中共政策的不穩定性深有體會。群眾講：「共產黨的政策就像小孩過『家家』，今天說這麼辦，明天馬上就會說那麼辦。」幹部們也說：「現在執行政策就好像趕火車。你趕上這班車，算你幸運。因為不知什麼時候政策又變了。」幹部和群眾的這種心理狀態嚴重地影響了改革的順利進行。一方面它動搖了幹部和群眾對改革的信心，另一方面由於一些單位在執行有關改革政策時有意時緊時鬆，人為地加劇了混亂。

三、缺乏堅強的領導核心

在當前中共改革中，由上至下缺乏一支堅強的、有事業心的、勇於改革的中堅骨幹力量，致使對改革的領導軟弱無力。

數十年來，中共已習慣於靠行政命令管理一切黨政事務，因此在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中「造就」了一大批奴隸性很重又官氣十足的人物。這些人物對上唯唯諾諾，唯上級的意志是從，整人、要權術有餘，但幹實事的本領不足。儘管這些人中許多現已退休或「退居二線」，失去了他們原有的特權，但他們的影響和組織路線仍然殘留著。新上任的幹部，雖說是比較「年富」，但往往並不是最富於改革精神的優秀青年幹部，因而不一定「力強」。這是由於中共當前普遍存在的「任人唯親」、缺乏民主選舉和群眾監督的幹部路線造成的。所以新幹部在其保守性方面並不見得亞於其前任。即使有一些青年幹部真能「脫穎而出」，高舉改革大旗，認真做一番事業，但在當前的體制和人際關係下，他往往也「壯志難酬」。他往往幹好了不是，幹不好也不是。上級的調查詢問，下面的流言蜚語，把他搞得焦頭爛額、窮於應付。根據中共報紙透露，許多在全國頗有名氣的青年改革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上級的調查了解和下面的流言誹謗。一些人心灰意冷甩挑子不幹，一些人被上級撤了職。更有甚者，還有一些幹部，由於經受不住金錢的誘惑，乾脆撕下了偽裝，與不法份子或外商沆瀣一氣，以權謀私，大發橫財。

當然，在以上幾種幹部中，嚴重違法亂紀的是少數，排除各方面干擾，大膽革新的幹部也是少數。大多數幹部都是經受不住各方面的

打擊，遵循著「中庸之道」的處世哲學，採取「推一下動一下」的策略，缺乏自覺的改革積極性。他們大都在著嚴重的保官思想，怕丟「烏紗帽」，對改革往往採取「一慢二看三通過」的原則。他們求穩怕亂，不敢冒尖。幹部的這種狀況也嚴重地妨礙了改革的進行。

四、缺乏有力的法律保證

中共多年來在「突出政治」、「加強黨的領導」的路線指導下，黨政不分，立法、執法、監督三職能彼此不分，由上而下的黨組織（即黨的負責人）包辦一切事務；判斷一個事情的對錯，唯以黨的負責人的態度為準繩。所以中共執行的是一條徹頭徹尾的「人治」路線而不是「法治」路線。群眾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只知「從命」，不知「守法」。大陸老百姓從活生生的現實中切身感到，權與法相比較，權大於法。所以，有權的人置法律於不顧，無權的人也企圖通過賄賂當權者而擺脫法的制裁。

大陸自執行經改政策以來，之所以經濟犯罪猖狂，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保證。現在突出的問題倒不是「無法可依」（當然也有這方面的問題），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自改革以來，大陸已公佈了企業法、勞動法、中外合資法、經濟特區條例、合同法、企業所得稅法等名目繁多的經濟法規。再加上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有關的刑法條例及有關的整頓黨風的文件和規定，法律和規定不可謂不多，懲處也不可謂不嚴。但有法是一回事兒，而是否嚴格執行是另一回事兒。由於存在著權大於法的現象，一些幹部就利用特權嚴重違法



城市裏的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宣傳欄

亂紀，而司法部門懾於權勢往往不敢過問，或乾脆同流合污。其他違法亂紀份子也在鑽「執法不嚴」的空子，或與當權者串通起來，大肆從事犯罪活動。當前幹部經商、幹部子女經商嚴重，歸根結底是權大於法和執法不嚴的問題。

在「對外開放」中所產生的問題也與無法保證有極大關係。特區的幹部與外商勾結起來，對有關規定陽奉陰違，合夥逃稅漏稅，私自增加外銷轉內銷產品的數量，然後坐地分贓。外商由於看到大陸的政策不穩定，特別是看到大陸無健全的法律保證，對長期投資信心不足，所以多投資於輕工、紡織、住宅、建築、觀光、旅遊等回收資本速度較快的行業，而且多輸入些過時或行將過時的設備，致使中共開放經濟特區的政策至今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五、缺乏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自覺支持

中共的農村改革一開始就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儘管也曾遭到一些慣於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鄉村幹部的反對，但在農民銳不可當的要求改革的熱潮衝擊下，真如螳臂擋車一般，最後連原來不願打破「大鍋飯」的鄉村幹部也嚐到了改革的甜頭。但當「包」字開始進城，改革涉足城市時，城市却表現出極大的惰性。這種惰性至今未消，而且有加重之勢，成為改革一大阻力。這種惰性固然來自全民所有制體制在城市根深蒂固，鐵飯碗穩如泰山，改革有巨大的複雜性，但另一方面則是來自城市廣大幹部和群眾缺乏自覺的改革熱忱。

數年前，當改革剛開始涉及城市時，大陸就風傳「陽梗阻」說。「陽梗阻」的意思是說中央一級領導熱望改革，普通老百姓盼著改革，唯中間廣大幹部按兵不動、無動於衷，是所謂「梗阻其間」，使上下不能暢通，致使一些中央領導高喊要動「大手術」。造成這種局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共多年來熱衷於搞政治運動，這些幹部可以說身經百戰，都是在政治運動的戰火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對「右」的東西非常敏感。本著「寧左勿右」的從政格言，他們對改革懷有疑慮，很怕以後會抓辮子、打棍子，所以一開始大多採取觀望態度。當然也有一些幹部對改革缺乏理解，加上沒有明確條文，一時感到無從入手。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一方面他們看到由於農貿市場的開放，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好處，另一方面，眼見農民富起來了，聯想到自己將來或許也會富起來，所以對改革普遍持歡迎態度。

經過幾年斷斷續續的改革實踐之後，中層幹部們的保守性方面並無多大改觀，大多數仍

然採取「推一下，動一下」的策略（這我們在上面已經論及），而下層幹部和群眾的態度却發生了極大變化，他們對改革慢慢由歡迎變為懷疑，由懷疑進而變成失望乃至憤懣。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這種態度實為當前改革之一大憂患。

這種情緒的變化絕非偶然。中共歷來實行的是低工資、低消費政策，廣大大下層幹部（包括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教職人員）和群眾的工資普遍偏低，生活是很艱苦的。他們迫切盼望著能長點工資，生活過得好一些。雖然中共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九年先後兩次決定較大規模地調資，但由於調資幅度不大，所長工資有限，也沒有解決多大問題。幹部們大多不能像工人那樣能拿到較多的獎金和加班費。他們眼見農民富裕起來了，城市的個體工商業者也富起來了，但生活用品和副食品，以及房租、電費、煤氣費等却一天比一天貴（有時成倍上漲），自己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倒下降了，因此對改革逐漸失望，有的開始罵爹罵娘了。

工人中情況也非常不平衡。除個別企業、個別工種的工人收入有較大提高外，大多數工人的收入並未見很明顯的改觀。有的屬於「關、停、并、轉」對象的企業的工人，收入反而有所下降。總之，單從工資收入上看，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收入趕不上物價之上漲，發財的是少數，大多數人並未見到改革的實惠。

再從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上看，隨著改革的繼續，城市的秩序開始混亂，社會風氣日趨腐敗。由於改革缺乏細緻的規劃和措施，各個方面不能統籌兼顧，從而不時出現混亂。另一方面，由於人們致富心切，社會上「一切向錢看」的風氣十分嚴重，人們總千方百計地利用機會撈票子，加上幹部以權謀私和執法不嚴等

現象，致使經濟犯罪、刑事犯罪和其他種種不正之風有增無減。這些混亂和墮落給改革投下了層層陰影，從一個側面動搖了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改革的信心。

由於以上幾方面的原因，城市的經改出師不利，中共對改革的一些作法和前途益發感到沒有把握，所以最近決定放慢改革速度。

當然，如果中共是想坐下來認真研究一下改革以來的得失，總結經驗，以利再戰，這未嘗不可。但我們必須指出，造成當前這種被動局面的根源並不在於「改革」。改革沒有錯，不改革是絕對沒有出路的。但關鍵在於怎麼改。改革絕對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如果「經濟改革」不與政治改革、思想意識形態改革、幹部體制的改革、文化改革等各方面協調進行，特別是沒有一個堅實的理论基礎指導改革的話，這個改革是絕對不會成功的。但中共現在有這樣一個理論基礎嗎？

回顧中共建國後幾十年的歷程，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感到寒心。在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鄧小平接見坦桑尼亞副總統阿里·哈桑·姆維尼時說：「建國後，我們搞土地改革，合作化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幹得很好。到了一九五七年，「左」的思想抬頭，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帶來了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很少。」但中共向沒問自己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哪裏？造成這種災難的政治根源、思想根源、社會根源是什麼？只有中共能正視這一問題，能勇敢地接受這一挑戰，並認真尋求保證以後不再重蹈舊轍的理論和方法，經濟改革才可望最終成功，中共對全國人民也算盡到了自己的一份責任。

●留學生新移民服務台●

關於H簽證問題

魏中民

有關H-3簽證的幾點說明：

H字頭的簽證共有四種，即H-1、H-2、H-3、H-4，其中H-1簽證發給具有特殊才能的臨時工作人員，一般包括應聘赴美作短期工作的科技人員、藝術家、運動員及醫生等。H-2簽證發給受聘赴美作短期工作的勞工，其中以農場的季節工最為典型。H-3簽證則發給赴美接受短期業務訓練的人員。而H-4簽證則是發給前三種簽證的持有人的配偶的簽證。

這幾種簽證的性質相近，都是發給短期工作人員的，持簽證人（除H-4以外）都能在美國合法工作，得到收入。但這幾種簽證所允許的居留期限及延期手續都是各不相同的。其中H-3簽證的居留期限隨訓練項目的需要而定，一般不得超過兩年，延期極難獲准，因為入境前對訓練的期限已作了決定。持H-3簽證的人很難在美國找到該訓練計劃以外的就業機會，通常能在美國延長居留的方法是申請入學並申請簽證調整（ADJUSTMENT OF VISA STATUS）。但能否獲准，也不容易樂觀，因此，當事人最好能找到承辦過H-3簽證調整的移民律師，在律師的幫助下申請簽證調整。除此之外，就是申請政治庇護了，申請政治庇護是要有充分的理由及證據的。建議先讀一讀「中國之春」總第十六期上許東民律師的文章及本雜誌（總第三十八期）上轉載的美國聯邦移民及歸化局關於政治庇護的說明材料，然後再作決定。

三論官商

(國內民刊「野草」編輯) 張靜

編者按：中國民聯國內某市第五支部出版的民刊「野草」，一直未被當局查獲。今年已出版了三月號和六月號，並已轉給民聯總部。現本刊轉載三月號「野草」上刊登的「三論官商」和「權力價值之演變」兩文。「野草」的「一論官商」和「二論官商」二文，曾全文刊于「中國之春」月刊一九八五年八月號。

去年我們曾兩論官商，一論之時，官商正如雨後春筍，二論之時，正被寒風吹煞。我們當時是從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它將以何種可行的形式實現轉變這個角度去看待官商的；我們並不是從道德的角度，以平等合理的標準來看待此一問題的。所以我們曾冒犯眾怒，為官商辯護，認為它是從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在目前中國環境下可行而較快的一種方式之一。我們僅是在這一點上為官商叫好。因為這個問題不是合理和平等與否，而是是否承認這一客觀事實，以及與更僵化的公有制比較，誰好一些的問題。

後來的事實證明，禁止官商之風並沒有在根本上摧毀官商。這顯示了官商存在的生命力，說明它確是轉變公有制的可行形式之一。中

共中央、國務院二月四日發出關於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這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去年並未煞住官商的發展。

這次的規定很詳盡，有十大措施。對象一是黨委機關和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以及隸屬這些機關的事業單位；二是工會、共青團、婦聯、文聯、科協和各種協會、學會等群眾組織。此兩點，似乎對黨政機關限定得很詳盡廣泛，很難有漏網之魚，尤其是把工會等各種協會也包括在內。因前一段雖然正式黨政機關不能經商，但有很多官商則掛工會、婦聯及各種學會的招牌經商，現在似乎堵塞了這個漏洞。但漏洞仍然存在。因為，這個規定不包括僑聯、台聯等統戰單位，高幹子弟仍可鑽這個空子以統戰需要而經商。另外福利單位也不包括在內，像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所領導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便可名正言順地打著救濟和資助殘疾人的招牌辦公司和企業，還可在國際上樹立中國人道主義的形象，這兩點規定，是沒有權力可以限制。而只要開一個小漏洞，這個洞就會越來越大，最後規定的限制便會完全失去作用。去年的規定失效就是這個原因。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便是一個合法的避護所。這個避護所可廣集經商的幹部

子弟，越開越大，各個省市都有它的分會，光是北京市就下轄二十多個公司，而且一個招牌的公司，可以做幾十個招牌的眾多公司的生意。由此可見最新詳盡規定的實際效力了。

規定所限制的對象，除了機關外，還針對著(1)黨政機關的幹部、職工，包括退居二線的幹部。但有一個例外，即除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特殊批准外。(2)上述機關的離休、退休幹部不能在國營企業任職，如在非國營企業，必須在離休、退休滿兩年之後，且不能到原來機關管轄的行業中任職，且不再享受國家規定的離休、退休待遇。(3)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在黨政機關序列編制所屬事業單位工作的，一律不得離職經商、辦企業。不在單位工作的，不准利用領導幹部的影響和關係經商。這些規定看起來複雜和詳盡，實際上仍是漏洞百出。那句「除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批准」的例外，將為高幹子弟大開方便之門，他們幹的時候，不必經過申請批准，萬一出了事被查出，可以通過父輩的關係，列入這一特殊類而避過追究。有了這一藉口，他們便會有恃無恐；至於離休、退休幹部不能在所屬行業中任職，也是毫無作用的，凡是領導幹部在解放三十年來，大多調動過很多次工作，在不同部門都有下級，其影響力是無法定出一個範圍的。至於不能享受離休、退休待遇，更毫無阻止作用，經商所賺的錢，比這個待遇豐厚多了。而幹部子女，在事業單位工作的，儘管不許辭職，他們仍可用業餘時間去經商，一是他們的工作時間不會有多餘時間去經商，二是他們的工作時間不會有多餘時間去經商，二是他們的經商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要付出全部精力，他們的作用只是拿批文、指標，具體工作不用他們去做的。所以這個限制對他們也是毫無意義的。

如果說在限制方面，對黨政機關和幹部子

弟的說明是詳盡的話，則規定中有關懲罰的辦法，則是抽象空洞的。關鍵正是在懲罰上。只有懲罰才有煞住的效力，規定說：「對違反規定的，要嚴肅處理，非法所得，一律沒收」，「其中領導幹部要從重處理，觸犯刑律的，要依法懲處」。嚴肅只是形容詞，不是法律的語言。而首先要經過黨內和政府內長期的調查，在這個過程中，官官相護，極少會再送到司法單位去按刑律處置的，如果規定首先由檢察機關獨立調查，本單位不得過問，情況或許會好一些。

這個規定的第九條更游移不定，含糊不清，它寫道：「為安排青年就業開辦的勞動服務公司和鄉鎮、街道開辦的企業存在的問題，由有關部門組織力量調查研究，另作規定。」這又是另一個很大的漏洞。前一個漏洞是以政治（統戰和樹立國際形象）理由而開的，這個漏洞則是因經濟而無可奈何開的。國家無法吸收城鎮大量勞力就業，解決他們的生計，這是一條關係千千萬萬人謀生之路，絕不能夠封閉。而不能封閉漏洞就更大了。幹部及其子弟可以利用他們信得過的平民百姓開公司，自己在幕後操縱，而平民百姓沒有他們的關係也賺不了錢，故一定會聽命於他們。這種以個體戶或街道服務公司形式出現的公司，便可藏匿千千萬萬的官商，而且絕對查不出來。單是這一條已消解了規定對官商的殺傷力。

因此可以預言，儘管中央雷厲風行地要煞住黨政幹部經商的歪風，其效果與去年下半年的煞風一樣，效力是不大的。官商作為中國過渡時期的畸形現象，仍然會存在，它是一個客觀存在。

各種規定限制的煞風，對官商只是一種外力。外力是可以抵禦的，何況這種外力與官商

的產生，都是出於同一個根源，是同根結出的兩個果。同根生的兄弟又怎能不留情面地互相廝殺呢，只是具有互相牽制的作用而已。

官商的存在和發展，不會受煞風的外力阻擋，而還會繼續發展。因為官商產生的根植於共產黨權力結構的土壤，它是吸收這個權力結構的營養而發展的，雖然扼殺它的也是源於這個權力結構。這不矛盾，因這個權力結構是龐大多面的，它是由既矛盾又互相依賴的多個派別組成的。

官商可以說是共產黨的權力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特殊走向，它是權力商品化和資本化的一個具體形式。共產黨奪得政權後，它原是要把權力作為改造社會，將理想變為現實的強力工具，這個控制社會的權力在使用過程中，便開始兼享生活的特權。然而，生活的特權本身是消耗性的，不能繼續生利的，就像地主用地租作奢華的生活享受一樣。後來權力偷偷地走向社會市場作交換，從市場的後門走了進去，直到鄧小平實行開放和改革路線後，權力便直接走向市場，充當特殊的商品，或者充當資本的角色了。這是對共產黨絕大的諷刺，共產黨是憑權力去消滅資本的，但到頭來它自己又通過特殊途徑偷偷地變回資本。這種特殊的途徑就是官商。當官的當然不能公開以官職作買賣，像清末那樣，以錢買官，以官賺錢的方式太赤裸了，在現代的社會中是行不通的，於是他們先設下一些限制，如外匯、銀行貸款、物資的調撥、生產的安排、原料配給、進口批文、出口許可證等等，使得從事經濟活動必有求於他們，使他們有機可乘。因為如果沒有這些限制，人人都可以通過公平競爭得到，權力便沒有經濟價值了。當造成了這個價值後，還要通過交換才能實現這個價值，於是他們便通

過自己的妻子兒女、親戚親信，具體從事這種權力與金錢的交換。官商作為這個交換的中介，就是把權力變為金錢的轉換器。

官商在商業活動中不只是利用權力，還利用以往權力所換得的資本去經商。這樣官商的作用也慢慢發生變化，由開始的單純權力——金錢轉換器變成了真正的商業單位。雖然這個商業實體還部份地靠著權力的滋養，但已不是全部依靠權力。這樣它就為私有的確立盡了一點力。錢也從國家的庫房流到大小官商手中去。

如果國家把錢或資產較平均地給予每個人以後，讓他們在市場上公平競爭，就像解放初分田地那樣，但這種方式，現時的共產黨政權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財富像以往那樣集中在國家手裏，對我們根本沒有好處。這些財富可能像三面紅旗時那樣，會頃刻被浪費掉，或者慢慢地耗費。所以，我們唯有作出合理的選擇：讓它不合理地流到大大小小的官商手中。要明白官商的性質也是由權力——金錢轉換器，慢慢變成商業實體的，在商業活動中，就不得不遵守市場自由競爭法則，它只能在幾個社會商業活動的過程中，賺取一部分利潤。其它的利潤就由民間的商業單位賺取了。財富的一部分就由國家經官商而流入民間。

官商確實在煞風打擊之下仍然存在。我們預言它仍會發展，它的角色也在不斷地演變。我們只能分析它產生的根源，也即其生命之本——權力，粗略地預言其在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轉變中所起的作用。至於在發展過程中，其具體角色的演變，則有待它日後的發展，才能作出分析。我們只是就事實密切地注視著它，分析它，却不加道德價值的評判。（原載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六年三月號）

權力價值之演變

國內民刊《野草》編輯 肖平

(一)

中國共產黨經過幾十年出生入死的武裝鬥爭，終於在四九年奪取了統治中國的權力。這個權力的誕生也和資本來到世上一樣，每個毛孔都浸透著血腥。但權力開始運用之初，也還有它作為天真孩童的純良一面，雖然權力的腐化作用一開始就存在。解放軍進城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軍進城有某些相似之點，也發生過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大貪污案。但從總的來說，當時各級官員所使用的權力，大多是為了「替天行道」，即為著革命，為著理想，為著黨的路線政策，也即為公而使用的。暫且撇開這種為革命、為人民之舉是否真的為人民，是否真的為公，當時的權力起碼沒有作為商品而進入市場交換，而是按其權力大小，只得到個人和家庭的不同等級的生活享受。這些享受是與權力等級對應的。極少不對應的情況，即極少有以權謀私的情況出現。這時，權力等級與享受等級以一種固定比率成正比例。權力越大，享受越多，但很重要的一點比率是固定的。因為它不是放在自由市場中自由浮動。文革之初，人民反對的只是這種特權，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過大的特權。那時還沒有特權與財富的交換，人們反對的只是他們地主式或皇帝式的生活享受，而不是資本家式的享受。

(二)

權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腐化積聚。權力的使用發生了變化，權力進入了一個不公開的市場，即前門沒有開，只開後門的市場。七十年代以來，走後門成了一個最流行的名詞。人民在談論它，中央也下達文件制止走後門。可

見走後門已成了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一方面權力腐化的積累，已使權力突破了掌權者自身的使用範圍，進入了社會其他人的使用範圍。另一方面社會上由於打破了正常的生活軌道而有這種需要，才會產生市場。有這個市場，才會吸引權力從掌權者家裏走出。當所有青年學生都要上山下鄉，而要回城過正常生活和在國營單位從事鐵飯碗的工作，只有很窄的渠道，即參軍、升學、或頂替退休的父母。這極少的名額就使得直接或間接掌管這種權力的官員可以利用這種特權作交換，為自己謀利。這裏間接的權力是很廣泛的，只要你官大，就可通過部下或戰友關係，為自己或親戚的子女安排好的出路。這種作為交換的權力，可以換回當時缺乏的熱門物資，如單車、手錶或豬肉、雞蛋，也可換回一些服務，如為自己子女、親戚安排回城就業或升學的門路。任何熱門的職位都有大大小小的特權。例如醫生有開假條的特權，用公費醫療開補藥的特權，售貨員也有留貨物給熟人，以免排隊或買不到的特權。在四人幫時代，在反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口號下，在割私有制尾巴的口號下，自由市場的前門是封閉的，人們唯有偷偷地開後門。正是這個權力封閉前門，又是這一個權力為後門開路，這是那個混亂時代的怪現象。那時中央也樹立一些樣板，如大張聲勢反走後門。但走後門之風，依然故我，甚至越刮越烈，無法遏止。那時走後門以權謀私者，仍離不了接受生活品和服務，沒有金錢方面的大量佔有，而生活品的佔有其價值始終是有限的。

但是，為什麼這幾年走後門之風已大大減少呢？是不是以前中央反走後門的措施收到了效果呢？不是。反走後門時不但沒有遏止走後門之風，反而越刮越烈，中央不再提反走後門

之後，它反而自動停止了。這是因為鄧小平掌權後，社會恢復正常的軌道，參軍要打仗，服役完了或退伍後要回原地，不再有什麼誘人的可換長期飯碗的政治特權。升學不再靠推薦，而要靠自己考試的分數，城市下鄉的知青大多可以回城。更主要的是，自由市場的前門開啓了，謀生的門路寬廣了，不必爭著鑽入國營企業，個體戶也可掙大錢，於是後門就沒有價值了，也不需要利用權力去鑽。取消了這些謀生的限制，打開了市場的前門，走後門之風便自動停止了。所以，共產黨用政策對抗社會上普遍出現的現象是沒有用的，只有在制度上取消諸多限制，這些畸形現象才會自動消失，自由市場一開，便比派工作隊和搞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還靈。

(三)

權力腐化的積累越滾越大，它已不滿足在後門偷偷摸摸地起作用了，它要以昂然闊步的姿態從前門走進市場。因為市場的前門雖然開啓，但像火車站的入口那樣，仍有很多關卡，人們不能隨便闖入。雖然鄧小平推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改革政策，這種自由化的經濟政策為所有人都打開了發財致富的大門，但由於仍是在計劃經濟鳥籠中的開放，因此，還有很多限制，如外匯指標，進口物資的批文，出特區過省的放行條，緊俏物資的供應限制，資金的限制，銀行貸款的限制等等，並不是普通人能通過這些諸多的限制的。正是這種限制，便給權力一個更優越的機會。鼓勵人人發財致富，但權力混在其中，可以名正言順地去發財。因為對每個人而言，發財只是一種可能性，對萬事俱備的掌權者而言，發財就不僅是可能



謀生的門路寬了，不必再爭着鑽入國營企業。

而且是實在的現實性，於是趁著城市改革的機會，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紛紛組織公司，然後利用特權，取得銀行的貸款，取得進口批文、外匯指標，發放行條，利用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巨大差額，把進口物資轉銷國內市場，牟取暴利，或把國內緊俏的商品從產地轉到市場獲利。他們的發財是輕而易舉的，正是國家的制度和管制，造成他們發財。他們追求發財並沒有什麼不對，不對的是國家。它沒有對所有人給予同等的機會。權力在追求發財的商業活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但在商品市場，而且在資金市場中大顯身手，那種「權力入股」現象說明了權力已徹底商品化和資本化了。在深圳經濟特區的公司，都紛紛招請高幹子

(四)

權力由作為非商品化的生活特權，演變為準商品化的後門交易，直至商品化和資本化的前門市場交易，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演變之路。生活特權、走後門、官商和貪污，是權力腐化之路上的三個階段。在前兩個階段，主要是扮演政治角色，而在第三個階段，政治角色已模糊，經濟角色佔了主導，這也可說明政治價值的貶值和經濟價值的升值，這是一個好的趨向。

官商和貪污的撲滅，像走後門之風那樣，是不能靠黨領導的反不正之風運動就能奏效的。走後門之風之所以被遏止是由於取消了若干限制，（主要是政治的）。要使官商和貪污之風減退，也只能在制度上、經濟上取消各種限制。批文、指標沒有了價值，權力的作用便會消失，就像參軍和升學上權力作用的消失一樣。

要把權力引離腐化之路，唯有靠法治把權力限制在行政管理的職能範圍之內，並以獨立和有力的監察機構來監督權力有否逾越其界限，違者必依法懲處。（原載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六年三月號）

關於「中國式的

社會主義



(中國旅歐經濟學家)

雷萬牒

這篇文章是計劃做為一個較系統著述中的一項綱要 (RESUME)，目的在對中共在八〇年代所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做一觀察。

(一)「中國文化」之我見

自唐王朝崩潰之後，所謂的「中國文化」在一段長期的混亂狀態中發生了基本的質變，進入一個「內向趨進」(INTROVERTIC APPROACHING) 的歷史過程。原本見於漢唐時代的許多外向性質 (EXTRAVERT-RATES) 逐漸消失。迄今的「中國文化」，簡言之乃是一種由因果取向 (ASCRIPTI-

VE ORIENTATION) 的行為模式而形成塑成的社會運作方式；在此種社會運作方式之下，一切社會價值的判斷限囿於某一特定的形式範疇 (FORMALITY)；任何社會的成員，若竟超越此一先於彼而設定的形式範疇而欲關心於社會實際 (SOCIAL REALITY)，並企圖改善之者，必將受到有效的懲罰，而在消滅後被整合於此一形式格疇之中。儒家倫理的主要特徵是，它所關心的乃是社會成員是否對某一既定的形式格疇有所契合 (ACCORDS)，而非社會動態過程中的實際因素……諸如社會運作中目標達成的效率。使得儒家倫理成為社會「最高優序」(TOP PRIORITY) 價值的設定者，乃是

一套文官任用的「科舉制度」。

西方歷史學家不了解何以中國歷史上長久以來，文官任用的科舉制度不能對中國社會的改進有貢獻。這種似乎為一種「機會平等主義」的科舉制度，事實上正相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改進。因為這種制度的施用使得統治階級竭力鞏固儒家倫理——主要為兩大要素(1) 殊別主義 (PARTICULARISM) 與(2) 父權主義 (PATERNALISM)——教條的一元化支配性地位，結果使得一切知識的傳播過程無誤地完全成爲一種爲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這種體制有效地阻止了知識多元化的可能性，從而消滅了知識多元化對社會改進的潛在可能性動因。

中國傳統上社會生產力的低下，乃是根源於此。儒家倫理的支配體制形塑了一種「效率不關心」(EFFICIENCY INDIFFERENCE) 的社會運作方式；而中國共產黨在其建立政權之後並沒有改變此一方式；相反地，經由集體主義的扭曲，反而加強了這種「效率不關心」。他們在這一點上與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們沒有像布爾什維克那樣(在政權建立初期)「用福特主義 (FORDISM) 美國式的能率增進法，來訓練他們那遊惰成性的人民。」(註一)

(二)「社會主義」之我見

迄今「社會主義」在實際運作中施行的普遍不獲成功，乃是舉證了。一個經由某些主觀理念而設計出的制度硬體 (HARDWARE) 是無法改善取決於人性的突然面的社會運作方式的。尤其是，此種人性的突然面是由一組先設的、而既存社會文化複合結構 (COM-

PLANNING) 所包攝。

歷史顯示，在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社會主義」成爲一種革命的旗號，而後不可避免地成爲一種由官僚結構壟斷資源配置方式的主宰體制 (DOMINATING SYSTEM)；這種主宰體制將「社會主義」解釋爲一種反向於功績主義 (MERITOCRACY) 的「均等主義」 (EGALITARIANISM)。它必然異化，而使原本標明於消滅社會不公正的社會主義理念異化爲一種阻撓人們改善生活條件的制度結構。

因爲一套由官僚系統所主宰的指令經濟 (COMMAND ECONOMY) 制度，是不會提高社會對資源利用的效率的。在社會既存的先設殊多性 (HETEROGENEITY) 背景之下，一套由官僚系統所主宰的指令經濟體制，乃是對人類基本的生產誘因 (INGEN-FIVE) 之戕害。在這一點上，蘇聯布爾什維克在很早就接受了「技術官僚」 (TECH-NOCRAT) 的專業主義觀點，而中共則歷經了「毛體制」中無理性的唯心主義荒謬的過程。

列寧主義的主要缺點在於它不恰當地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可施用性 (FEASIBILITY) 予以一般化，且以強制實行的方式加諸於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但對世俗的衆人而言，「利他主義」 (ALTRUISM) 這種稀有的人性特質，並不會比利己主義來得可靠或有「用」 (註二) 社會成員間先設的殊多性並不因一套強制的制度硬體而改變。於是其結果是造成一套「效率不關心」的社會運作模式。

在社會的生產力發達到某一接近消費物資「無限豐富」 (UNLIMITED ABUNDANCE) 的高度 (譬如說，工業化五百年之

後) 之前，「社會主義」只能存在於兩種形式之下：

- (1) 思想家的夢幻。
- (2) 官僚體制主宰社會資源的藉口。

(三)「中國的社會主義」 之我見

「儒家倫理」原本只是中國東周時代諸多流行學派中的一個學派所提倡的一套價值系統；但不幸在歷史的過程中，歷代統治階級，發現經由泯除知識多元化可能性的科舉制度，使儒家倫理佔據一元化的絕對支配地位，是鞏固其封建統治的有效途徑。其主要的後果之一，是形塑了一個「效率不關心」的社會運作方式，而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的構成部分。

「社會主義」原本是法國大革命以後思想啓蒙時代的一種理念，目的在消滅社會的不公正，但「百多年之後經由共產黨「專制體制」實踐的結果，使這些標舉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成爲一種泯除人類生產誘因 (INCENTIVE) 的官僚支配的主宰體制；它同樣地，形塑了一種「效率不關心」的社會運作方式。

因此中共政權的建立並沒有在基本上改變中國傳統上「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經濟結構，並沒有提供足以解除中國之所以有「生產力不發達」此一癥結的制度。

因此筆者認爲哈佛大學的杜維明先生將中共的體制歸納爲「政治化的儒家」體制，乃是一項十分恰當的論點。

兩項論題的補充

下面，我對上面的二個命題做些補充。

如果羅素 (BERTRAND RUSSELL)，本世紀經驗主義哲學的開創者之一，曾於本世紀初赴北京大學訪問講學，從倫敦的墓園中復活，再次訪問中國的話，他會發現他曾在本世紀初所描繪的那些中國社會運作的方式，並不會有過什麼基本上的改變。

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效率不關心」的社會。

那麼我試圖探討一下此一「效率不關心」現象的根源，對於了解歷史的動向，或許是有益的：

(一)「效率不關心」的文化根源

儒家化了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是將社會行爲方式的倫理含意做自我禁錮式的設定，而形塑出一套作繭自縛的價值判斷的可欲 (DESIRABLE) 法則；這一套「價值的可欲法則」 (譬如說「忠」——對既有秩序的無條件認同，排斥用理性來檢視既有秩序或勢力的正當性) 是站立在另一個與之相對的生存態度的反對面，與之相對的生存態度是：面對客觀世界廣潤的多樣可能性，做「效用增進」 (UTILITY INCREMENT) 的理性開展。如此則逃避了面對客觀世界多樣可能性時所潛在產生的抉擇境況——同時也泯除了文化系統本身在多樣可能性中心的轉化 (TRANSFORM) 能力。(這就解釋了，何以當客觀世界的外在環境改變之時，外來的挑戰不能做爲一種向上轉化的反應動力，而是反彈式地強化了內部的自我禁錮性) 這種制度化的自我禁錮 (INSTITUTIONALIZED SELF-CONFINEMENT) 回饋地設定了文化社群思想領域的僵滯性質。既然是這樣

地一個反向於「效用增進的理性開展」的生存態度，那麼在社會行為的方式中，有關於目標達成的效率判準（CRITERIA）就被排除在社會成員價值優序（PRIORITY）的關心對象之外。（注三）

既然這樣的自我禁錮的文化所伴隨的是沒轉化能力的、封閉循環而非開展演進式的社會結構，那麼社會成員間所關心的行為取向，就不是如何「改進」（BETTERING）既存境況，而是無誤地將自己契合於一個先設的倫理形式格疇（或行為的可欲法則）之中，以便為既有秩序所接受並能夠被認可，分享那個靜態而不成長的社會的「經濟之餅」（ECONOMIC PIE），指社會利用自然資源所產出的營生物質條件。因此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中，只有如何去「分」那個不成長增大的靜態的經濟之餅，而沒有如何去「創造」、「改進」的思考脈絡。如何「分」？儒家的解決辦法是「按照等級秩序」，只要差等的層級間沒有「僭越」，社會資源的配置就不會有不穩定（UNSTABLE）的因素出現。於是，就必須避免客觀世界中所提供的資源配置過程的不穩定因素。將文化體系的倫理判準設定於某一特定的形式範疇之中，並使社會成員（在文化本能之下）的價值判斷做無可超越的、對既有秩序的認同。

韋伯（MAX WEBER）指出，相對於塑造近代歐洲文化與經濟演進成長的「責任倫理」（RESPONSIBILITY ETHIC）行為方式，乃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傳統社會以「身份倫理」（STATUS ETHIC）為基礎的行為方式。

「責任倫理」的社會行為方式是基於一種「目的理性」（GOAL-SEEKING RATIONALITY，德文原句 ZWECKRATIONAL）的生存態度，其所伴隨的是一種動態的、開展式的社會

經濟制度。而「身份倫理」的社會行為方式則是基於固守在某一先設條件（譬如說，社會資源的等級分配制度）上的價值可欲法則。其所伴隨的是一種靜態的、停滯性的社會經濟制度。

在中國傳統結構和「家長官僚體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之中，社群與國家的概念只不過是家長制（PATRIARCHALISM）的擴大，生活的基調不過是對既有秩序的適合。既然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是一種不具展開性的封閉循環（按照差等層級），那麼社會運作方式在目標達成方面的效率向度（DIMENSION）就完全不是一個有意義的關心對象。知識份子經由科學制度被納入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系統中，其知識並非朝向使社會結構合理化的方向；傳統的支配體制，因其有益於「被納入官僚系統」的知識份子，所以是不可被改革的。

MAX WEBER 在「基督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1905）——書中，將儒家倫理與基督新教倫理相比較，詮釋何以工業化與高生產力的經濟體制，不曾發生於儒家文化的中國，而產生在基督新教（PROTESTANT）文化的西歐。他詮釋，儒家倫理同印度教一般，都不提供「在現世行為的倫理中，一組汲汲營營的精力」（註四），儒家倫理強調對世界「本然」（AS IT IS）既有秩序的自我調適——而非改造——的那種生命態度，絕不可能產生出助長經濟活動的道德動力。反之，基督新教倫理認為藉着自身努力而對現世不完美境況的改造，是通向救贖（SALVATION）的路徑，這種意態與現世之間的緊張（TENSION），賦予社會成員基本的變化動力，其目標在於改進現世境況的經營驅力，成為現代資本主義較高生產力體制之所以形成的局部因果鏈（CAUSAL

CHAIN）。

（二）「效率不關心」的制度根源

自十九世紀期中，儒家化了的中國文化傳統受到了新穎的歐洲文明的挑戰，這並沒有引起中國對此一傳統做本質的反省，也就沒有因而衍生成功的回應（如日本那樣）。反之，經過了類如五四運動那樣的短暫的反省過程，中國人找到了一面新的旗幟來繼續推行那套原封未動的傳統社會行為模式。在中共及現今中國所推行的體制之中，中國傳統社會行為模式的那種低生產力的運作方式，在全世界其他高級文化都邁步在高生產力的社會經濟制度中之時，找到了一個被稱為「社會主義」的藉口而持續不變。

在馬克思歷史演化理論的原本脈絡中，「社會主義」是做為社會生產力（經過若干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達到某一高度（高於資本主義時期）而還不足以進入因「消費物質無限豐富」而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之時的一種中間狀態；因此（根據宋巴特 W. SOMBART）它只能是一種「超資本主義」（ABOVE-CAPITALISM，德文原句 ÜBER-KAPITALISMUS），而不是一種「反資本主義」（ANTI-CAPITALISM）的制度。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高生產力體制洗禮的非工業化國家，是沒有資格談什麼「社會主義」的。

但是列寧，在其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過程中，扭曲了此一理論脈絡，將「社會主義」的旗號插在生產力低的非工業化國家，企圖用「反資本主義」的制度來達成工業化目的。而迄

今號稱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皆為在其初仿效布爾什維克模式的不同版本，他們的共同特徵是：用黨官僚支配的「計劃體制」來取代市場制度，做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礎架構。其中的「東歐版本」早在十數年前就逐步地由「計劃體制」向「市場制度」轉變，而「中國版本」經過毛體制二十年左右的荒謬虛擲之後，才在世界其他文明國家皆已邁入資訊科技的「後工業」(POST-INDUSTRIAL)世紀的年代，開始調低官僚支配的計劃體制的比例，向「市場價值規律」讓步。

在生產力低下的社會經濟境況中，缺乏以市場制度做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礎架構；而將「社會主義」解釋為錘平能力差別的「均等主義」(EGALITARIANISM)，就製造了一個由官僚支配(美其名曰「計劃」)沒有生產誘因(INCENTIVE)、沒有效率向度的「匱乏的均等」局面。而在另一方面，等級制度以黨官僚支配體系的形式存在，決定著對這個「匱乏均等」範疇之外的社會資源的特權佔有享用，因此在宏大的「匱乏均等」層之上的領導層，必然不斷地走向以赤裸的權力鬥爭做為一種營生系統的「上層建築」。(UBERBAU)。

因此不論是對於「匱乏均等」層內的大眾，或對享有特權的領導層而言，社會生產的效率向度，都是與己無關的空洞名詞。

因此說，中共迄今所推行的體制，乃是為那傳統的、靜態的、停滯的生存態度的慣性持續，找到了一個被稱為「社會主義」的藉口。而這個被解釋為「均等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架構，又反饋地(IN FEED-BACK)強化了此靜態。中共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後所採的實用主義轉折，在基本上是試圖以導入市場機能

(或「商品流通體制」)的方式來改善這種均等主義制度而造成的「效率不關心」。此一試圖的結果已在數年之間證明了下列兩點：(1)它是有效的；(2)在整體制度結構的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其效果是有限的。(所謂「效果」是指對經濟體系的動態性與開展性所具有的正向作用)。

經驗現象顯示，拿具有相同的文化承襲，不同制度施用的例子來比較——譬如說東柏林和西柏林比，漢城和平壤比，香港和廣州比，台北和廈門比——都得到一致的結論：即，市場制度在經濟體系中所佔的比例與該經濟體系的效率水平成正比，非市場制度的比例則與效率水平成反比。

註一：出自奧地利裔管理學大師 P. F. DRUCKER，見「THE ESSENCE OF MANAGEMENT」(1957)
註二：見 LEONARD SILK：「THE

●文藝園地●

夢魘

孤子

我睜着眼，我在做夢。

我夢見我死了。幾個陌生的人給我穿上件黑色的衣服，然後把我放進一個白色的棺材裏，用封條封好，又釘在一個紅色的盒子裏。

我被送到了墓場。這裏是一片荒地，既沒有十字架也沒有墓碑，只有死人的碎骨和殘肉。我的棺材被放在潮濕的土地上，旁邊有一棵

註三：筆者在此，並非攻擊「儒家倫理」，而是攻擊使儒家倫理成為一元化的價值「最高優序」的那種體制。

註四：印度教倫理與儒家倫理是極不相同的，但他們也都不同於基督教(以喀爾文「CALVIN」教派為代表)倫理，在不提供動態的、展開性的世界觀方面，印度教與儒家是同屬一個範疇。



枯朽了的怪柳，粗大的樹身上刻着這樣幾個字：

「被拋棄者的墳墓」

躺在棺底，我越來越覺得蹊蹺，「為什麼我的屍體不被置於荒野，讓餓鷹們噬食，或是讓烏鴉們分享，而被好好的釘在棺材裏呢？」

這時，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一聲回答，聲音洪亮，幾乎震碎了我的殘魂。

他這樣說：「之所以這樣做，理由很簡單，為的是不但埋葬你的肉體，而且還要埋葬你的靈魂！」

我聽出來，這是地獄裏傳來的聲音……

告蘇聯同胞書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蘇聯《社會主義復興運動》

(中國旅美學界周晚成、王漢勤譯)

促中蘇改革 促國共民主

●編者短評●

這是一份在蘇聯秘密流傳的文件，估計有蘇聯較高階層改革派集團的背景。該文件在國內未獲官方新聞媒介報導，起草者將其交給了西方記者。今年七月十八日，英國衛報順利將一份厚達十七頁的原件副本轉出海外，並於七月廿二日獨家摘要發表。美國NBC駐蘇記者亦獲一份，但離境時被蘇聯官方截獲。本刊根據英國衛報，對其進行了摘譯。

該文件經西方傳播界的渲染後，在蘇

聯國內產生了進一步激盪。在中國大陸有生活體驗的人，在閱讀這份文件時，大概都有與文件起草者相同的感受。只不過中國大陸的情況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國力方面)可能較蘇聯更為嚴重。

我們要努力促成一種氣氛：敦促中蘇改革，敦促國共比民主。現在蘇聯在醞釀改革，台灣在促進民主，中國大陸不能再遲緩了。

一部分有機會看到客觀資料的蘇聯人對今天蘇聯的經濟狀況及到公元二千年的前景，對國內目前的及不久將來的政治情況，對蘇聯的國際地位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作了一個全面的分析。

分析的結果表明，我們的國家已到了深淵的邊緣，再進一步，我國與先進工業國家在經濟與科技上的距離將大到無法扭轉的地步。屆時，美蘇的軍事平衡將打破，而佔上風將是美國，對我國的軍事威脅將增加；蘇聯的國際地位也將進一步低落並淪為二流國家；隨着世界社會主義的崩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衝突將激化。鑒於這些異常嚴重的情況，我們決定發起一個「社會主義復興運動」。作為這個運動的第一步，我們呼籲蘇聯人民，注意以下的分析，討論這一系列可能帶來自由繁榮的經濟措施；從僵局中挽救我們的國家。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寫道：「蘇聯面臨着兩個選擇，一是滅亡，一是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

至今已近七十年，蘇聯仍然沒有趕上，更何況超過「先進國家」。蘇聯國民生產總值是美國的一半。在工業生產方面，年增長率自七十年代直線下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廿一%，在五十年、六十年代是十%，七十年代是五%，八十年代是二一三%)。而在同時期內，美國、歐洲共同體及日本的工業却在爆發式地增長。它們的年增長率分別是蘇聯的二一七倍，三一九倍以及二十三倍。蘇聯的經濟發展落後於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十至十五年。而且，差距正在不斷地加大。長此以往，蘇聯將淪為世界上的落後國家。

列寧說「資本主義終將被擊敗，因為社會主義將會創造一個新的更高的生產率」。在一

九六八年，蘇聯的工業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百分之五，農業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百分之五。

談到蘇聯的經濟落後，列寧舉例說，俄國的出口組成中，「殖民地」產品像糧食、木材、皮毛、礦產等佔主要地位。在八十年代，蘇聯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總值中八十五%是金屬，而機械、設備等出口總值，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停留在二%。尤其是，蘇聯從食和工業品的輸出國變成這類產品的主要輸入國。

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目前是逆差，全靠西方的信貸維持。蘇聯已經成爲今天世



蘇聯新領袖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呼籲改革。

界上一個主要的負債國。到一九八三年，它對資本主義國家負債是三百億美金，僅次於巴西和墨西哥，佔世界上第三位。預計到公元二〇〇〇年蘇聯的外債將增加六倍。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國家必須化費出口總值的七十五%來償還外債。

經濟學是管理經濟的一種藝術，蘇聯經濟管理的主要缺點就是經營不當，國家經濟體系的高層缺乏責任感，對職、工、農、科、技、藝人員的成績缺乏物質獎勵。

我們國家缺乏金屬，因爲幾乎三分之一的金屬被浪費了，而在個別情況下浪費達百分之七、八十。國家短缺糧食，而三〇%的糧食在收割時及運輸過程中損失了。其他農產品像馬鈴薯、水果等損失則超過六〇%。儘管蘇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森林，而國內仍缺乏木材及紙張；儘管蘇聯是世界上石油主要出產國家之一，而國家經濟仍然困於石油副產品的短缺。

蘇聯對礦產資源的浪費也是世界的首位。僅在過去十年間，天然氣的出口增加了三十倍，原油也大量的出口。有幾年間，黃金的年出口量達到三十萬噸，大量的其他原料，甚至包括許多戰略物資，都大量地出口了。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中，包括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位於末列。一個美國工人平均月入一〇〇〇盧布，而蘇聯工人平均月入是一八五盧布，低於美國五倍，而科技、文藝等工作人員以及軍人、政府官員等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低收入加上困難的生活條件使得人民生活更加貧乏。

基本食品像肉類、奶類、黃油及一些其他食品長時間的短缺，已經影響了人民尤其是幼兒的健康，並造成了一種緊張、不安的氣氛，

並迫使人民浪費他們的業餘時間，甚至工作時間去排隊購買食物。

在肉、奶、黃油、奶酪、蛋、糖這些基本食品方面，蘇聯的人均產值平均低於美國兩倍。在一九六八年，國家對多種食品的供應，採取限量，就像戰爭年代一樣。這是兒童死亡率增長的原因之一。

一批批食品從商店中消失，無休止地尋覓基本食品和一些日用品，迫使人民將他們的興趣限於尋找這類東西。使他們既無時間，又無精力去滿足精神文化生活。人類的尊嚴被摧殘。

鄉村農民，尤其是那些不屬國營農場或集體農莊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條件，與本世紀初沙俄時代的農夫沒什麼兩樣。

蘇聯的公共服務行業，根本不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甚至發展中的國家相比。日常服務行業，像食品供應站、銀行、衛生所等嚴重的短缺，致使排長隊變成蘇聯人民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低工資使男人女性化，他們無法在經濟上負擔家計，這種情況導致了對家庭、孩子的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惡劣影響。

男人無法負擔家庭的費用也導致女子的男性化。馬克思說，一個社會進步的程度，可以從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來衡量，蘇聯剛剛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停止女性從事重體力勞動。就是這樣一項小小的改變，要經過六十年才正式決定。何況目前仍是在紙上談兵。女子仍然繼續在工廠或公路修築上做着許多繁重而單調的、男子所不願作的體力勞動。

又由於男人無力養家，許多蘇聯女子被迫離開家庭和孩子，到工廠或辦公室尋找工作。但工作並不能把女性從家務、照顧丈夫和孩子

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許多問題，如兒童和少年犯罪，原因都是他們在家庭中缺乏照料，只好自己照料自己，從街頭上得到他們的社會教育。

在這種社會政治情況下，醉酒、酗酒、娼妓以及偷盜日益嚴重。蘇聯人的嗜酒，佔世界首位。平均每一個人，包括幼兒，每年消費十一升伏特加及酒精，是沙皇時代的十一十五倍。女性酗酒的問題也日益嚴重，導致先天缺陷嬰兒的出生率提高。

酒精深入我國人民的生活，已經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威脅着國家和人民的未來。

蘇聯社會的核心——家庭，已經嚴重崩潰。一九一三年時，離婚率是〇·四四%，一九六五年是一七·九四%，九七四年則是二八·五二%。自一九一三年以來，家庭的破壞率增加了五十九倍以上。

七十年代中，在最新科技的基礎上出現了一次新的工業技術革命。蘇聯政府低估了這些世界最新科學的發展對於經濟以及軍事力量的意義。蘇聯用在科學研究以及基本建設上的經費只有西方國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因而在科技上，蘇聯開始落後於西方國家，尤其是在對我國科技進步極為重要的若干領域，像生產過程的機械化、自動化，電腦行政管理，自動化體系的建立與多方面的使用，電腦技術的使用，電子光學、生物工程學、原子能的使用以及能源節省技術等，蘇聯的落後尤為嚴重。目前蘇聯在工業生產方面四十%的操作過程仍靠人力；自動化的程度不及美國的八分之一；蘇聯平均每一個原子能中心的能量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

蘇聯在科技上的落後已是事實，而人們也對此麻木了——彷彿用我國無限的自然資源來

換取現成的進口工業技術，甚至整座工廠就能解決國內的經濟困境。

蘇聯的領導人只顧眼前，全然不去考慮明天，國家、人民的未來。正如法國路易十五所說：「我死後天下一切都將毀滅。」而侍奉左右的朝臣全部驚異於他的智慧。歷史竟然在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時代重演了。

蘇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然而，蘇聯人民本來是無需付出那麼多的生命、物質的代價的。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一個病態的經濟體系，總是削弱國家的國際地位。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無間的兄弟聯盟。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領導地位的低落，是前所未有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聯盟，僅歷一代人就崩潰了。社會主義陣營拋棄了過去的許多盟國。諸如具有十億人口的中国、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北朝鮮等。而羅馬尼亞在經濟互助委員會國家中成了西方戰略中的「木馬」(註一)。

蘇聯共產黨不再被公認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工人運動的領袖，這個運動已經依國家區域而分裂。它們之間已無統一的世界觀或組織上的、黨派上的聯繫。

匈牙利、波蘭和東德目前仍忠於蘇聯，這是由於蘇聯的武裝部隊駐守在它們的領土上！有史以來第一次，蘇聯進軍阿富汗，進行一場不宣而戰的、無望的並且對國家、對軍隊都極不光彩的戰爭。

蘇聯對過去的殖民地，附屬國的外交政策也是失敗的。在印尼、埃及、阿爾及利亞、伊拉克等國，蘇聯投入了大量物資，却沒有得到任何經濟上或政治上的好處。

蘇聯的對外政策，未能防止北大西洋公約軍事集團，以及東、西方軍事侵略核心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首次遇到一系列國家，諸如日本、中國、西德等，公開對它的領土發表擁有主權的聲明。

蘇聯外交政策建立在對於世界緊張局勢錯誤認識的基礎上，蘇聯認為軍備競賽是緊張局勢的原因，因而提倡不切實際的全面裁軍。而實際上軍備競賽是世界緊張局勢的結果，並非原因。要實現全面裁軍，必須設法消除世界上緊張局勢的若干焦點。

國內經濟的持續衰落不振及人民生活水準的繼續下降表明，蘇聯現政府的政策，不能克服目前經濟制度的許多缺點：它限制人民勞動的積極性，剝奪社會主義成員的一切勞動成果，阻礙科學技術進步的道路；它促成說大話、吹牛皮、粉飾太平，製造低質量、甚至完全無用的產品，產生人為的赤字，生活必需品不合理的高價以及勞動生產率低下和鬆懈的行政紀律。

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是密切相關的，也就是說，經濟危機關係着社會主義國家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保障人權，通信、電話隱私以及結社自由。

日漸嚴重的政治危機影響着社會主義國家的根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

儘管我們反覆地聽到，蘇聯社會的問題，是由於人民缺乏主動性、紀律性和原則性；是由於部份人中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由於「某些地方、某些組織中」的官僚主義、官僚文、粉飾太平；或是由於「許多情況下」，行政機構工作上的不足；是由於經濟管理方法的粗陋；是由於基層組織的臃腫；是由於過份的

集中或分散——儘管這一切，却沒有人可以提出任何根本解決當前危機的方案。況且，提出這種方案的時機已經錯過。

爲了國家和人民，在此危急的時刻，採取緊急的、革命性的措施，重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實行必要的上層建築改革，把蘇聯社會從絕路上引導出來，使蘇聯在人民生活水平及公民權利方面，在農業及科學技術發展方面成爲其他國家的典範，恢復它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及工人運動中的權威，在國際上佔有一個強國應有的地位。

我們認爲應該採取的措施是：

政治方面

一、新聞自由：美國「水門事件」的醜聞，尼克森總統的辭職；西德 DERSPIEGEL 報紙的揭露以及西德外交部長的退職，日本「洛克希德」醜聞（註二），對田中首相的審判以及他的引退；法國在紐西蘭炸沉「綠色和平」國際組織的「彩虹勇士號」事件及法外交部長退職（註三），以及許多其它事例都證明新聞獨立於政府機關和當權政黨，使之可能在消滅腐敗，與違法事件的鬥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即使國家最高領導人違法也不例外。

新聞獨立於黨、政也將使它可能更有效地同個人犯罪作鬥爭。並且能更加深刻、全面地向蘇聯人民報導國外的生活，把一切消息迅速傳播到人民中去，使人民能客觀評價事件或國家和黨的幹部。

在一項有關新聞自由草案中，列寧寫道：「工農國家」承認新聞自由……按照每一個公民團體的人數相應供給適量的紙張及其它印刷用品。

二、停止迫害不同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的個人，保障言論的自由：現行的壓制制度，只



戈爾巴喬夫視察集體農莊，醞釀進行農村經濟改革。

能導致僞善、偏見、無原則的行爲以及卑恭屈膝的奴隸性。

蘇聯人民已經慣於過雙重標準的生活——在家裡、在朋友中，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主張和希望；但在官方場合、在會議上，他們必須作木偶，只能有官方的思想意識，只能說「正統」的話。從外交政策、意識形態的問題到褲子的寬窄，一概要背誦領導的指示。

言論的不自由迫使人民組織非法或半合法的政治和宗教團體，迫使重要的文化人士——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移居海外，並進行反蘇活動。更令政府不安的是，曾發生過有政治目的的武裝事件，甚至更有 KGB 高層人員投敵。

如果有言論及新聞自由，蘇聯將有一個較

健康的政治環境，人民將士氣高昂、政治團結，並培養出正確的愛國意識。而沒有言論與新聞自由，就不能表達正確的公衆意見。列寧說過：「沒有公衆意見，就談不上民主……。」

三、政治體制上保障更替性政治組織的建立：我國的一黨制是列寧爲在政治上體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建立的，目的是消滅舊社會的政治制度，鎮壓剝削階級的殘餘和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現在，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徹底的最後的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在國內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務，沒有必要再繼續下去。這種一黨制排斥了政治的多元原則。

在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的意志是通過一個政黨（或多黨聯合）的資產階級國家機構體現出來的。執政黨在同其它政黨（包括共產黨）競選中，提出一套最符合其階級利益的方案。在競選期間，它可以向人民宣傳它的方案及其正確性。競選獲勝以後，在當政時期，若不能實現它的諾言，那麼在下次競選時，統治階級就可能支持另一個政黨上台。

這種政黨替更和多黨競爭的制度，最大限度的保護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並爲其政治和經濟需要制訂最佳決策；它有助於爲國家和政黨的運作引入新的觀念，有助於國家機構避免萎靡、墮性、守舊、官僚主義、敷衍塞責和濫用特權的危殆。

爲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創造一個多黨制的局面，各政黨之間的競爭是爲了提出一個最符合我們的統治階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最高利益的方案以及爭取在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代表人民的權利。執政黨不但要對人民完全負責，而且要通過多黨制度、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在執行它的方案時受人民制約。

經濟方面

一、遵循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根據馬列主義關於經濟發展的學說，一切經濟活動，不管是哪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下的經濟活動，都有它不依人類意志而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些經濟規律，包括生產關係、分配關係、交換關係和消費關係等，都有其客觀性。對任何一種生產方式而言，這些規律都與數學、物理的定律一樣客觀存在。

所有制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並不能改變這些客觀的經濟規律，違反了經濟規律就會導致經濟的衰落與危機。在蘇聯，違反經濟規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斷然取消列寧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以及實行農村經濟的集體化。近年來，八〇%的集體農莊是虧損的，要靠國家補助來維持（僅一九八四年，就進口了五千萬噸糧食，佔全國糧食消費的四分之一）。而在服務行業及消費品的生產方面，蘇聯和最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差不多。

二、在自負盈虧基礎上，擴大企業的權利：對盈利企業，必須擴大它們的權利，同時縮減中央計劃的行政管理，將權力由中央下放給生產單位。一方面廣泛給予地方企業自主權，另一方面，加強它們對消費者以及裙帶企業的經濟責任。用經濟的手段刺激生產，對工人、幹部的酬勞都應與生產成績掛鉤。

三、在服務行業及消費品生產領域為個體或合作企業的發展提供條件：在列寧新經濟政策期間，個體企業曾在消費品的生產、服務業、飲食業等方面起過顯著作用。當時，由於開放私人經營，食品及生活必須品的供應會迅速、顯著地改善了。國家不但沒有投資，反而從這些私營機構取得稅收。

四、允許蘇聯人民為耕種向國家租用農業

機械和土地：收成的一部份作為租金交付國家，剩餘的農產品歸承租者，並在集市上自由買賣。美蘇農業生產的比較顯示，承租戶將大有可為。美國的單位產量是蘇聯的兩倍以上，而蘇聯生產一百公斤的小麥要投入的勞力是美國的七倍以上。承租制將提高農業產量，減少勞力，創造出一個個高產量的農場，最終將使蘇聯農業自足。不要忘記蘇聯現在必須進口糧食。

五、不干涉集體農莊的小塊私有土地，向城鎮居民出售閒置的農舍；農民出售小塊自留地上的產品可以顯著改善城市居民的食品供應，降低市場價格。

目前，農民自留地僅佔全國耕地的二%左右，但自留地生產的豬肉却達國營豬肉總數的二〇%，牛占三〇%以上，牛肉、牛奶平均也佔三〇%以上，水果佔三五%，蛋類佔四〇%，馬鈴薯佔六〇%，蔬菜佔七〇%。不僅如此，應當指出的是，國家對於這些個體生產，沒有任何補助，對生產者的勞動也不付任何報酬，因為沒有任何行政機構（諸如黨政委員會之類）去管理，國家也不須付出任何行政費用。

六、促進私人貿易：不充分利用私人貿易，包括集體合作經營的企業、土地承租者、小塊土地所有者，以及消費者等在集市上的買賣活動，就不可能充分發揮人民和社會主義政府機關的積極性。

按照我們的政治改革方案，黨政機關違反憲法將受到譴責；憲法規定的蘇聯公民權利，包括言論、新聞、政治和宗教活動的自由，將受到保障；司法將獲獨立；權力機關的責任制和彈劾制將獲得確立。

蘇聯社會主義復興運動呼籲全體蘇聯人民，不分年齡、性別、民族、社會地位或黨籍，

詳細閱讀這個方案，積極同你的家人、朋友、熟人、同事，討論這個方案；並且向全國報刊、雜誌、廣播電台以及電視台寄出你們的意見及建議。

蘇聯社會主義復興運動希望全國的公共傳播媒介，給予人民言論自由，盡一切可能廣泛傳播這個方案。希望蘇聯一切法律機構，維護並保障憲法規定的蘇聯人民的權利，對於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不要加以迫害。

這個方案一經蘇聯新聞界發表，蘇聯社會主義復興運動的領導人願意在中央電視台與人民見面，討論方案中所提出的各項問題。

「蘇聯社會主義復興運動」

（註）

(1) 木馬：典出希臘長詩「伊利亞特」。特洛伊之戰，雅典人用計潛藏士兵於特製大型木馬之中，送給特洛伊人。木馬進城之後士兵出來乘夜打開城門，雅典軍大勝。因此「木馬」有「滲透」或敵人奸細之意。

(2) 日本洛克希德醜聞：洛克希德是美國一家飛機公司名稱，為出賣噴氣式戰鬥機向日本首相田中行賄。此事被新聞界披露。

(3) 「彩虹勇士」號是國際和平組織「綠色和平」的旗艦，該組織以維護人類和平、健康生活為宗旨，保衛國際公共環境衛生反對各種污染、保衛生態平衡及稀有珍貴動物等。該組織曾多次以「彩虹勇士」號巡遊南極附近公海，阻止法國核爆試驗。在 HELDUS 任外交部長期間，他指使法國「保安」人員在紐西蘭秘密炸沉「彩虹勇士」號，船上工作人員因而犧牲，造成國際轟動事件。經法國新聞界努力調查，揭發全部法國「國防秘密」，迫使法國當局將其外交部長撤職。

對共產主義的分析 (上)

中國政論作家(香港) 李 玉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有一篇署名「鄧偉志」的文章，說道：「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要在建設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偉大實踐中接受檢驗，過時與否，要在那個時候回答。」

這是迄今為止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一篇最有突破性的言論。過去是不許懷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或基本原理的。誠然，鄧偉志接着作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有些基本原理是萬古長青的，在實現共產主義後，看來也不會消失。」

但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或者基本原理，不一定要在「建設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時候才能評述。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可以作出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也就可以同時在那個時候作出分析；其理論是否成立。即使當時能夠成立，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又是否仍然有效。某些理論科學，往往是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才能體現出其正確性。但任何正確的理論又是相對的，總有一天又會成爲不正確。所以一切正確的理論

都是暫時的。

馬克思認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並聲明，他的哲學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這樣一來，就把科學賦予一種政治色彩，能否保持客觀態度，就很有疑問了。

一、人類的理想史

「共產主義」，無疑是人類追求財富平等、人格平等的崇高理想的體現。

人類的理想從古就有，如神話中的各種理想，就是人的理想之一。但作爲財富平等、人格平等的理想，則產生於不平等的社會出現之後。

在世界上，財富和人格平等的思想，最早見於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的古印度迦羅衛國王子悉達多·喬營摩(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提出「衆生平等」的口號反對婆羅門的極端不平等的種姓制度。

以後的各種神學體系，如基督教、伊斯蘭

教等，莫不以「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爲號召。神學體系當然反映着彼時彼地的社會現實和人的意志。

作爲人文科學要求財富和人格平等的，則最早見於公元前五五——四七九年我國偉大的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丘的著述。

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窮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顛。」第一次提出財富平均及人格平等對國家的重要性。

又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謀而不貳，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大同篇」

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一個農業社會的財富平均、人格平等、相親相愛的綱領性的理想世界，頗有現代語言中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味道。此後東晉的陶淵明在他的「桃花源記」

中亦描繪出一幅相親相愛的田園樂理想圖畫。

每當社會大動盪、人民在水深火熱的時候，亦會有人以「平等」為號召率眾起義，如唐末農民領袖王仙芝與鹽商黃巢。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原為鹽商、屢考進士不能及第的黃巢，亦率眾響應王仙芝，自稱「衝天大保平均大將軍」。他們打着「均平」的旗號，號召農民用暴力推翻舊政權。此後王小波、李順亦打着「均貧富」的旗號。北宋末宋江、方臘則提出「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人格平等口號。南宋鍾相、楊么則提出「均貧富，等貴賤」作號召。太平天國亦提出「平等」口號，而且更具體地提出完整的綱領。

提出「廢除私有財產」的首推英國的莫爾(THOMAS MORE)。一五一六年他用拉丁文寫了一本「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島的既有益又有興趣的金書」(俗稱「烏托邦」)，第一次提出廢除私有制、實行土地公有，人人參加勞動以及計劃生產和分配，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社會理想。

意大利的康帕內拉(T. CAMPANELLA)，在一六〇二年獄中所寫的「太陽島」中，亦構想了一個沒有任何私有財產、人人參加社會勞動、每日工作四小時、按需統一分配的社會理想。

在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初期，由於自動機器的使用而使大批工人失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批評私有制度的呼聲更是高漲和普遍。如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等。摩萊里、巴貝夫更認為「共產主義是人的本性所固有」，「人類的天然因素只能是共產主義——平等和土地公有」。但他們提出改造社會的方案，是通過慈善的、感化資產階級的以及示範驗證等途徑來實現的。歐文本人是工廠主，他拿出自己

的錢來辦社會福利事業，並且到美國去試辦「共產主義新村」，起初大受人們歡迎，但當他的財產散盡之後，却沒有人再理睬他，他晚年的生活也很淒慘。這批社會正義人士，後來被馬克思指為「空想社會主義」或「空想共產主義」者。但對他們提出的各種社會主義設想，却大部份吸收進了他的學說中。

新興的資產階級也提出過不平等的口號，如法國就提出過「自由、平等、博愛」，但這是為爭得與封建貴族平等的地位。一旦資產階級站穩腳跟之後，却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而是製造了社會財富的極大不平等。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指出：「工廠、工場的存在正是一個階級的貧因為基礎的」。他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的矛盾，國家對社會各部份人都要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並且要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通過稅收和價格管制來進行調節，保證每個人有最起碼的生活水平，縮小極端的經濟不平等。(但他認為不平等的存在是必然的)，保護較弱的階級，使他們能夠生存下去，同時又使強者難於取得高額利潤。(參見「黑格爾政治和法哲學著作」第四九四——四九六頁)。

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出現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應該用暴力來推翻資產階級的不平等，而且通過龐大系統的理論闡述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而共產主義，又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型態，是最完全合理和最完美的社會。只有在這個時候，人類的自由、平等、博愛才能真正實現，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從上述的敘述我們可以發現：建立一個公平的合理的社會秩序或社會制度，是人類的普遍追求。

二、天生的不平等與道德理性

就自然界的本質來說，是天生的不平等或不平衡的。如自然界的植物，常常是動物的食料，因此在動物和植物之間，是不平等的。就動物而言，也是不平等的，弱的、小的動物又常常是強的、大的動物的食料，故大小動物或不同類的動物是不平等的。而一切植物或一切動物，又有被人類作為食料或者作其它用途的可能，因此人類與動物之間也是不平等的。就人類而言，也是天生的不平等或不平衡的。有的種族發展得快，有的種族發展得慢；即使在今天的太空時代，地球上仍然有近似原始人類的部落。

就同一種族而言，也是天生的不平等的，有的人天生在這方面聰明，有的天生在那方面遲鈍；有的強壯，有的弱小。

就同一家庭子女，也是天生的不平等或不平衡的，首先有先出生、後出生之分，其資質的聰愚、體質的強弱，以及後天的發育、社會影響也不盡相同。

就是學生子或學生女，儘管其外貌極其相似，但氣質、性格、體質也不盡相同。

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是絕對相同的。自然界的天生的不平等或不平衡，對於那些智者、強者自然是佔了便宜，其適應社會的程度，其發展的機會，較之愚者、弱者必然要多得多、大得多。因而總的來說，智者、強者所獲取的也就必然要比愚者、弱者多。

「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這是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只要是在這個地球上的生物，都離不開這條規律，人類亦不例外。

人類較之動物當然有更多的互助、合作性

，但競爭始終是主綫，即使互助或合作，也是以對自己或對自己家族、或者自己民族是否有利為前提。互利是互助的本質。

自然規律是殘酷的。其自然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兩極分化，一部份人成爲壓迫者，另一部份人則成爲被壓迫者。

近代的人道主義者，從道德理性出發，重新界定人的權利，肯定了「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生存權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否定「絕對專制主義」和一切特權，提供了一個「機會平等」的價值法則。但因為沒有限制競爭，很自然地又不免重覆「優勝劣敗」的規律。自由競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財富，但兩極分化不僅沒有稍減，反而大大加強了，連許多原先是自食其力者，也常常淪爲無產者。「弱者變得一無所有，只剩下一副頭腦和一雙手，以出賣自己的勞力才能維持生存。於是，旨在消除競爭，以計劃生產和計劃分配爲特徵的馬克思主義便產生了。

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它是在大工業出現初期勞力密集的產物。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都反映著那個時代的印記。

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 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有關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由五個基本理論組成的：

(1) 階級鬥爭理論

階級鬥爭這個概念，早在馬克思之前一世紀的西方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已經提及，但他們沒有把階級鬥爭看成是一個規律。

馬克思認爲階級鬥爭不是從來就有的，是

在一定歷史時期，即私有財產開始之後產生的。因而階級鬥爭也必將在一定歷史時期消失。「到目前爲止的一切人類文明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馬克思主義認爲在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毛澤東亦認爲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因此共產黨人認爲推動階級鬥爭的發展，就是推動人類歷史的發展。因而階級鬥爭便成爲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

在運用階級鬥爭規律於現實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爲，資產階級文明已囊括全世界，因此必須聯合全世界的無產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

階級鬥爭理論尙有許多副產品，如國家，馬克思主義認爲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就是資產階級鎮壓工人階級的機器。馬克思主義還認爲，民族鬥爭實質上也是階級鬥爭，宗教則是民族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表現，因而隨着階級的消滅，國家也就自行消亡，民族也自行消亡，「宗教則成爲多餘並使之消滅」(恩格斯語)。

(2) 剩餘價值理論

剩餘價值又叫剩餘勞動，來源於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但馬克思給予改造，認爲勞動有兩重性，一是具體勞動，產生具體價值(即使用價值)；一是抽象勞動，產生價值。而只有從各種不同的商品勞動通過市場交換轉化爲抽象勞動時，才能對勞動量(指勞動耗費的時間)作相互的比較，因而才能正確地計算勞動價值。

馬克思又從勞動價值發現了剩餘勞動。馬克思在解釋剩餘勞動時，說：假定六小時的平



瑞珂斷定尼采、馬克思、佛洛伊德是現代的三個「懷疑大師」。

均勞動量體現爲三先令，這三先令已足以維持這個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費用，這叫做「必要勞動」。而資本家如每天支付三先令給他，那麼就沒有剩餘。但資本家却叫他每天勞動十二小時，却仍然只給這位工人三先令，另六小時的勞動就是這個工人的「剩餘勞動」，這另六小時的剩餘勞動便無償地給資本家「剝削」去了。

又假定：十二小時的平均勞動量體現爲六先令，而只給工人三先令(六小時的勞動產品)。其次，如果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所耗去的原

料和機器損耗體現為廿四小時的平均勞動量，那麼，這些生產資料的價值就等於十二先令。這樣加起來，產品總額共為卅六小時的物化勞動，即等於十八先令。資本家就按十八先令把這個商品賣出，淨賺三先令的利潤。而這三先令，就是沒有支付任何等價勞動的工人多勞動的六小時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資本家的發財致富以及資本的積累，就是靠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而取得的。

恩格斯對馬克思這個剩餘價值理論評價很高，認為這是馬克思發現的資本家的「剝削秘密」，它同發現階級鬥爭規律一樣重要，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

這個剩餘價值規律又稱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剩餘價值理論則是「資本論」大部頭著作的主幹。

馬克思主義是通過剩餘價值理論來論證推翻資產階級的合理性的。

(3) 生產過剩危機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化的大生產和私人佔有的矛盾，造成了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這種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最後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恩格斯有一段具體的敘述：

大工業創造了像蒸汽機和其它機器那樣的工具，這些工具使工業生產在短時間內用不多的費用便無限制地增加起來。由於生產的擴展這樣容易，大工業的必然後果——自由競爭很快就達到十分劇烈的地步。大批資本家都投身於工業，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來了。工廠只好關門。廠主破產，工人挨餓。到處出現了可怕的貧困現象。不久之後，過剩的產品賣光了，工廠重新開工，工資提高了，生意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誰勝誰負？圖為里根與戈巴喬夫。

也漸漸地好起來。但這不會長久的，因為很快又會生產過多的商品，新的危機又會到來。這種新危機的發展過程和以前的危機完全相同。由此可見，從十九世紀初以來，工業經常在繁榮時期和危機時期之間波動。這樣的危機幾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就發生一次，它總是給工人帶來可怕的災難，激起普遍的革命義憤，並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了極大的危險。

大工業造成一種絕對必然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裡，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來領導。

競爭將被這個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

(4) 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自從私有制產生以來，歷代的改朝換代都是新的剝削階級代替舊的剝削階級。而資產階級，則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代的剝削階級。「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却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共產黨宣言」）恩格斯還認為「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歷來的枷鎖——包括把它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被驅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行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馬恩選集」第二卷第四七八頁）列寧也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第一塊基石」就是「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中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毛澤東更是說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最革命、最大公無私的階級。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最後的一次階級鬥爭，「國際歌」中的一句「這是最後的鬥爭」就是這個意思。鬥爭的結果必然是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

(5) 共產主義將首先在一切文明國家勝利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因為大工業已建立起世界市場，把全球各國都「彼此緊密地聯繫起來了」，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恩格斯語）。

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發展得較快或較慢，主要看這個國家的工業是否較發達，財富的積累是否較多，以及生產力水平是否較高。恩格斯認為英國的工業最發達，產業工人佔了全國

人口的大多數（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認為共產革命「在英國最快速最易」。

上述五條基本理論，是構成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最基本理論。

四、實現共產主義的方法和策略

恩格斯在他的「共產主義原理」中列出了十二條，後來在「共產黨宣言」中減縮為十條，但都是大同小異，歸納起來有如下幾條：

(1) 首先使無產階級上升為強有力的階級，用暴力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並對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2) 然後利用政權的力量，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財產，把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

(3) 實行土地國有制，並把銀行、信貸及全部礦山、森林和運輸業都集中到國家手裡。沒收流亡者和叛亂份子的財產，收歸國有。

(4) 制定統一計劃，按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和分配消除商品生產。

(5) 成立農業產業軍。

(6) 一切兒童實行免費教育。並參加勞動，實行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制度。

上述幾條基本內容又可稱為「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多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空想社會主義雖然有公有化、計劃化的種種構想，却獨缺暴力革命。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奪取自己的政治統治」。所以列寧說：暴力革命「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

關於「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或「全部社會成員佔有」問題，在蘇聯的實踐過程中，把它分為了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

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

關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組織形式，馬、恩並無預定的看法。但也可以從馬列理論中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有如下論述：「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實行奴隸般服役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關於「分工」和「全面發展」問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有一段敘述：「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教育可使年輕人很快就能夠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據社會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就會使他們擺脫現代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地發揮他們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時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消失……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勞動的將是同樣的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

我們綜合馬列主義對共產主義的論述，可見他們對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有如下的設想：

(1) 社會形態上：沒有階級、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宗教，同時也沒有法律和法庭。其理論依據是：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隨着階級的消滅，國家自行消失、

民族亦自行消失，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法律、法庭以及警察、軍隊等鎮壓工具也就一概消失，沒有必要了。

而由於分工的消失，階級差別（又叫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也就自行消失。

至於未來的社會組織如何，五八年中國的一些馬列學者曾有所討論，他們認為政府的政治職能消失之後，就變為純粹的經濟共同體，管理日常事務及統一計劃生產和分配，貨幣完全絕迹。當五八年底「人民公社」出現之後，便是一個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黨、政、工、農、商、學、兵」合一的有全面職能的組織，毛澤東欣喜地認為他找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民間語言「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就是來源於此。

(2) 意識形態上：同一傳統觀念徹底決裂。

(3) 物質形態上：由於人們已經全面發展，勞動已經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因而集體財富充份湧流，物質極大豐富，於是就能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4) 人的復歸：在這個時候，「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恩格斯語）；只有在這個時候，人「才能對人的本質真正佔有」，這是「人的復歸」，「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自由和必然、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馬克思語）

一句話，只有在這個時候，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完全自由的人。

在如此完美的社會面前，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簡直已望塵莫及。

外國漫畫家筆下的金日成



五、百多年來的實踐檢驗

恐怕最沒有異議的是：共產主義首先將一切文明國家勝利的預言沒有兌現，而無產階級首先取得勝利的則是在封建的、落後貧窮的國家。

馬克思主義是大工業社會的產物，其對象是發達的工業社會。但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不能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結合？反而只能同落後的、封建的、貧窮的國家結合呢？

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當時俄國剛剛發生了由克倫斯基領導的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但克倫斯基臨時政府還未站穩腳根，列寧就從瑞士

潛回彼得堡（現名為「列寧格勒」），領導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準備工作。當年十一月七日（俄曆是十月廿五日）發動武裝起義，成功地取得了政權。當時俄國並不是發達的工業國家，而是落後的農業國家（沙皇時依然有農奴），現代工業只有一點點。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勝利時，中國也是落後的農業國家，新興的工業也只佔極小比例。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的東歐諸國，除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是由該國共產黨領導解放的之外，其餘如匈牙利、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東德等都是由蘇聯紅軍解放的，同時由蘇共一手製造造成「社會主義」的國家。

北朝鮮也是這樣，是蘇聯紅軍解放的落後農業國家。

古巴，則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由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起義，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後，於一九六一年加入了社會主義，也基本上是農業國家。

越南、老撾、柬埔寨以及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緬甸、埃塞俄比亞等極端貧窮的國家，也或深或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可見馬克思主義只能同封建的、落後的、貧窮的國家結合，而不能和富裕國家結合。

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以為：

第一，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錯誤（下章專門再談）；

第二，馬克思主義並不關心工人階級的眼前經濟利益；

第三，馬克思主義富於煽動性，有強烈的道德理性以及對貧苦者的同情、對富有者的仇恨。而先進的工業國家，又往往同時是過去的

殖民國家，強權壓迫的印象令人難於忘懷。而封建國家、落後國家、貧窮國家又往往是文盲大國，識字的人不多，若有富於正義感的，或者激進思想的知識份子出來領導，很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由於文盲多，這些國家也絕少有人去真正研究馬克思主義，甚至連知識份子也讀不懂或者因革命工作忙而無時間通讀。於是，就把馬克思主義化成為若干條簡單的口號，如「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財主剝削壓迫」或者「打土豪、分田地」之類，這樣就很容易煽起人民的反抗情緒和復仇情緒。上述因素，是落後國家和貧窮國家較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因。

但是，馬克思主義又為什麼不能為多數工人所接受呢？

一是理論錯誤，二是不關心工人的眼前經濟利益。

原來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首先是互相依存的關係。沒有資本家開工廠，就不可能有工人的就業。當然，沒有工人，工廠也開不了工，也就無所謂資本家。一如沒有上就無所謂下一樣密切。

資本家和工人的互相依存，是第一性的關係，是天然的，不可改變的。

互相對抗，是第二性的關係，可作某種程度的改變。如資本家對工人的工資福利好些、態度好些，其對抗性就可以減弱一些；反之，如果資本家對待工人十分刻薄，其對抗性就大一些。

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哲學理論這回和現實社會分離了，他們單純從政治角度看他們的對抗關係，這本身就是階級偏見。

由於頭腦中有階級偏見，致使其無法理解

工人階級及「資產階級政府」的全部關係，以爲「資產階級政府」是一定專爲資產階級利益服務和專門鎮壓工人階級的。我舉兩例：

馬克思生前，英國工人要求八小時工作日並要求加薪，於是採取罷工手段向資家鬪爭。馬克思竟寫信批評英國工人工會，認爲這是一種夢想，只注重經濟福利，是同資產階級妥協的表現，資產階級決不會同意工人的要求，他認爲必須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資產階級才能取得勝利。但工會並不理會馬克思的指示，繼續指揮工人罷工，結果資產階級作了妥協：答應實行一天八小時的工作制，並增加工資，只是增加的幅度比工會提出的要小。

在德國，俾斯麥執政時，工人大罷工，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且要求建立養老金和保險金制度。馬克思主義又以爲是不可能的，反對德國工會的這一經濟要求。但却大出馬克思意外，俾斯麥政府竟下達命令：規定全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限制童工，對婦女工作年齡也作了規定：不滿十六歲的不得工作，對工人的養老金和保險金，也作了規定，強制資家執行。起初資家群起反對，但在俾斯麥的強權面前又只好執行。執行的效果是，由於工人的福利得到了保障，生產積極性提高，八小時的生產比過去十二小時的還多。於是資家也高興了，不再反對了。

俾斯麥的決定影響非常深遠，首先是對英國的影響，英國也隨之在全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規定了若干福利。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在全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且在工人的工資、福利方面比歐洲走得更遠，當時福特汽車廠的福利達到了世界之首。

馬克思對諸如此類的現實，很不理解，尤其不理解「資產階級政府」竟能站在工人一邊

?!恩格斯也同樣不理解，曾撰文諷刺嘲笑說：「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是這方面，就是俾斯麥的新德意志帝國：在這裡，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馬恩選集」第四卷第一六八頁）

馬克思對工人的福利要求，始終採取冷淡的態度，當他在分析了勞動價值、剩餘價值之後，最後說：「工聯作爲抵抗資本進攻的中心，行動得頗有成效。他們遭到失敗，部份是由於不正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說來，他們遭到失敗則是因爲他們只限於進行游擊式的鬪爭以反對現存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同時力求改變這個制度，不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爲槓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僱傭勞動制度。」（「馬恩選集」第二卷第二〇四頁）可見，馬克思把工人經濟上鬪爭的勝利仍然看作「失敗」，因爲工人不打算推翻資產階級統治。

恩格斯亦怒斥只顧眼前利益爲機會主義，他說：「爲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爲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將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於『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它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四頁）。

這樣，多數的工人和工人領袖，就只好和馬克思主義分家，大多數工人仍然喜歡「經濟主義」而不要「革命」空談。甚至是強大的英國工會，亦唾棄了馬克思主義，所有工業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是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寄望的「所有文明國家」同時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設想，便徹底落空了。於是，馬克思主義只能吸引一些激進人士和野心家。（待續）

● 文藝園地 ●



卷進音樂的旋風

輕快地滑

既然是滑

就在堅硬的水面上

劃下無數

比圓舞曲更流暢的

透明的弧

舞蹈與體育的結合

速度與平衡的擁抱

力與輕柔的融化

健美滲透了

時間

流逝着的

每一個分秒

響亮的造型

淋濕在

密不透風的

掌聲的雨點

如果你想知道生命的奧秘

就請來這冰上世界

用眼睛聽

一個現實的夢

一個有動作敘述着的

美的故事

（中國大陸詩人）嵐之凝

教育落後危及四化功難成 政策多變禍延洋人失信譽

——專訪莫靈平教授

● 本刊記者 ● 楊漫克



編者按：莫靈平教授，現年四十五歲，祖籍遼寧海城縣。早年畢業于台灣大學，後在美國普渡大學攻讀數學。現任普渡大學數學系正教授。莫教授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十分關注，曾在許多報刊和雜誌上

發表論見，內容涉及到政治，教育和文藝諸多方面，現兼台灣黨外「夏潮」雜誌的社務委員。莫教授近年曾數次到中國大陸及台灣訪問講學，對中國大陸的教育現狀有切實的調查與瞭解。

大學生人數增長緩慢四化難成

記：莫教授，首先請您談談對中國大陸教育體制的看法。教育的成功與否，無疑對中國的現代化有着至關成敗的影響。

莫：中國的教育很落後，現在仍有文盲近兩億人，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從八一年就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現在分成兩點說明：一是大學教育人數太少；一是中小學教育普及很差。後一個問題主要在農村和邊遠地區，學校條件太差，中小學教師工資待遇太低。我在此側重談談大學教育。國內大學培養學生人數太

少，教育的效率極低。中共搞四化，教育若不能首先上去，我可以很肯定的說，四化就沒有什麼指望了。

目前國內大學在讀學生只有一百四十萬人，一年可收三十至四十萬人，按人口比例，在世界上屬最低水平之列。按現代化的需要，中國大學在讀學生數量應達到兩千萬人。如按美國的標準，在讀學生數量則應達到五千萬人。美國在校大學生人數是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兩億人口有一千萬萬在校大學生。中國人口五倍於美國，故應是五千萬。當然短期看來，這似乎不大可能。所以，要實現四化，大學生不能每年只增加百分之十幾，而應成倍增加，迅速達到一定數量，把以前的錯誤趕快糾正過來。我

想達到一千萬，即人口的百分之一，應該是可做到的。

大學教育效率低浪費嚴重

記：中國的經濟還不發達，怎麼能夠迅速提高教育水準，增加大學生的數量呢？

莫：在目前條件下，就要研究在不增加經費的前提下，增加學生數量。我研究過中國教育經費的運用情況，發現大部份錢都浪費掉了。現在大陸事事講經濟效益，教育也要講經濟效益。我在北京時，看到科學院物理所在中關村開了個「眼鏡驗光公司」做起買賣。這算什麼呢？即使賺錢了，對物理所也不算經濟效益。教育的經濟效益指學生的質量和培養一個學生所用的費用。用這種觀點看，中國大學根本不講經濟效益。第一，師生比例就不對，一個老師教三點一個學生，這大概是世界上最高的。以台灣來看，公立學校一比九，私立學校一比十五。以美國來看接近一比二十。

第二，大學裏管得太多，什麼都管，結果是直接用在教學上的經費少了。吃住，道德教育，黨團活動都是社會問題，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應該交給社會。比如說，學生住校，就不對。中國學生大概一個月伙食費二十多塊錢，一年三百左右，相當於農民的年平均收入，這是絕對不公平的。政府應只對家庭清寒的、成績達到一定程度的學生給補助。住校也應取消。我在台大讀書時，校方規定坐火車一個鐘頭內可到台北的，一律沒資格住校。大陸學生的待遇是令人吃驚的。我的朋友，加州伯克萊分校的項武義教授講：「中國大學生是抱着養，餵着長。」就是太嬌生慣養了。應該把學生趕出宿舍去，可以逐步做。據我了解，上海復

旦大學百分之八十是上海市人，都住校。如果國家很富，當然沒有關係。國家這麼窮，升學機會這麼少，這不是擠掉別人的位置嗎？所以可以把宿舍改成教室。另外，中國大學的教室都分給各系，經常空着不用，這樣利用率太低了。應當把教室收歸學校，充分利用。還有就是研究生要教書。在美國沒有白給錢的研究生，誰都要做事。假如這些方面都徹底改變，中國的大學生數量，在不增加經費的條件下，就可以增加六至七倍。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改這些地方。

另外，我的朋友項武義教授有個建議，我認為是一個良策。中國地方大，貧富不均。過去搞二線三線建設，各地拉平，結果都發展不得。教育可以搞學區制，富的地方多辦些大學，窮的地方多辦些中學，分區普及各級教育，不能搞平均主義。這樣富的地區大學就可以收學費。

改革成敗取決于 全民教育的提高

楊：這只能逐步來做了。無論如何，目前中國的教育還是不足，而且不夠重視。

莫：就整個國家發展與教育的關係而言，現代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全靠教育了。過去中共批判教育救國論，實際上教育救國，提高人民素質，是最高範疇的政治，它的對象是人民的質量，物質只是附帶的次要範疇。拿日本、德國為例，二戰後成了戰敗國，什麼都毀掉了。可是十年以後，又發展了起來，為什麼？人民的教育程度高，素質好，就能迅速圖強走向民主政體。中國是戰勝國，但並沒有怎麼樣。

楊：除了大學，中國搞了許多准高等教育

，如各大城市的電視大學，函授大學等，可彌補一些教育的不足。

莫：我想還是要發展正規教育。大學教育內容不僅僅是書本的東西，除了實驗室外，師生交流，學術氣氛，這些電大之類就做不到。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義務及權利，如果很多人上不了學，政府就違憲，也可說違背時代潮流。什麼叫義務教育？十八世紀只是小學教育，到了今天，世界已經走到另一個水平。今日的義務教育是十二年義務教育，以及大學自願升學。例如在美國，大學是義務教育的延長，不是一個專才教育。大學畢業後，願意升學就升學，不願意升學可以去工作，開車、刷油漆都行。美國百分之九十的中學生都要上大學。

不朝這個方向走，國家就無法振興，發展四化就會變成空談。現在大陸搞政治改革，提倡民主，也存在教育的問題。德國、日本從軍國主義迅速轉變成民主政體，也跟民族的教育素質有關。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學民主學了一百年，到現在還是獨裁政權。人民不受教育，許多民主觀念，就接受不了。所以發展教育，無論對一個國家的經濟還是政治，都是第一位的要素。我想中國應迅速調整大學教育，爭取幾年之內使大學生人數接近一千萬，在本世紀內達到兩千萬，這樣就接近目前台灣的水平了。現在每年增長百分之十，到本世紀末還不到五百萬，根本滿足不了四化的需要。

現在不論執行什麼政策，到了下面就一場糊塗。下面的人素質不行嘛。

楊：有時候改革派領導人也很冤枉，他們定的方針也許不錯，就是落實不下去。

莫：問題是下面的人做不來，但執政者不發展教育，也就有責任。

通過留學舒緩國內大學緊張

楊：有人認為國內大學生很少，四化又急需人才，所以不應大批往國外派留學生。

莫：留學政策出現搖擺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大學生人數太少，所以不能夠大量把學生派遣出來。按人口比例講，三萬多人留學，比例太小。中國大學生每年畢業三十萬人，但這麼少的畢業生仍然不能人盡其才，合理使用。而碩士研究生又更少，博士生則少得可憐。我有個建議，研究生可以大批出國，國內騰出名額再多招些研究生。現在研究機關和重點大學出國風潮很盛，甚至有的教授、學生都走光了，打亂了培養研究生的計劃。但如果多招一些，就不會受很大的影響。中國學生都是百裏挑一，一兩分之差，就會淘汰一大批人，所以水平差不多，無所謂。而且這麼做會產生遞增作用，把博士、碩士、學士分三級的話，第一層多些，第二層就緩和些，第三層也會隨之緩和些。大家都樂得其所嘛！

政府的功能主要是解決人民的困難，而不是人民去解決政府的困難。中國政府喜歡讓人民遷就政府，把人才都納入計劃，按計劃擺佈、分配，這是人的物化，人的異化。無論經濟的計劃還是教育的計劃，都是為抽象的人服務，而不為具體的人服務，具體的人所遭遇的困難，他不管。

留居人數有限，多派便可多收

楊：對留學不歸的問題，您有何看法？中國政府是否應該加強管制，如禁止陪讀、限制博士後等。

莫：對留學生回歸問題要看怎麼看，長看還是短看，淺看還是深看。不能像開雜貨舖的老板那樣，一個子一個子地算。這不是治大國的辦法，治大國要看得很遠。中國人在海外取得成就，對國家是有好處的。限制陪讀，做得就很過份，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有各種理由出國的權利。除了刑事犯之類的人，都有權出國。中國應學會按法律辦事，不能因某個領導人頭腦一熱，就推出一項政策。這樣法律形同虛設，能起什麼作用。就陪讀來說



我國首批十八位博士學位獲得者接受證書

，我認為越多越好。據說，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時，卡特總統曾批評中國沒有移民自由。鄧將了卡特一軍，回答說：中國有移民自由的。我們給你一千萬移民，你要嗎？這麼一說，卡特只好轉了話題。中國留學生也可以大批外移，能想辦法留下的，就讓他們留下。實際上美國怎麼會無限量地容納中國移民呢？美國對大陸的移民配額是每年兩萬人，如果太太、孩子都出來，等於佔去三分之二的名額，其他讀學位的人就留不下來了。如一年有兩萬讀學位的，如果有七千人太太孩子都來了且能留下來，那另外的一萬三千學生就必須回去不可了，美國是不會讓你留下來的。美國的名額有限，中國的擔心實屬多餘。

如果大量派出，把名額填滿，就沒有不歸之虞。何況不見得有那麼多人能有辦法留下來。就留學生而言，他們本來就擔心回去後再也出不來了，所以想盡辦法要多待段時間。現在政策又變，他們就更擔心。我認為，至少應該保持前幾年定下來的政策，以取信於天下。如果能夠來去自由，留學生就不會那麼怕回去了。

中共想盡辦法要留學生學成回國，反倒引起留學生的反感，不願回去。迫不得已回去的，也是一肚子怨氣。

政策多變禍延洋人，喪失信譽

楊：中國留學生政策的變動對派往國家的學校和機構有何影響？

莫：最近幾年來美國人與中國打交道的多了，開始對中國有了清楚的了解，即政策多變。這次留學政策的變化，更使美方印象深刻。美國招研究生並不是在做慈善事業，一般而言

，每個學校，每個系，每個教授都要在幾個月前安排好下一學期的計劃。比如，招收多少研究生，給多少個研究生助教（TA）獎學金、或研究助理（RA）獎學金。留學生相當於他們的雇工，要教書、改卷子、做實驗，來換取很少的生活費。中國政策一變，安排好的碩士研究生都不能來了，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因為通常用一個人要有很詳細的評估，臨時找人頂替，會帶來很多麻煩。「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雖然答不在中國學生，而是中國政策變來變去，但是，恐怕美國人以後就不要中國留學生了。中國政府的政策多變，不但影響國人，而且禍延洋人。

此外，中國政府政策不定，下面的人也只好亂聯繫，不管美方條件合理與否，只要能出國，就幹。這樣也降低了自己的尊嚴。許多學生提前幾個月就跑來了，吃住都成問題。別人問他爲什麼來這麼早，他說政策一變，就出不來了。中國人自古以來講信譽。有這麼一個故事，「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晉文公攻打一個叫做原的城池，他說只打十天，不克即返。十天未破，但再打一下就可破城。」大家勸晉文公繼續打，晉文公說，我已說過只打十天，不可言而無信。中國政府的個別當權人就很短視，只顧自我利益和眼前利益，不顧信譽，這樣就不好辦事。香港九七回歸，本是好事，但港人惶惶不可終日，就是怕中共說話不算。

另外，台灣大陸之間能開展良性競爭就好了。競爭的內容之一就是教育，看哪邊辦得好，然後海外給兩方面打分數。這樣督促中國的教育搞上去。

博士未必學成，派遣應求實效

楊：我想，中國開放後對海外輿論很注意。大家應該多提建議，形成監督作用。

莫：是這樣。國外的人比國內的人說話作用大。我也希望明年中共教育政策能夠變回來。中共的留學政策還應注重實效。例如讀博士後問題。讀完博士只不過寫了一兩篇論文，實際工作能力還相當不成熟。博士後相當重要。學生沒有實際經驗，學的東西回去無力施展，可能報廢掉。近年有的教授回國，發現以前自己教的學生在教英文，所學專業全廢掉了，這是極大的浪費。這樣首先對學生本人沒好處。他不能獨立工作，畢業就回國。我認爲應該讓學生都作博士後，否則對中國也沒好處，政府花了錢，培養的人材不適用。

楊：現在某些中國領導人太敏感，認爲讀博士後，許多學生就有機會留下來了。實際讀博士後與能否留下關係不大。留學生即使讀了博士後，仍是持公務護照，留下來的可能還是很小。

莫：這是個事實，但如果不回去，不讀博士後，他也要想方設法留下來。對此我想中國政府應有「無爲而無不爲」道家態度。很多事情自有其緣故和產生之道，不要去硬管，強人之所難。一個政府順乎民意則可得民心。大家想出來，就放出來，能留在美國的絕對數量是固定的，放出來越多，回去的比例就越大，這是很簡易的數學了，應該會算。最好是放大批大學生，因爲中國教育目前研究生培養數量太少。同時，國內空出名額，又可以多招些大學生繼續讀研究所，這是利用外國學校的好辦法。

少而好學，老大留洋多無益

楊：中國目前政策正好相反，訂下多派訪問學者和博士生，少派大學生的政策，這有什麼益處嗎？

莫：根據我的調查，年齡越大，出來後成績越小，許多訪問學者歲數太大，英語也學不通，要半年的適應期，剛適應了，快到期限回國了，又忙着買八大件。有的忙於給妻兒辦出來，結果學不成什麼。而年輕的，特別是單身，就很好，無牽掛，精力也正旺盛，多易取得成就。

要派什麼樣的人出來，是很難預先計劃的。比如說現在電腦資訊發達的程度，是我們幾十年前想不到的。所以今天我們的電腦科技，已落後很多了。

我主張多派年輕人出來，愈多愈好，讓他們在先進國家的科技發展的潮流中，自由選科。哪一科發展快，亟需人才，他們就會流向哪一科。這樣，就不致於落後人家太多。而且年輕人回饋國家的時間長。花一樣錢，可是投資在年輕人的身上，效益就更大。

楊：中國的各項投資很不協調，爲了爭大國面子、拉朋友，給了亞非拉很多小國不少的援助。所以，教育費用增加很慢。

莫：教育投資應該增加。中國發展那麼多的尖端工業，主要靠五十年代回去的人。同時，這些尖端與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并不協調。與其花大錢把一些尖端硬搞上去，不如花大錢辦教育，將來整個國民經濟都上去，國家的現代化，各種改革也都會順利發展。

楊：還想請莫教授談談如何吸引留學生回國的問題。我想落後國家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中國目前特別嚴重。除了政治制度原因，在合理使用人材方面各國有什麼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保證人才流動來去自由有人歸

莫：這方面，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人才流動。學生不歸，主要原因是回去學無所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不開放，學生回去又入原單位。有的學生出來就是想離開原單位，學成後找個好單位，他才願意回去。人才流動有橫向、縱向兩個方式，流動對社會的發展關係太大了，可使社會活躍起來。發達國家很多新興科技、企業之所以能迅速發展，關鍵原因是人才能迅速集中和分散。美國的資金、人員都是自由流動的，隨時可以形成一個重點研究的系統。比如搞基因工程，發展高級電腦，只要有資金，可迅速從全國各地招兵買馬，形成發展規模。中國的人才流動，無論水平還是上下流動都很難。每個人都像釘子被釘在某單位。同時全國又劃地為牢，城鄉之間，省市之間，部門之間都不能自由流動。調工作關卡重重，原單位人保組織，黨組織，各種關係都要打通。哪一關卡的領導都會卡住你。這種制度對教育科研影響猶大。一個教授想搞一個科研中心，人才從哪來？人才時時刻刻要集中、分散，這在中國是辦不到的。除非你是國家重點項目，可通過行政命令調一批人來。但這畢竟很少，也不正常。

台灣這方面目前是这样做的。首先，在海外取得學位，回去後工資很高，博士可拿到三萬五的台幣，相當於九百多美金，收入比較高。另外，台灣學者都有出國研究計劃。每三到六年，可出國研究一年，具體辦法我不大清楚。最主要的台灣與國外交流頻繁，每年暑假，留居海外的學者很多回去交流學術，來去都很自由，手續也簡單。故最近幾年台灣的研究風

氣很好，海外學者也願意回去交流，而且保證出入境的自由。所以，現在台灣到美國招人招學者都很容易招到。

就日本來說，只是五十年代出來留學，後來迅速發展，現在都在國內培養高級人才了。這也是一種模式，但大陸現在還無法學日本。其它國家也有一些經驗，總的來說都不用卡的辦法。中國現在停止陪讀，就是扣留人質嘛！這只能讓出來的人怕回去，同時想一切辦法把

●民運策略●

中國社會與中國民主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李草葉

我們當中很多人在大陸都受過迫害，我們都有對自由民主嚮往和對專制制度的憎惡，這在感情上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如果僅僅採取反共態度能否有助於民主運動的進行？在中共建立政權以後，海外反共宣傳一直沒有停止，但對中國有什麼實際效果呢？反共之堅決，莫過於國民黨了吧，但後果是把整個大陸都丟掉了，雖然現在它還有塊反共陣地，但能否會把共產黨反倒，筆者是很難相信的。很多中國的知識份子，沒有採取反共的立場，我想這不能用「怕受迫害」、「貪圖名利」之類的觀點來解釋，這是他們對中國社會進行認真分析後所作出的決定，現在在中國大陸，能擔負起領導責任的只能是中國共產黨，這不是一個那些人願意不願意改變的現實。這種一黨專制是否也可以逐步演變成爲一種民主制度，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本文當然也不是說要放棄自己的奮鬥目標，而去符合共產黨。如果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是個農民黨，那麼它的「保守性

親人接出來。想讓大家回去最好的辦法是把國內環境搞好，來去自由，中國人有傳統觀念，總願意回去工作的。

此外，許多高級科技的研究是國際性的，是人類文化一部份，可以把人員放出來做長期研究，不要有狹隘心理。現代化也是國際化。中國應儘量減少與外界的隔閡，這對中國本身，對國際社會的發展都會有好處的。

楊：就談到此，謝謝莫教授。

「、狹隘性」和政策上的「不穩定性」正是它自身特點所決定的，也是它本身所無法克服的，我想這也就是中國民主運動應該存在的理由。中國民主運動實質上是一場改造中國人的運動，任何有利於中國進步的事情，都應視爲這個運動的組成部分。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理論，只有在各種學說互相討論、互相補充、互相改進中才能找到正確的道路，中國民主運動也正遵循這一方針向前發展。如果中國共產黨真如它自己所宣傳的，是除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外，再沒有任何特殊的利益，那它就不應該對中國民主運動採取壓制的態度，因爲中國民主運動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帶來任何威脅（這是這個運動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對共產黨的統治帶來威脅的，是他本身的僵化和脫離群眾，這是中共的領導者自己也清楚的。而防止這種情形發生的唯一方法，是要允許其它政黨組織存在，因此多元化對中國共產黨不僅無害，而且是有利的。

軍委會會議惹怒鄧小平

——鄧小平裁軍近況

(北京)柳平

沒發文件的會議

今年，中央軍委出了件奇事。這件事就是：今年五、六兩月，中央軍委召開了兩次重要的會議，鄧小平都出席了。但是，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既沒有上《解放軍報》的新聞，也沒有軍委文件傳達「會議精神」。通常，軍委會開會後，都由中央軍委下達一個「某某會議紀要」之類的文件，傳達至團級以上。該文件要體現中央軍委的精神，並要求全軍貫徹執行。看來，這兩次會議開了個場，並沒有做到有始有終。這是因為，鄧小平對會議結果很不滿意，對中央軍委寫出的兩個會議紀要，很不滿意。據說，鄧小平看了兩個「紀要」，氣得把「紀要」一摔，說：「這種紀要不能發！」鄧小平一言九鼎，「紀要」成了廢紙。

鄧小平動怒

大家還記得，去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出訪新西蘭時，向外國宣佈，中國軍隊即將裁軍一百萬。此語一出，海外震驚，軍隊內部更震驚，因為，這麼重要的決策，軍隊內部很多高級將領事先并不知道，胡總書記竟然先對外國人泄了密。（有關詳細報導

請見《中國之春》一九八五年七月號總廿五期——編者）。

隨後，中央軍委下達了正式裁軍文件，要求各軍區、各兵種裁員，一年之內完成計劃，軍委驗收。

一聲令下，大批士兵脫了軍裝，復了員。到今年五月份，一年過去了，軍委開會驗收。這個會議，叫「全軍組織工作會議」。

鄧小平參加了會議，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主持了會議。鄧小平聽取了各地滙報，結果令他大失所望：

(一)各地士兵裁員人數基本達到要求；
(二)軍官裁減的數目，却不足原訂指標的百分之四十。

鄧小平一聽就氣炸了肺。他發了脾氣：這樣怎麼行？我們過去譏諷國民黨軍隊軍官如牛毛，我們的軍隊不能學那個樣子，那樣的軍隊是不能打仗的。

鄧小平下令：今後軍隊裁員，主要是裁軍官，不是裁士兵。

鄧小平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可是，問題不能歸咎於軍委負責機構，更不能歸咎於總政治部、組織部，而應歸咎於軍隊多年積習而成的不合理制度。

士兵好裁

裁軍過程中，士兵和低級軍官的裁減工作較為順利。這是因為：

(一)近幾年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農民收入顯著增加。一個廿多歲的壯小伙子，如果有個手藝，或跑個生意，每月掙上一、二百元不成問題。但是，參軍當個小兵，每月十多塊錢的津貼，不夠抽煙的。復員時，兩手空空，而在農村的青年伙伴都發了小財。

(二)以前低級軍官復員時，可以轉業到地方當個小幹部，或做工人，吃上商品糧。這樣就逃出了農村的「苦海」。從前，農民都爭着當兵，就是想脫離農業戶口。現在，低級軍官（營級以下）復員，全部回原籍種地，不能轉為城鎮戶口，這個特權一消除，農民對當兵也就沒了興趣。低級軍官一看自己升不上去了，早晚也要回原籍，都自動要求早些解甲歸田，以儘快享受農村賺錢的自由。

(三)部隊這幾年在群眾（包括農民群眾）中，聲譽一落千丈。士兵和小軍官陷入「戀愛難、結婚難」的困境。農村姑娘以前都巴結當兵

的，爲的是讓丈夫帶出農村。現在情況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農村姑娘都怕嫁給當兵的，她們說，當大兵是「一沒錢，二沒前途，三沒名譽」。

基於這些原因，農村兵都很不安心，天天想復員回家。用「軍心不穩」四個字來形容這種情況，並不爲過。

大軍官難裁

團以上軍官難裁，而且，職務愈高愈難裁。其原因不難理解。

(一)軍隊是一個特權王國。衣、行、住、用，樣樣好東西都給了軍隊。高級軍官的特權享受，是地方官員遠遠比不上的。轉業到了地方，一切特權就會喪失。

(二)軍隊是一個避風港。每次搞政治運動，軍隊的波及程度遠遠不如地方，尤其野戰部隊，政治運動是沾不着他們的。因此，幹部在軍隊中，遠比在地方工作安全。人都是尋求安全感的，因此，老幹部們都不願離開部隊。

(三)地方政府不歡迎復員轉業軍官。這幾年，也有一些軍官被迫從軍中精簡下來而到了地方。地方政府對這些老軍官，多半是敬而遠之。一則由於老軍人們沒技能、沒地方行政經驗；二則地方幹部也有嫉妬心，他們心想：「這些人拿夠了復員費，在部隊裏享夠了福，現在也該讓他們嚐嚐沒權的味道了。」

在這種背景下，自去年開始的裁軍工作，完成得并不理想，特別是老軍人的戀棧不退，成了棘手的問題。

退職不離軍

這次軍委召開的「全軍組織工作會議」，

還揭示了另外一個令鄧小平頭痛的問題：即很多老軍人們「退職不離軍」。

什麼是「退職不離軍」？一個北京軍官空軍後勤部副部長（相當於軍級）說得好：「我不當部長了，回家養老，這可以。但是，叫我脫了軍裝，去掉我的軍籍不行。我從十六歲參軍，軍隊就是我的家，我對部隊有感情。」這位老部長說的也可能是真的，然而，多數軍官「退職不離軍」的真正原因，恐怕是不願喪失軍隊特權。只要是現役軍人，他就要住軍區大院。但一脫軍裝，讓他搬走就理所當然了。

軍銜制難產

鄧小平做出「恢復軍銜制」的決定，已經有好幾年了。按鄧原來的計劃，一九八四年八一建軍節時，高級軍官們就要戴着將軍的肩章亮相。爲促進軍銜制的恢復，余秋里曾命令總政治部制訂過好幾個軍銜方案，但都未獲得軍界高層的通過。

軍銜制遲遲恢復不了，據全軍組織工作會議的參加者透露，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軍界高層人物分配不均。誰封大將？誰封上將？按過去戰功？還是按現在職務？這些都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二是「退職不離軍」的老軍人們的軍銜問題無法解決。只要他們還穿着軍裝，還在軍籍，封帥封將時，就要有他們的份兒。這樣一來，可能不在職的將軍比在職的將軍還要多。鄧小平顯然不願看到這種尷尬情況出現。

現在，中國軍隊成了一支滑稽的軍隊。軍裝換了好幾次，領章、肩章做好了，都鑲到了衣服上，可是，不管是什麼軍職，上面統統放上一五角星。這種情形還要維持多久？

軍事院校改革不順利

五、六月份，軍委召開的另一個重要會議——全軍院校工作會議，也令老鄧十分光火。

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就下令軍隊院校進行全面改革。改革的方向是，由蘇聯式軍事教育向西方軍事教育轉化。這就需要兩個「更換」：

第一個「更換」是更換教材；
第二個「更換」是更換教官，讓那些僵化的老教官統統回家，換上一批年輕人。

鄧小平對軍事院校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是有其道理的，因爲，中國的軍事院校，基本是照搬蘇聯的模式，教材多是由蘇聯翻譯過來的。從教材到體制，均離現代化十萬八千里。

然而，軍事院校改革阻力重重，阻力主要來自老教官以及代表老教官利益的院校老領導們。尤其是動員老教官們退休，真是難上加難。

不難想像，當老鄧聽到各大軍事院校的改革不能如期完成時，他會多麼氣忿！

結果，全軍軍事院校工作會議的紀要也沒發。鄧小平對院校的改革不滿意，對紀要更不滿意。

鄧小平工作時間增多了

據內部消息，鄧小平自十二大之後，每日工作僅二、三個小時，放手讓胡耀邦和趙紫陽抓具體工作，以建立胡趙的威信。可是，八五年經濟改革出現失控局面，軍隊改革阻力重重，黨內、軍內守舊勢力蠢蠢欲動，鄧小平不得不加長工作時間，樣樣大事都要親自抓。

在中國，改良運動從來沒有成功過。鄧小平要創下成功的前例，氣魄雖大，但機會有多呢？



評毛是爲了前進！

——評「我對評價毛澤東的看法」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嚴 璜

毛澤東的「千秋功罪」，他生前在述志的詩詞中曾問道：「誰人曾與評說？」據他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氣派，這一問似乎不可體會爲「我所做的一切，對與不對，後世什麼人來評論呢？」聯想到他在懷仁堂上對在座政協代表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口吻，使人感覺到

他似乎是在說：「我爲革命立下的功勞中即使有錯，你們後世誰來評論？」

毛澤東也許早已意識到自己將有被鞭屍的危險。爲使其個人威望傳之千秋萬世，他做了不少工作。但就在他迫使億萬人民天天向他三呼萬歲萬萬歲、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的同時，便已自我作出了歷史的評論。

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逐步認清了毛的本質。若有可能舉行真正的民意測驗，或暢所欲言地進行大辯論，對毛持否定態度的，諒不在少數。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毛仍認識不清者，肯定大有人在，別有用心者當然也不少。「中國之春」總卅一期，「我對評價毛澤東的看法」的作者方庸魯（下簡稱

方）就是其中之一。儘管編者按介紹方自己聲明是自費留學生，既無黨票，又非文革受益者，還有憂國憂民慮華夏之心。然而，讀完他通篇高論之後，我實在懷疑。

一開始，方就擺出一付學究面孔，教訓別人「批毛不要帶個人感情」。爲文言志，不述衷情的文章，能感染讀者嗎？問題在於所說的是否真實，爲大多數人所認同，并經得起推敲和時間的考驗。如自以爲冷靜、公正，但避視大量令人激憤的史實，這才是錯誤。

四人幫倒台之後，保毛派一直在給毛「畫皮」，爲毛推卸文革的罪責，散播「七分功、三分過」的觀點。鄧小平也公然聲稱要把批毛的責任留給下一代。爲此，我在一九七九年寫了一篇「毛澤東逝世三周年祭」以駁斥那些觀點。現再看，其中有些問題至今仍然存在，特摘錄如下：

「……：……：……：俗語說『蓋棺論定』，但毛先生的水晶棺材蓋上了整整三年，大陸上九億多人，仍沒有一個敢公開站出來，正式評論他幾句。……」

三年——一千〇九十五天，報紙上刊登新的執政者們在對內對外的發言時，凡是提到中國自一九五七年起連年「天災」人禍時，都閃閃縮縮地爲毛推卸責任，甚至乾脆要把毛的功過誣給下一代去評論。

這是正常的現象嗎？！
只能說，統治了大陸幾十年的「紅太陽」至今仍散發着它「戰無不勝」的威力，在它陽光撫育下培植出來的各級特權者，決不輕易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毛的陰魂繼續鎮懾着全中國人民、全中國共產黨，也包括三落三起的鄧大人在內！

評毛會破壞安定團結嗎？評毛會降低中國共產黨的威信嗎？評毛會引起思想混亂嗎？評毛會妨礙四個現代化的進行嗎？（這是當時反對評毛的論點——筆者註）

請回憶自一九五七年以來的歷史吧，二十多年來，「毛澤東萬歲」越喊越高，而中國的政治局面却越來越不安定；中國共產黨的威信却越來越低；中國人民的思想却越來越混亂；中國的國民經濟却越來越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步

伐。

……
十年文革教育了全國人民，人們先先後後覺醒了，頭腦中裝載不下那麼多的疑問，早已暗地裏偷偷議論。時至今日，不批毛的後果只能使絕大多數的人民和中、下層幹部「心懷餘悸」、消極觀望，而「凡是派」當中那些迷而不悟的盲從者，依舊做着「毛澤東思想」萬歲的謬夢，追隨那一小撮頑固地「緊跟和高舉份子」，抗拒或拖延任何改革。

……
批毛，是當代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任務。因為毛的一些遺留影響仍在中國大陸社會上起着極壞的作用，直接間接地嚴重妨礙着中國的進步。

下面，藉評方庸魯的觀點，繼續我對毛進一步的批判：

(一) 所謂的「個人感情問題」：(筆者按：(一)、(二)、(三)、(四)，是為方便讀者對照方所作文章的段落而分。)

方說：「當代評論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有局限性」。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難道當代人的親身經歷，反而不如後代人理解得真切深刻嗎？如果說有些人物的偉大作用要到後世才能發現，為什麼當代人就不能用他們的頭腦和知識去加以科學的分析呢？如果說當代人的分析易摻雜個人感情，因此當代人留下的材料都不可信，那麼後代人又根據什麼去研究歷史人物呢？

進而，方竟根據這一觀點，武斷地把毛等同拿破崙，譽毛「代表了進步的歷史潮流」。中國近代的進步歷史潮流是什麼？是包括了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從晚清迄今已一百多年。自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正式開始獨裁統治之後，他在這個潮流中，起過什麼作用呢？他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促進了多少？阻礙了多少？拖向後轉的又有多少？我們在下面繼續討論。

(二) 所謂「神化毛澤東的主客觀因素」：

毛澤東的愚民造神運動，是中國封建落後意識的一次大復辟。但方却將之歸咎于劉少奇、郭沫若等人的奉承。矛盾的是，方在下一段論毛的功過時，又舉中美建交為例，說毛在黨和國家的領導集團內有排除眾議，堅持正確主張的無上權威。我也聽說過，解放初，毛曾反對以領導人名做城市名、街道名。毛這建議得到通過，贏得了美名。為什麼到文革造神運動時，毛膨脹到頂的權威反而不能否決下屬的捧抬呢？投合毛本人的意願建立「一言堂」，以有利于集中領導，似乎還有情理可言；但對「紅海洋」、「三忠于」……等封建愚民活動也欣然受落，毛的封建帝王意識，還不昭然若揭？方斤斤追究是毛主席授意還是林彪及其他諂佞之徒客觀吹捧，豈不多餘？俗語說：「上有好者，其下必有甚焉。」這才是比毛語錄更準確的真理。

(三) 毛澤東的功過：

我一直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對全國人民，也對他們自己的黨必須負起嚴肅的責任。因為幾十年來，毛的工作大多通過中國共產黨來施行。毛的主張，在黨內有否遇到抑制或助長、哪些部分是他一意孤行、哪些部分是他吸收了別人的意見、哪些功、哪些過，該記在毛的賬上或不記毛的賬上，只有中共中央才清楚；毛在黨內要權術、控制各派，維持獨尊的活動，也有待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揭露。為了怕降低黨的威信而繼續捧毛，固然是大錯，但籠統地由黨承擔毛的錯誤責任也是不對的！



帶着紅袖標的毛澤東，由右至左為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

在中共對此長期曖昧不明的情況下，我的評論只能根據衆多表面現象加以合情合理的推斷。

首先，我引用方在上一段替毛自我神化辯護的例子，說毛與江青的結合要經中央批准，證明延安時期前毛是服從于集體領導的。如果是這樣，則建黨、建軍、抗日、反蔣以及奠定建國的基礎……等功勞，也應歸集體。為什麼後來却淨向「紅太陽」身上作「錦上添花」？

方又說「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後，加強了這一集體領導作風」。衆所周知，那次整風運動是毛首次利用親信康生在黨內打擊與清洗異己份子、樹立日後的絕對權威的第一步，也是十多年後，即一九五七年整風和反右的樣版。

其二，方說「毛統治三十年，爲中國建立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完整的現代政治體制」；矛盾的是，方又承認「這政體有些機構形同虛設、名不實、也存在機構重疊、黨政不分等弊病」。如此說來，這和國民黨時期的政體有什麼根本區別？甚至和明、清的封建體制相比，也不過是新舊名稱的替換罷了。因爲除了弊病相同外，其最主要的本質都是一長專制、對上負責、沒有民主或只有形式民主。而毛新創的街道委員會，比從前的保甲制倒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說這是毛的功勞，對他和他的統治集團的確是，對人民却不怎麼樣。

方又說「毛維持了與中國經濟發展適應的低消費水平，從而爲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國庫庫存」。這是經濟學，要請專家去分析。至于所謂的低消費水平，自我出國之後，拿工資與物價一比，才曉得毛在國內吹噓了幾十年的低物價，原來是物價最貴；所謂積累大量庫存，實是毛置萬民于飢寒交迫中換來的。而他拿這庫存不是去發展經濟而是隨意浪費：如「革命輸出」、無科學計劃的建設、特權階層的集體揮霍……等等，直至把素稱地大物博的祖國的國民經濟推到了接近崩潰的邊沿！

方進而却根據這兩條，說「毛至少爲鄧小平今天的改革提供了政治物質基礎」。簡直是天方夜譚！誰不曉得今天的改革，處處碰到毛遺下的官僚機構拖延、對抗、貪污的掣肘；經濟上，每一項新建設，幾乎都要引進外資，借

債或合辦。怎能如斯顛倒，以過爲功？

其三，方又把文革時對官僚主義有限的沖擊，說成是「教育老幹部重視民主思想建設」。事實上，那是毛利用了人民對其官僚統治的長期不滿情緒，導之去爲他自己打擊政治異己。他犧牲了全國人民的安寧，搞亂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以遂其混水摸魚，使其政治集團得利的陰謀。全國不分清紅皂白，凡領導都要先行打倒。大搞「莫須有」。十年文革，已用千萬樁血淚斑斑的冤假錯案立下鐵證。那種紅衛兵的沖擊行動，絕不是培養民主，而是更推廣了有強權無公理的專制。

方把這看成是毛的功勞，并驚呼什麼「一些重新掌權的幹部老毛病又犯了」。這是天真

還是糊塗？

其四，上面提過方極爲讚賞中美建交，譽之爲「毛巧妙利用美蘇平衡戰略取得的外交勝利」；又說「在全黨談右色變的局勢下，這是只有毛的魄力和領導才能，方可作出的決策」。試問：談右色變的局勢是誰使然？別人建議改變原有路線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唯有「一言堂」堂主才有發言權，這算何種魄力和才能？！

方還論述：「當時國際上有識之士已對中國另眼相看。」我看那不是如方所分析的：「因毛的文革已進入穩定時期與毛思想已建立新的政治力量。」而是珍寶島事件使全世界加深了中蘇分裂的認識，國際形勢造成中美雙方都有建交的願望和條件，怎能一廂情願地說成是毛的外交勝利？就不怕被識者嗤之以鼻？

對此事，當時大陸另有傳聞：說是周恩來與基辛格安排妥之後，把既成事實強加給毛的。這固然是小道消息，但毛自林彪事件後，早已「深挖洞」蟄居不出，連給江青的「訓示」也通過寫信。只有在接見外國首腦的紀錄片上，才可見其倩人攙扶、口角流涎、話語不清的形象。（所以保毛派才有所謂文革時偉大領袖受四人幫蒙蔽及迫害之說）還有什麼魄力可言？！另外，中美建交的引綫，除戴高樂外，還有「乒乓外交」，據當時聽上面的傳達報告，此事在美國進行得頗爲神秘。如周恩來在佈置這任務之前，已經過毛同意且與戴高樂打過了招呼，何必那樣？也許，將來內幕拆穿，這功勞或許還是周恩來的呢。

其五，方忘記了最爲愛國主義者們熱烈稱道的是毛堅決頂住了蘇霸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的壓迫。似乎不依靠毛，中國已淪爲蘇的附庸了。其實，毛所做的，連芝麻大的阿爾巴尼亞



老態龍鍾的毛澤東與其妻張玉鳳姐妹。張玉鳳現已被鄧小平關在蘇州監獄，以防她胡鬧。

的霍查也做到了。反之，毛自己在國內却長期以老子的姿態對待各民主黨派。中蘇論戰的「九評」，（內容對與不對不在本文研討範圍）顯然有毛要爭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個人野心。如不信，請回憶：當時全國正大飢荒，毛却不顧人民死活，向世界所有登門求「助」的各國領導人，一概慷慨解囊。糧食、物資、金錢，一概大贈送。同時，長期調撥大批人力物力支持所謂的印支解放戰爭；還專門為越南與柬埔寨培訓幹部。（可惜後來一個反骨無情，投靠了蘇聯，另一個青出于藍的好學生，却被世界公認為殺人王而自討敗亡）這就是毛的「國際主義」。

其六，有些人把中國有原子武器也算作毛的功勞。中國研制原子武器的得失，在此不宜詳談。不過依毛在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堅持研制原子武器的興趣，是為與美蘇搞核武器競賽，而不是利用原子能發展國內的生產。

毛的功勞，暫時想到上面幾點。（歡迎擁毛派提備忘錄）毛的罪過，就已知的大略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 重大的政治經濟政策方面：

例如：「窮躍進」、「瞎煉鋼」、「衛星田」、「大寨式的蠻幹」……等，這些是明顯的錯誤。

土地改革、公私合營、人民公社……等，有待商榷，但似乎可找到更佳方案。

至于三反五反、鎮反、反右、反右傾、四清、文化革命……等，則是妨礙了中國社會正常發展的人禍。

以上過錯的原因，是「毛澤東思想」加「一言堂」。卅年來，上行下效，專制成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是第一書記說了算，下級是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以致一錯再

錯，發展到文革的頂峯。假如七六年毛不死，四人幫繼續橫行，會有什麼結果？

(2) 思想學術文藝方面

1. 毛的哲學論著，筆者未敢妄加評議。

2. 毛思想的核心是階級鬥爭學說。從他幾十年來，據此制訂的政治經濟政策所產生的效果來檢驗，充份證明了那是一派假馬克思主義之名，煽動善良的勞苦大眾跟隨他去鬧「毛式革命」的學說。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最高指示下，可以改變一切事物的正確內涵。由當權者任意解釋，是是非非、正正反反，皆遭扭曲，反人權、反民主、反自由、反法治的災難層出不窮。

3.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批野百合花起，到批武訓傳、批胡風集團、批海瑞罷官、到批苦戀、批劉賓雁……幾十年一脈相承。這篇講話在扼殺文藝創作自由，妨礙中國文化向前發展中起了極壞的作用。

4. 以「人多好辦事」批判「人口論」，導致今天不得不強制計劃生育，以致出現許多不道德和不人道的事件，使數以億計育齡婦女的身心健康，遭受有形無形的損害。

5. 為實現毛「政治掛帥」的教導，在基礎文化教育中硬塞政治內容，導致每年都要勞民傷財地重新編印與發行政治教科書，影響了正常的文化教學。

(四) 毛的用人問題（筆者按：這問題本應歸入(三)其二的範圍，算為毛建立的幹部政策。）

方在這一段說道：「中國知識分子有封建尾巴，放手使用適得其反」；又說：「現有些老知識分子以內行壓內行」；「在當過右派及蹲過牛棚後，今天當上領導却又左得可愛」……等等。因此他就根據毛口頭說過「用人強調德才兼備，不強調學歷」一點，認為「毛用人

的觀點還是較全面的。」

可是，凡在大陸工作過的人都深深體會到，所有機關單位的組織科、人事部門，歷來首要重視的是階級出身和政治表現，才幹實屬其次。這種不成文的幹部政策，幾十年來，從唯成份論發展到血統論，不知埋沒了多少才智之士。其根源正是毛的階級分析論！典型的是毛親自提拔的工、農副總理，吳桂賢和陳永貴，還有那個交白卷的張鐵生。至于用人唯親、唯諂，也是膾炙人口。如林彪之獲得特殊提升；四人幫、毛遠新、王海容……之流，居然凌駕于黨和國家諸元老之上。

方怎麼會把毛的漂亮話誤以為真？從這一段望文生義，莫非方的才華曾在國內受過老知識分子的排擠？因而被個人感情淹沒了理智的論證，失去了歷史的角度？我要在此提醒：中國文人相傾軋的「封建尾巴」，正是在毛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互相鬥爭而「鍛煉」得更嚴重了。

方文最後稱毛是「一代偉人」，對！但說毛「是無可非議的」就大錯特錯了！

偉大的領袖對他治理下的百姓和國家，犯下很多不可寬恕的錯誤，而且流毒至今，禍延後世！

提到後世，忽然又想起兩點：即幾十年人為的歷次政治運動在民間所留下的血債仇恨，已在各地、各族之中埋下了只等適合條件就會爆炸的地雷。又如藉毛的表率而長期氾濫全國的一切壞思想、壞習慣，沖擊與破壞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恐怕再搞數十次「五講四美」之類的運動仍恢復不過來！

終篇結語，請容我仍用「毛澤東逝世三周年祭」用過的：把鞭子揚起來吧！為了奔向四個現代化!!!

史學三「權威」和毛澤東思想

(美洲) 柯奇

毛澤東思想是什麼？這是許多人探討的問題。不管你是毛的擁護者還是毛的反對者，對於這個使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思想，都必須做出自己的解說或答案。

共產黨的領導人及其理論家把毛思想解釋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個泛泛的定義，并不能說明毛思想的實質。究竟怎樣結合？連他們自己都說不清，或者各說不同，焉能給毛思想下定義，連

論此種結合給中國人帶來禍害抑或幸福？筆者飽讀毛氏著述，借文化大革命之光，某些篇章一時尚能背誦，不敢言得其神髓，多少有些認識，試從一側面以解說毛思想。

歷代的統治者，無論古之帝王將相，今之元首總統，總有那麼幾個人喜讀歷史書，好談歷史掌故。據說一者可從歷史去尋求統治之道，二者可炫示其通古之學識。毛氏亦不例外。眾所皆知，毛氏頗讀中國古書，一部「資治通

毛澤東篡改歷史的魄力，的確是前無古人。

鑑」始終是毛氏的良伴。毛氏發動之「運動」，與歷史沾邊者亦有數起，遠者如「解放」初之批武訓，近者如文化大革命中之批「海瑞罷官」。然毛氏與史學界之爭論亦甚有趣味，常有驚人之見解，是以反映其思想。筆者所說從一側面以解說毛思想，即從歷史學之側面。

文化大革命伊始，共產黨理論界曾下達一份「上頭」之文件，就中傳達了毛澤東對一些史學爭論的意見，借此機會毛氏御封史學界三權威。提到共產黨史學權威，人們自然想到史學界的幾「老」。首先是翦老（伯贊），最早用馬列觀點研究歷史者，其成名作「歷史哲學」流傳甚廣，其論點鮮明、文筆流暢，為世所稱道。「解放」後長期任北京大學教授，以學者終其生。次為范老（文瀾），早年入共產黨，曾在延安工作，從事「中國通史」之編寫，協助毛撰寫「毛選」中有關歷史部份，出掌近代史研究所多年。范氏重史料，每撰一題，必是廣泛搜集史料方始下筆，故其「中國通史」多年尚未完稿。再為郭老（沫若），以文人研習歷史，縱橫古今，才氣橫溢，一掃史學文字之腐儒，其「古代社會」、「十批判書」均膾炙人口。另一老為侯老（外廬），中國思想史專家，編著有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自成體系，文理深奧。但這些史學家毛氏不屑一顧，而另推崇三位不太為人所知的學者，他們是：尹達、孫達人和戚本禹。為何毛氏看中這三人，竟把他們封為「權威」呢？現讓我來介紹一下他們及他們的史學觀點。



高喊「史學革命」的尹達

尹達。本名劉曜，河南大學肄業，原國民黨黨員。據本人所知早年曾受知於名學者李濟，得入中央研究院工作，隨李濟在河南安陽作殷墟的發掘考古。後赴延安加入共產黨，「解放」後以共產黨學術領導人身份先後任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教務長。一九五四年仿中央研究院史地所創歷史研究所，隸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任歷史所副所長（郭沫若任所長），兼考古所副所長。尹氏雖自稱隨李濟工作，實無學術發現和成就，「解放」後整理舊稿，僅勉力完成「新石器時代」一書，唯此書因觀點陳腐，文字晦澀，不為世所重，以致於半價出售亦乏人購買，造成積壓。尹氏自知論資歷和學識都不能與幾「老」抗爭，遂另闢途徑，上掛陳伯達、康生之綫。共產黨的哲學社會學部，名為研究社會科學，屬科學院領導，實際不過是中共的一個宣傳機構，內屬中共宣傳部（簡稱中宣部）領導，所謂的雙重領導。尹氏自有「伯達」、「康老」作靠山，勢甚跋扈，中宣部亦為之側目，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一霸。

尹氏在史學界首先打出史學革命的旗幟，鼓吹「解放」後史學界存在着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以馬列主義和毛思想的正確路線代表自居。原來，中共統治大陸以來，留在大陸的學者無論過去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被戴上「資產階級學者」的帽子，在歷次「運動」中受到迫害，這些人整天戰慄恐懼，唯尹達之流的共產黨學術領導人之命是從，自然不是尹氏鬥爭的對象。他的矛頭所指倒正是史學界的幾「老」，主要是樹大根深，各據一方的翦老和范老及其追隨者。這些人雖然也大談用歷史唯物主義

研究歷史，主張歷史上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却不敢全部否定歷史上傑出的人物和帝王將相的作用，而且他們舊習未除，研究歷史總要查閱文獻，搜集史實，論點未免有不符馬列之處。尹氏抓住這些方面，對他們進行猛烈的抨擊，組織一個寫作班子，以「史紹賓」（史學的哨兵）為筆名，到處發表文章，把翦、范等罵為「南霸天」、「×霸天」。尹達所持的觀點是，研究歷史要以毛澤東思想為紅綫。毛氏曾在「毛選」中寫道：「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叫做歷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氏又曾寫道：「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也唯有農民起義和革命才推動歷史前進。因此，尹達認為所謂的歷史，無非就是階級鬥爭史，寫中國歷史，就是寫農民的起義和戰爭，甚至封建王朝的體系都必須破除，以農民戰爭去劃分中國封建社會的階段。而且農民是唯一革命的階級，不得有絲毫貶損。尹達進一步強調研究歷史不是為研究而研究，那是資產階級的「純學術」，而應為現實政治服務，也即為無產階級服務。在理論和史料的关系方面，尹氏認為理論要統率史料，反對詳盡佔有史料的重要性，因為，馬列主義和毛思想是真理，已經正確反映了客觀歷史的進程，祇需予以說明。尹氏的這個論點，被人譏刺為「貼標籤」，拿些馬列詞句貼在材料上即可。尹氏因此大為光火，聲稱這是攻擊馬列主義和毛思想。

文化大革命前，尹達在中共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將史學革命進行到底」的文章，把上述觀點作了進一步的概述。正

是這篇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讚賞，以致文革剛開始毛氏成立文革小組，立即擢昇尹達為副組長，位張春橋之上，同時任尹達為「紅旗」副主編、馬列學院副院長，三「副」加身，使尹達步入中共理論界的最高層。正當尹達節節高昇之際，不料他的後院歷史所失火。幾個年輕的共產黨員不滿尹氏的封建專制統治，在歷史所貼出揭發歷史所問題的大字報。尹達自命為史學界的左派，所管單位為「紅色」單位，焉能容許他人造反，遂組織力量予以鎮壓，將造反者一棍打成「右派」、「反革命」，一片「紅色」恐怖。然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矛頭係針對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各階級政軍的「走資派」，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意旨，正在煽動各層群眾起來揭發領導的問題，尹達的所作所為適得其反，因此中央文革懼怕尹達的作法變成攻擊中央文革的口實，忍痛將他拋出中央文革，發還原單位接受批鬥。尹達做官夢破滅，頗惆悵，當他在中央文革的駐地釣魚台賓館等候處理時，禁不住仿唐人「黃鶴樓」詩句賦詩一首以表愁怨，其中有「他人都已開會去，此地空餘辦公樓」之句。從此尹達被打入冷宮，直到四人幫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結束。雖然尹達也獲得平反并重掌歷史所，歸根到底他仍屬文革派，而且一度搶佔了胡喬木和鄧力群的位子，始終未得中共新統治集團的重用，於一九八四年老病去世。

否定「讓步政策」的孫達人

孫達人。五十年代中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原歷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因與研究員張政娘之妻譚某通姦，被逼離開歷史所，赴陝西師範學院任教。孫氏曾在光明日報「史學」專

刊上發表一篇否定農民戰爭中農民軍對地主階級施行「讓步政策」的文章，引起史學界的爭論。「讓步政策」是農民戰爭史中的一個老問題，按照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農民起義和鬥爭推動社會前進，但是，歷史文獻記載說，農民軍在和地主武裝鬥爭中有的會和地主軍談判妥協，有的會投降地主軍，那怕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如唐代的黃巢、明代的李自成、張獻忠都不例外。怎樣解釋這些事實呢？史學界一般的說法是，當農民軍處於不利地位時，為保存實力和避免被消滅，往往向地主軍妥協投降，也就是「讓步」，由此產生所謂的「讓步政策」，彷彿這是農民戰爭的一個普遍規律。孫氏則認為，農民和地主的鬥爭是絕對的，不可調和的，作為封建社會的革命階級，農民不能向地主讓步，不存在什麼「讓步政策」。孫氏的文章是從馬列理論上去否定「讓步政策」，但他完全迴避了史料中有關農民軍妥協投降的記載，沒有作出具體的解說。因此，當他的文章剛發表，遭到一些人的責難，支持者寥寥。迨至毛澤東肯定孫氏觀點的消息傳出後，史學界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報刊上發表的又都是支持和吹捧孫氏的了。這次看來是一個所謂的學術討論，在史學界引起一場災難，凡是同意「讓步政策」的，不管過去是公開發表有文章，或在某些討論會上表了態的，都被當作史學界的「右派」，受到不同程度的攻擊，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更因此被批鬥。個別良心未泯的學者，雖不敢承認農民軍對地主階級實行過「讓步政策」，却堅稱農民軍在某些條件下對地主作出過「讓步」，因為這是事實。這種說法同樣被當作折衷主義而遭批判。總之，「讓步」、「妥協」等類字眼都不能用來描寫農民戰爭。

孫達人因這篇文章崛起後，成為陝西省的紅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和戚本禹特地把他從陝西調來北京，主持農民戰爭史的編寫工作。寫了幾年也沒有寫成，又返回陝西。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孫氏因沾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邊，有一陣子也受到冷遇和批判。有人出來揭發說孫氏的文章是剽竊某次農民戰爭討論會上一個人的意見。但孫氏是個讀書人，介入文革兩派鬥爭不深，有時則是被利用，因此近年來逐漸獲新統治集團的啟用，被提拔當陝西省副省長，主管文教。孫氏是研究農民戰爭史專家，出版有農民戰爭史數卷。

揪出「革命叛徒」的戚本禹

戚本禹。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紅極一時的戚本禹，原係國務院的一個小幹部，中等文化水平。和孫達人的情況類似，戚氏也因一篇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名震史學界。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兩大支柱，陳玉成被叛徒出賣而遇害後，李秀成成為殘局的唯一支撐者，堅持和清兵對抗，但太平天國最終覆滅，李秀成也為曾國藩所俘，在獄中曾寫過自述一份。過去，這份自述的內容祇有從曾國藩文稿中間接得知，因文字鄙俗，言詞可憐，被學者們懷疑係曾氏偽造。後原自述稿被發現，經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考訂筆迹無誤。使羅氏大惑不解的是，自述表示自己對參加太平軍的懺悔，並且向曾國藩乞降，和一個參加革命鬥爭多年的領袖形象完全不同。羅爾綱沒有膽量把李秀成這樣一個被中共稱頌為農民革命領袖的人物說成是叛徒，祇得曲意解釋說李秀成的投降是假的，也即是「偽降」，其目的

在於迷惑曾國藩，保全自己的生命以圖再起。自述最後說願意替曾國藩去招降太平天國的餘眾，這被解釋為李秀成企圖聯合曾國藩等漢族將領共反滿清。羅爾綱的「偽降」說是史學界長期所接受的觀點，而且被用來解釋其他農民軍領袖的叛降。但戚本禹從根本上推翻了這個說法，明確指出李秀成不是「偽降」，而是真降，他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

戚本禹的論斷從兩點講是難以駁倒的。首先自述的筆迹經查證確係李秀成手迹，這就排除了偽造的可能性。其次，通篇語氣都是搖尾乞憐，發自內心的悔恨和貪生怕死，并非寓有其它涵義。史學界始則對戚文保持沉默，繼則反對。當大家知道周恩來也對戚文不滿，說「不要醜化英雄人物」時，史學界大有形成圍攻戚文之勢。但未曾幾何，毛澤東就表示支持戚本禹的觀點，指出「忠王不忠」。於是史學界又一次來個急轉彎，「偽降」說遭到批判。戚本禹本人在文革開始後一步進入中央文革，成為其中一名重要成員。經常以文革小組發言人面目出現。他的氣餒之盛可從以下幾個例子看出。有次召集造反派頭目講話，他宣稱除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外，其餘的領導都可以貼大字報，同時唸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的名字：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有人遞條子問周恩來怎麼沒有？戚還不正面回答，而是當眾說：「現在我再唸一遍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的名單……」仍然沒有周恩來。這就告訴大家，周恩來已被排除在毛氏集團之外。果然不久就有北京外語學院一個造反派組織貼出反周大字報，並成立反周的陣綫。又有一次戚本禹接見一些學生代表，問道：「有個人你們怎麼不去揪？」學生問是誰，戚點了朱德的名。緊接着北京就出現大量「砸爛豬頭」、「打倒朱

德」的大標語，嚇破了朱德的膽。戚本禹的激進言論很得部份學生的支持，有個造反組織在天安門前貼出「追隨戚本禹同志在大風大浪中鍛鍊」的巨幅橫標語，使行人側目。圓滑的周恩來為保持自身的祿位，不僅把江青捧成「旗手」、「紅色戰士」，也對文革小組成員禮敬有加。有次周和戚共同去煤炭部處理部長張霖之自殺的事件，周講話後請戚講話，并向群眾介紹說：「這是我們年輕的歷史學家。」戚則不顧周而大談支持造反派。

戚本禹的垮台富有戲劇性。正當他和王力、關鋒處在權勢的高峰時，陳伯達、江青突然把他們「端」了出來，宣佈他們是「小爬虫」，由專政機關逮捕入獄。就在這事的前幾天，在一次接見群眾的會上，有人問及文革小組內部的情况，江青回答說文革小組是團結一致的，沒有意見分歧。為什麼毛、江那樣急於把這條賣力的狗拋出去呢？原因可能是王、關、戚鋒芒太露，招致軍隊和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同時他們驕狂到過早洩露毛、江的作戰部署，例如毛的一個主要打擊目標，除劉、鄧外便是周恩來，但毛是要一個一個吃掉，對周還要加以利用，而王、關、戚則處處把矛頭針對周，不利於毛的鬥爭。王、關、戚倒台後，北京市衛戍區司令傅崇碧藉此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進行搜捕，毛氏集團不得不宣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反革命爬蟲，在北京掀起一次大遊行，而且荒謬地把楊、余、傅定為王、關、戚的後台，用這種手段把左、右兩股勢力打下去。戚本禹被關押多年後，近幾年風聞可能被釋放出來，但一直未有下文。

戚本禹的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劉少奇的部下大多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工作者，很多人曾被捕入獄，在獄中寫

了悔過書或表示要自新，於是按照戚對李秀成的批判，這一大批人都被定為叛徒，上起劉少奇本人、彭真、劉仁、中組部的安子文、統戰部的徐冰，通統給關進共產黨自己的牢房。批判也及於瞿秋白，大概歷史有點作弄人吧，瞿秋白在監獄裏也寫了篇「多餘的話」，像李秀成那樣後悔參加革命，也是搖尾乞憐，不見一絲革命家的氣概。現在中共雖給瞿秋白平了反，但無法對瞿親筆所書「多餘的話」作出解釋，其實用不着解釋，共產黨員是血肉之軀，又有幾人能在生死面前堅貞不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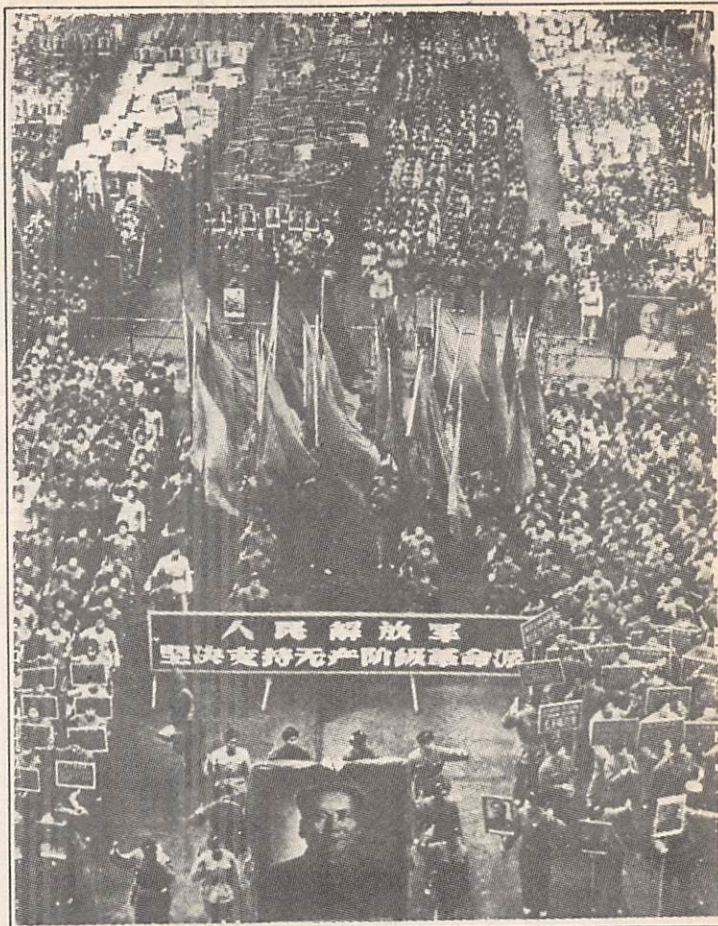
毛澤東的極端歷史觀

以上介紹了三位史學權威及他們的觀點，可以看出，毛澤東看中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的學識，而是因為他們的史學觀點符合毛的思想，準確說，符合毛的鬥爭哲學。鬥爭哲學或矛盾哲學不是毛的發明，是師承馬列，但毛氏有發展，或不如說修正。馬克思主義說，事物是矛盾的統一，由一對矛盾組成。矛盾的雙方相互依存，又相互對抗，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對抗性。正是這種同一性和對抗性使得事物存在和發展。毛氏不承認事物的同一性，祇承認對抗性。在他的名著「矛盾論」中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闡明，但「解放」後他的言論却把這點表示得再清楚不過了。例如，哲學界對楊獻珍合二而一的批判，毛氏就指出，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不是合二而一的。完全否定了矛盾的同一性。楊獻珍因此被解除黨校校長職務，發放到哲學所吃口閒飯。批判合二而一論，也涉及到其它各意識形態的領域，毛氏贊同尹達等的論點，是他在史學界反對階級調和論——即哲學上的合二而一論——的反映。

為了否定瞿秋白，歷史人物太平天國的李秀成，亦遭株連。



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不存在妥協讓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亦復如此；當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由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勢力仍然存在，由於資產階級思想仍然發生影響，階級鬥爭就沒有止息，有時甚至更加激烈。在整個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將繼續進行下去，直到地球上消滅剝削階級為止。到那個時候全世界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上就是毛澤東鬥爭哲學在中國的運用，除了無休止的鬥爭外，毛氏從來沒有給人民勾劃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天堂的形象，也沒有規定到達這個天堂所需的時間，如著名修正主義份子伯恩斯坦所說：「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以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始終遵循這一條鬥爭道路，而歷史的悲劇恰在於，共產黨一小撮領導人用鬥爭學說蒙蔽廣大勞動人民，趁日寇入侵之機、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內部傾軋，以武力奪取政權，打出無產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只有一個字：鬥！

階級專政的招牌，對人民實行鎮壓，把千千萬萬無辜的百姓，包括并不反對乃至支持中共的百姓投入血海。阻止生產發展，破壞文化，置人民生活於不顧，三十多年的統治使大陸落後於同時代西方社會數十年，這一切都是中共鬥爭哲學造成的後果。

歷史上新的封建王朝往往在鞏固了統治後要展開一場內部鬥爭，大殺功臣，共產黨也不例外。在掃蕩了所謂的外部敵人後，中共統治集團內必然發生內訌，毛氏的鬥爭哲學在這裏仍發揮作用。按照毛氏和中共一貫的說法，黨內鬥爭是兩個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因此也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沒有妥協的餘地。

早在六十年代初進行農村四清工作時，劉少奇對王光美領導的河北桃園四清工作組下達的指示說，四清是清查「四不清」的問題，是黨內黨外矛盾的交叉。而不久後毛澤東又在另一份中央文件中把四清的性質定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四清運動上綱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文化大革命就是按這個調子進行。按毛氏的鬥爭哲學，對階級敵人不能手軟，因此劉、鄧為代表的大批走資派在文革中遭到清洗、迫害，使他們自身嚐到階級鬥爭的殘酷滋味。為達到摧毀劉、鄧勢力的目的，毛氏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發走資派的罪行，但正如馬克思所說「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們主觀

意志為轉移的」，人民群眾從鬥爭中真正看到的，不是什麼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罪惡，而是共產黨各層幹部的凶殘、腐化、虛偽、愚昧，中共的陰暗、醜惡也隨此暴露在人民群眾的面前，中共多年統治的騙局也徹底被戳穿。這是毛澤東所始料不及的。

然而，如果僅僅把毛思想解釋為一個「鬥」字，或者說成是馬列鬥爭理論在中國的實際運用，那將是不全面的。歷史上農民起義軍對地主階級的妥協讓步，毛氏可以不作具體解答，把它留給中共的歷史學家去討論，但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却和代表大買辦官僚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有過多次談判，幾次合作，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接受國民黨政府領導，軍隊改編為國民黨的第八路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振臂高呼過「蔣委員長萬歲！」怎樣解釋這些現象？是不是「讓步」？共產黨有沒有實行過「讓步政策」？毛澤東當然也不會正面去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祇能從毛的一貫言論、作法去加以解說。

從「毛選」中收錄的若干篇有關和國民黨作鬥爭的文章看，毛氏強調的是「針鋒相對」，同時毛氏又指出，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這就是說，毛澤東並不認為共產黨要向國民黨妥協，否定了中共實行「讓步政策」的可能性。那麼，在日寇入侵的民族危亡時期，中共高唱聯合抗日的調子，不能看成是中共把民族利益置於高於一切的地位，而在階級鬥爭上作出妥協。反之，這正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手段，利用抗日口號爭取輿論，瓦解國民黨的剿共攻勢，分化國民黨內部，以圖共黨的最後統治霸權。所謂的談判、合作本身，不過是配合中共武裝鬥爭的一種鬥爭策略而已。在革命口號的掩蓋下，向資產階級作鬥爭，是可以

採取一切手段，包括說假話，「兵不厭詐」。毛氏鬥爭哲學的這個特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作了很好的註釋。北京師範大學有個叫林杰的理論教師，和中央文革小組有直接聯繫，本人當過幾天康生的秘書，在有一次接見學生代表時，總結了階級鬥爭的原則，這便是：搞階級鬥爭無誠實性可言。概括說是用「詐」去打敗敵人。許多學生相信這個原則是正確的革命方法，把他的話轉抄和傳播。林彪自我爆炸後，中共中央文件傳達林彪的問題，其中有林豆揭發她老子曾說：「搞階級鬥爭就得說假話。」這是一個深通毛思想，洞悉中共內情的人私下講的實話！

毛氏的這種思想及中共在大陸的實踐，給大陸人民帶來空前的災禍，也毒害了人民的思想。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為名，共產黨可以採用任何卑鄙的手段去打擊它眼裏的敵人。反右鬥爭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前一階段的「整風」中，中共動員群眾給黨提意見，毛澤東親自接見一批高級統戰對象，各方的民主人士，毛氏態度誠懇地歡迎大家幫助中共整風，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不打擊報復，並且在這次接見會上做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說法。一些民主人士輕信了毛的講話，給中共提了意見，有的意見還刊登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其結果是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和長期迫害。人們可能不理解，像毛澤東這樣一位「偉大領袖」，怎麼會言而無信呢？但按照毛思想，這一切都符合毛氏和中共的鬥爭邏輯的。對於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為什麼共產黨不能按革命鬥爭需要用手腕去揭露他們？人民日報的反右社論就坦承這是「陽謀」，是「引蛇

出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舊的道德觀根本不適用。在共產黨的詞彙中不存在「言而無信」、「背信棄義」等類字眼的。後來共產黨正式公佈毛氏在反右前接見民主人士的那次講話，又加進了原來沒有的一些話，如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可以轉化成對抗性的，以掩飾中共的欺詐行為，好像毛氏早已向那些民主人士發出警告了。

在思想毒害方面，因為中共在進行階級鬥爭中要說假話，也就逼使人民跟着說假話，如果你有親友或同事被領導定為鬥爭對象，那麼你必須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起來揭發批判，否則你就是立場有問題，揭發得越多，批得越深，越得到中共領導的讚賞。於是大家為圖自身的苟全，祇有抓住一些現象，給對方無限上綱。一些人甚至捏造事實，無中生有，置對方於死地。有問題的人在中共「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威恐下，也被逼交代問題，或編造一套假話以圖過關。有的為「立功贖罪」，不惜亂咬別人。咬來咬去的結果是，很多問題已經無法搞清了。鄧氏集團上台後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活動，派出大批幹部，花費國家大筆款項，四出調查落實，仍然留下數不清的疑案。有的事真真假假，永遠也不得水落石出。舉個例子，反右期間和林希翎、譚天榮等齊名的人民大學右派葛佩琪，據揭發說他要殺共產黨人。現在經調查落實，他本人根本沒有說過這句話，他祇好意地提到，如果共產黨搞得不好，就會遭到人民的反對。由於這兩句話相差太遠，有記者問葛是否要追查一下，葛表示寬大說不必了。到底葛說過要殺共產黨人沒有？他內心對共產黨究竟是否懷有仇恨，祇有天知道。近年來大陸上出版了一本意大利譯本的童話，叫做「假話王國」，說的是有個國王命令全國人說

假話，越假越有賞，說真話要受到嚴懲。這正是大陸的寫照。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宣揚的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及正直誠實的傳統，被中共破壞無遺。

鄧小平上台後，開始批毛貶毛。早在一九八〇年，胡喬木召集一批中共理論家討論毛的評價問題，與會者幾乎一致認為應當批判毛，一些政治理論工作者在鑽研了毛的著述後指出，毛思想不符馬列主義。社會科學院的大院甚至出現點名批毛的大字報。意見提交鄧小平，小平權衡利害得失，終於不敢公開把毛打入地獄，而把毛說成是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的偉大領袖。對於毛思想，鄧小平等解釋說，它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專利，而是集體的創作，集眾人智慧之大成。鄧小平當然是創作者之一。因之在鄧氏集團提出的四個堅持中有堅持馬列和毛思想這一條。那麼，鄧氏要堅持的是什麼毛思想呢？

我們應當同意鄧小平剝奪毛澤東對毛思想的獨家發明權，的確，中共的其它領導人都是毛思想的發明人，正如中共所犯的錯誤不能全歸之於毛澤東一人。但是，如上所說，抽取了毛氏或中共領導人共同的一套階級鬥爭哲學，毛思想就變成空虛無物，以毛思想作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就得改名換姓。可以肯定，鄧氏在大陸上作出的政治口號的改變，如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等等，仍不能違背這條鬥爭路線。不提某個口號並不等於說中共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中共不鎮壓所謂的「階級敵人」，容許人民享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對待台灣仍和過去一樣採取欺騙手法，高唱國家統一的調子，迫使國民黨人談判，麻痺國民黨人的鬥爭，分化國民黨內部，同時又以武力相恐嚇，軟硬兼施以達到奪取台灣的目的。

毛澤東長短論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袁大戈

毛澤東爲什麼搞「文革」？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主要動機目的是打垮劉少奇、鄧小平的權力網，把因「三面紅旗」慘敗而失去的黨政財文大權奪回來。

毛從遵義會議後奪取黨的領導地位，經長征、抗戰、攆走國民黨、當上國家主席，蜚聲中外，威望如日中天。爾後一次次大獲全勝的政治運動，愈益抬高毛的身價。由於毛剛愎自用和對生產的無知，胡搞「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遭到徹底失敗，餓死了兩千萬人，損失了億萬財富。劉少奇的「三自一包」，稍稍挽回了「公社化」造成的國民經濟總崩潰的危機，使毛多年積聚的威信一落千丈，不得不於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七千人大會上做了檢討，被迫退居第二線，讓劉少奇當主席。

毛一向好強逞能，對「退居二線」不服，感到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因而惱羞成怒，懷恨在心，盤算如何應付這一難堪局面，如何對付劉少奇，挽回自己的面子，思想上便自然而然地醞釀著「文化大革命」達五年之久。

廬山會議，彭德懷針砭「三面紅旗」，被毛罷官，失去自由，引起黨內極大的憤懣，出現了「海瑞罷官」和「燕山夜話」之類含沙射影的作品，矛頭直指，惹怒了毛澤東。一九六五年一次中央擴大會議上，毛要追究吳晗文責，彭真不同意，毛無可奈何，祇得找上海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接著搞臭「三家村」，至六六年春，彭真的「二月提綱」遭到批判，轟轟烈烈的「文革」序幕，從此揭開。

從毛早年的詩詞中，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不難窺見毛有帝王思想，在中國做皇帝，名垂青史，稱王稱霸。同時，「解放」以後，從毛的「抗美援朝」，「支援」越南、古巴，「遠交」阿爾巴尼亞，「救濟」東歐共產國家和亞非拉的許多國家，在國庫匱乏、人民窮困的情況下，動輒數千萬、數億人民幣，真是揮金如土！這種媚外「大手筆」，與我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極不相稱！很難否認：毛沒有攫取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和在世界舞台上稱王稱霸的野心。這種勃勃野心，也是發動文革的動機之一。

其次，毛對馬列主義有獨到的見解，認爲馬列雖屬天經地義，但未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仍需不斷豐富、完善、補充和發展。這種「發展」了的馬列主義，便是「毛澤東思想」。毛想用「毛澤東思想」統治中國和解放世界，必須樹立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把毛這個「人」，昇華到「神」的地步，把「毛澤東思想」，抬高到「聖經」的地位。只有利用「文革」運動那種規模，才能完成上述「神化」的任務。

毛因大權旁落，深感手中無權，不僅不能挽回失去的面子、地位和崇高聲譽，死後難免像斯大林那樣，措罵名，挨鞭屍，而且，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人們的靈魂和解放全世界，也將遙遙無期。因此，毛絞盡腦汁，企圖奪權。但礙於劉鄧勢力雄厚，用行政命令或黨內鬥爭的方式，都無把握奏凱，冥思苦想，搜索枯腸，一不做，二不休，終於想出一個唯一可行的方案：大規模發動群眾，利用青年學生，由下而上地層層剝去劉鄧勢力的皮，達到奪權的目的。這一精巧構思，是毛「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鬧事本性決定的。

毛十分清楚：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幾十年的共產極權，是「文革」必勝的歷史條件；兩千多萬愚昧無知的共產黨員，幾十年愚民政策教導出來的渾渾噩噩的群眾，是「文革」必勝的群眾基礎；一黨專政、一言堂的政治制度，和統制經濟、集體生產的經濟體制，是「文革」必勝的有利因素。

毛澤東不以黨國前途和人民利益爲重，爲了滿足個人名利私慾，一人獨大，意氣用事，洩私憤，圖報復，窩裏反，妒賢嫉能，黨同伐異，不惜喪心病狂，孤注一擲，搞得狼烟處處，白骨累累，是非顛倒，玉石俱焚。十年文革是我國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毫無進步意義，應予徹底否定。

毛澤東與大漢奸

大漢奸吳三桂，引進清兵，攻佔北京；毛澤東引進馬列主義，禍亂中原，陷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境。

大漢奸汪精衛，八年抗戰期間，搞「和平反共」，分化抗戰力量；毛澤東借「抗日救國」之名，行「坐大八路」之實，積聚內戰力量。大漢奸汪精衛尚能嚴詞拒絕日本軍部的「徵兵」要求，保存了無數中華男兒的生命；毛澤東悍然指派「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送死，造成了數十萬流落異邦的冤鬼孤魂。

大漢奸殷汝耕、王揖唐、王克敏搞「華北自治」、「內蒙自治」、「蒙疆自治」，討好日本主子；毛澤東搞「邊區自治」、「蘇維埃紅色政權」，獻媚當時的蘇共頭子。

大漢奸石敬瑭稱契丹酋長為「父皇帝」，自稱「兒皇帝」；毛澤東曾稱蘇俄為「社會主義祖國」，稱蘇聯為「老大哥」，奴顏婢膝，玷污炎黃子孫的身價。

大漢奸王瀾、汲桑等著「胡服」，學「胡語」；毛澤東曾強令學校教「俄語」，提倡穿「列寧服」，批孔孟，破「四舊」，千方百計毀滅中華文化。

認賊作父的毛澤東斥令周恩來，婉言謝絕日本的戰敗賠款六百億美元。

喪心病狂的毛澤東，在阿爾巴尼亞「浪費」了二百億元人民幣，在越南「浪費」了二百億元人民幣，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浪費」了「相等於三個八年抗戰的財富」。所有東歐共產國家和亞非拉的許多國家，毛澤東都曾投下名目繁多、慷慨無私的巨額「浪費」。

毛澤東以大陸人民的血汗錢，收買籠絡外

人的心，妄圖取得意識形態的控制，進而攫取第三世界的領導地位。可是事與願違，有的先後跟毛翻臉不認帳，有的也不十分聽從毛的使喚。

祖國大地，一窮二白，而毛澤東巴結外國人，揮金如土，慷大陸老百姓之慨，實為一大蠹賊。

毛澤東逼出林彪的

「九·一三」外逃

自詡「頭腦特別靈」的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携眷外逃，坐機中彈，機毀人亡。這個紅極一時的聰明人，怎麼會走上外逃的道路，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場？

毛搞「文革」的策略是發動群眾和紅衛兵，造反串連，造成天下大亂，亂中奪權。當時劉、鄧大權在握，顯然這是一著險招。毛一生謹慎，百鬥百勝，能反敗為勝，是因考慮週到，準備充分，不「鬥」無把握的「爭」。迷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毛澤東發動「文革」前，如不得到林彪的默契，是絕不會冒然行事的。「助紂為虐」的林彪，在毛同意憲法中規定他的「接班人」地位後，才矢志效忠，但未料到毛「自食其言」。

文革高潮，劉、鄧權力網已被衝破，造反派仍到處武鬥，愈鬥愈亂，完全失控，無法「亂中奪權」。常此以往，毛有「亂中失權」的危險，因此求助林彪派軍介入，以有組織的軍隊，對付無紀律的暴力群。

六六年十二月中央軍委決定介入奪權鬥爭，以「三支兩軍」為由，搞「支左」奪權，「軍管」鞏固。各省市自治區和各機關單位，相



毛澤東與林彪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

繼成立以軍代表、幹部、造反派為骨幹的「三結合」軍事管制委員會。大局已定，林實踐了諾言，功不可沒。

劉少奇下馬，林彪理應輪當主席，但久無動靜。林叫嚷「一個國家不能沒有主席」，答是「不設國家主席！」林想：(1)毛是否有「家天下」打算，傳位江青？果如是，林某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受人利用打前鋒，事成後一無所獲，顏面攸關，為誰辛苦為誰忙？(2)「文革」竄紅的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年輕位卑，是否老毛有意培養做江青扶鸞保駕的人選？因為要年長位尊的老幹部向江低頭哈腰，事實上困難。(3)毛曾經說過：「男同志能幹的事，女同志也能幹」。是否意味著「毛能當主席，

江也能當主席？」(4)漢有呂后當權，唐有武則天女皇，清有慈禧太后垂簾問政，江青「文革」掌權，是否要「接班」？愈想愈覺得黨章規定「接班人」是騙人的東西！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野」嫡系李德生調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軍中此職極關重要。「四野」的林彪意識到，老毛安放在軍中的監視哨，將來可能逐漸取代自己的地位。

林親身體驗到受騙上當的痛苦，親眼見到黨國元老被輪番批倒批臭的慘狀，深覺老毛心狠手辣，殘酷無情，不殺不足以洩心頭之恨。用林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話說：「幹掉這個B29」（毛的代號）！

林的女兒林豆豆向周總理告發，林正待發難，功敗垂成。

可見林的殺毛之念和外逃，是毛「說話不兌現」而逼出來的。共產極權制度下的權力爭奪，就是如此爾虞我詐，殘酷無情。

析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在黨中央委員會上親自制訂了「五·一六」通知，即「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是一部掌握「文革」進程的綱領性文件。

「通知」規定「文革」的性質是「反修防修」，這是為了掩護奪權而施放的烟幕。衆所周知，「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從鄧手中奪權，撈回毛因「三面紅旗」失敗而丟了「國家主席」的官，揪出暗藏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為了這種私人目的，搞「文革」規模的運動，不僅師出無名，難操勝算，而且礙難啓口。毛左思右想，想出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反修

劉少奇在全國人大代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人大委員長。



防修，來掩蓋他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一旦奪權的陰謀得逞，毛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設不設國家主席一個樣。

中共建國後，一直是大「左」小「左」當權，並無「修」的潮流出現。從「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的內容分析，它只對毛弄權專斷發洩不滿為主，並無綱領性「修」的內涵。「白貓黑貓」、「三自一包」和劉的「論修養」，都不能說明是修正主義。至於目前鄧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是「文革」逼出來的，又當別論。

「通知」強調「充分發動群眾」。一九二七年起至「文革」前止，毛在黨內多次權力鬥爭中始終佔上風，可說無往不利。這次一反常規，發動群眾奪權，是因為全國各機關各部門

都被劉鄧的黨組織佔領，黨內鬥爭奪權，凶多吉少。只能利用群眾，造成聲勢，一舉摧毀劉鄧的黨，然後收拾殘局重建。

但是，毛並未放鬆黨內奪權的努力。從六二年到六五年，江青以「戲改」掩護，神不知鬼不覺，在上海勾結文化打手。事實證明，上海是發動「文革」的權力基地，一月奪權也從這裏開始。

「通知」規定「要文鬥，不要武鬥」。其目的，要劉鄧束手就擒，以便紅衛兵上竄下跳，造成天下大亂，亂中奪權。如遇阻力，則可慫恿江青，「文攻武衛」，使擁毛派始終處於主動地位。再說，「文革」既是「反修」，而「修」被定性「反革命」，毛早說過：「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同是「修」這種「反動」的東西，先說「不打不倒」，後說「不要武鬥」，二者不能同真。事實證明：「不要武鬥」是「偉大領袖」撒謊。

「通知」號召「破舊立新」。所謂「舊」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是數千年來日積月累而形成的，要在旦夕之間，不分精華糟粕，一律剷除，換上四「新」，未免矯枉過正。所謂四「新」，主要是「新」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可見毛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用它統治中國，解放世界。

用「毛澤東思想」 評價毛澤東作為

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囿於立場觀點和感情的局限，態度往往不能公正或客觀。何謂公正？見仁見智，各不相同。這就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標準。除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標準」之外，擬用曾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毛澤東思想」來評價毛澤東。

一、毛澤東「自我神化」。早在二、三十年代，從毛詩詞中即可見到他「渴慕」天子之心，躍然紙上。例如：「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沁園春「雪」）

解放後歷次運動把毛越抬越高，發展到「文革」，唱「語錄」歌，強迫人們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強迫家家掛毛像，馬路電線桿上掛「語錄牌」，商店購物時，顧客和店員先背一段毛「語錄」，各種報頭刊首或商招，印上「最高指示」，連刑事犯罪判決書上也不例外，甚至要求用「毛澤東思想」灌滿人們的頭腦，改造人們的靈魂，跟宗教的「聖靈充滿」，何其相似！神化毛澤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有人認為毛的「神化」是由於黨內野心家逐漸製造對毛「神化」的氣氛。例如劉少奇首先提出用「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接著林彪提出「一貫正確」，郭沫若將毛比做「紅太陽」等等。因此得出結論毛的「神化」應該強調客觀條件，而非主觀原因。

這是一個客觀與主觀、或外因與內因孰主孰次的問題。毛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成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矛盾論）。由此可見，毛的「神化」是內因促成，不該強調客觀。文革中劉、林垮台，在毛寫的「砲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裏，或批林批孔文件裏，竟沒有「製造神化氣氛」的罪名。據此判斷，當年毛澤東受到「客觀」的神化，

「主觀」上是舒服的。

二、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殺人不用刀。五八年反右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億民減口，萬馬齊瘠。毛在「龍心大悅」之餘，靈機一動，心血來潮，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三面紅旗」運動。毛原以為「公社」化運動會勝利成功，未料到他自已生產上一竅不通，又無視農民的私有觀念。公社成立後，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得而復失，變成了捆綁在土地上進行無償勞動的農奴，嚴重地挫傷了生產積極性，對抗勞動，消極怠工，造成連續三年的大飢荒，餓死農村人口兩千萬人。（見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

農民的私有觀念是「人性」的正常表現，跟毛否認人性的共產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毛在實踐中慘敗。

毛說：「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部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實踐論）。

三、毛澤東的「大躍進」勞民傷財。與搞「公社」同時，毛還搞了一次貽笑中外的「大煉鋼鐵」，男女老少齊動員，城鄉到處砌高爐，挨家挨戶搜集鐵窗鐵門破銅爛鐵，火車加班，加點運煤，折騰了半年，發現粗製濫造的生鐵含碳量太高，不管用，於是砸高爐，宣佈「大躍進」壽終正寢。這是毛的剛愎自用，幼稚無知，對生產一竅不通，盲目指揮的結果，勞民傷財，造成國家億萬元的損失。

毛說：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又說：「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矛盾論）。毛這次慘敗在於他主觀唯心，只想到可能成功的一面

，未想到可能失敗的一面，埋頭蠻幹，一敗塗地。有人認為毛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心是好的，是想加速我國工農業建設，即動機好，效果不好。毛說：「效果是檢驗動機的標準，我們做事，寫文章，既要考慮動機，也要顧及效果，只注重動機，不顧及效果，就好像醫生只管看病開藥方，病人吃死了是不管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四、「用人唯順」、「用人唯親」是毛澤東的用人哲學。毛用人強調「德才兼備」，事實是，「順從」毛者便是「德」，幹部無才便是「德」。試看毛親自提拔的一些高官顯要：「弑君犯上」的林彪何「德」？兩個「凡是」的華國峯何「才」？「杆麵杖吹火」（一竅不通）的王洪文，何「德」何「才」？半文盲陳永貴，七三年被毛圈為中共政治局委員，七五年被毛捧為國務院副總理；陝西紡織女工吳桂賢，被捧為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副總理；瀋陽榮攤賣菜的李素文和陝西工人姚連財，均被圈為「人代會」副委員長；江青被提拔重用，一步登天，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毛的姪女王海蓉，離開北大不到十年，被擢升為外交部副部長；當年捧毛有功的劉少奇，被毛欣賞重用，逐漸飛黃騰達，終於當上了國家主席；「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林彪，步步高陞為「副統帥」；奴才郭沫若，紅到老到死。

實踐證明：替毛歌功頌德者們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稍有不「順」，則被打入冷宮，置之死地而後快。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和文革中被折磨致死致殘的衆多高幹，都是明證。這便是毛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用人唯「順」哲學。毛用人不注重學歷，他本人出身中級師範，又未曾出國深造，手下赤過腳穿草鞋的「大草包」太多，如注重學歷，不僅比留法的

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留德的朱德，留蘇的劉少奇，留日的郭沫若等是相形見绌，而且他那套倒行逆施的方針政策也無法開展。毛曾公開揚言：「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容易出修正主義。」就是說，共產主義荒謬的空想，容易受「草包」們歡迎，而不容易為知識份子所接受。毛親手搞的歷次政治活動，一呼百諾，轟轟烈烈，都是那些「草包」們捧場賣命的。

五、在毛「我們一定要造原子彈」的指示下，從一九六四年第一枚原子彈試爆起，至八〇年最後一次試爆止，先後共達二十多次。每次試爆，據說需要動支公帑數億或十數億元，總共花費了數百億元人民幣。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家們嘔心瀝血所花費的時間，難以數計。中共一再宣稱：「我們絕不首先使用原子彈。」就是說，等人家先扔了，然後我們再用。目前世界上只有美蘇兩霸可能發動原子戰，其原子數量比我們多，質量比我們好，等他們先扔了，我們再用，大陸已被炸成什麼樣子？還手恐怕也來不及！

這樣看，毛搞原子彈，簡直是大陸人民的災難。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趙紫陽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紀念「國際和平日」大會上，莊嚴宣告：「中共今後不再進行大氣層核子試爆」，正式回答了「中國有無必要製造原子彈」的問題。

既然毛澤東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花費巨額經費去造「紙老虎」？爲了製造不派用場的「紙老虎」，而花費偌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當然是浪費！毛說：「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毛選卷一第一二九頁）。

●民運報導●

上海民運領袖傅申奇獲釋

（上海）顏君勵

好消息！上海著名的民主運動領袖傅申奇，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獲得假釋，回家與親人團聚。

我們都親切地稱他爲小傅。小傅今年卅二歲，在獄中渡過了五年多的鐵窗生活。一九六八年，小傅就讀于上海工藝中學，七二年進入上海動力機廠當工人。一九七八年，他投入當時轟轟烈烈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同年十一月，與一批民主青年發起組織「振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傅申奇創辦上海民辦刊物《民主之聲》，同時加入「上海青年經濟研究會」。一九八〇年，傅申奇在工廠參加上海基層人民代表選舉，自薦爲候選人，與官方指定的候選人競選，開工人競選人民代表之先河。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全國民運人士自發成立「全國民刊協會」，並出版會刊《責任》，小傅是該協會成立的積極推動者。自《責任》第三期起，小傅擔任主編。

一九八一年四月，在中共中央命令下，上海公安局逮捕了傅申奇，並於八二年初對其進行秘密審判。

上海市公安系統中，某些有良知的人士同情傅申奇。公安局打進「上海青年經濟學會」的人員，竟被小傅等一群青年人的愛國熱情所感動，該人員不但向傅申奇等自暴了身份，而且還向民運人士主動提供信息。

按小傅參與民運的程度，他的所謂「罪行」，要比北京的徐文立和廣州的王希哲要「重

」。然而，由於上海市公安系統中同情小傅的人員對上級進行了必要的抵制，小傅被判刑七年，而徐文立和王希哲都被判了十五年。

傅申奇被關入上海提籃橋監獄之後，所受到的待遇，也較北京、廣州被關的民運人士要好些（詳見《中國之春》一九八五年七月號廿六頁——編者）。

自去年起，上海公安局二處就請小傅的家人吃飯，放出可以假釋小傅的風聲，後來，不知何故擱淺。

在小傅的家人、朋友和海外內人士的不斷呼籲、奔走下，在上海市公安局內有良知的人士的協助下，小傅終於今年七月廿八日獲得假釋，結束了五年多的囚犯生活。

國內當權者正在大造政治改革的輿論，小傅被放，是不是一個信號——釋放全部在押民運人士的信號？就目前情況判斷，難有這樣的結論。小傅的被釋，可能僅是一個個案。據說，北京的徐文立、魏京生仍被嚴密囚禁，徐文立甚至被關入單身鐵牢，嚴禁與其家屬見面。據北京來的朋友講，徐文立的家人擔心徐在獄中被迫害致死。另外，廣州王希哲的近況也未見明顯改善。

我們在此向中共當局強烈呼籲：你們不是要說即將進行政治改革嗎？那就兌現一下吧，先把所有無辜被關的民運人士放出來，否則，你們把政治改革喊得再響，也是無人相信的。

從柏恩斯事件

看

中國開放政策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朝開牆

柏恩斯事件的始末

柏恩斯先生 (JOHN F. BURNS) 是美國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駐中國北京記者站主任，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始在華任職，持英國護照。今年六月底，他爲了更進一步地熟悉中國風土人情，親身體會一下中國人民的生活在改革以後所發生的變化，決定騎摩托車漫遊中國一番。出發前，他邀請了麥克那尼 (MCNALLY) 及張大興 (ZHANG DAXING) 同行。麥克那尼是美國司法部律師，應邀在北京大學講學。張大興是留美學生，剛剛學成歸國。三人於六月二十九日從太原出發，經陝西進入四川省邊界地區，於七月四日晚在鎮巴鎮 (ZHENBA) 投宿時，遭到警方盤問，隨即，警方以外國人無特別簽證而進

入了未開放地區爲由，將三人全部拘留。扣押兩天後，在一人寫了一份長長的檢討，又沒收了三人的全部膠卷後，警方才將三人釋放，並警告三人不得再繼續旅行。於是三人乘火車、搭飛機回到了北京。三人都以爲此事到此已完結。麥克那尼去了香港，柏恩斯和妻子、孩子著手準備去夏威夷渡假。七月十七日上午柏恩斯和家人在北京機場準備搭機離華時，突然遭中共警方再次扣留。在機場審訊長達十五小時，中方通知柏氏不能離境，並將其帶往北京寶祖 (PAOZHU) 拘留所。隨後警方約十人來到柏氏在北京的公寓進行了徹底搜查，搜去了柏氏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全部筆記及其他物件。拘留第二天，在柏恩斯及有關人員的強烈要求下，北京警方才不得不透過外交部通知美國和英國大使館，兩國大使館官員立即對此事表示出高度關注。同時美國紐約時報總部也極爲



關心柏氏事件，並迅速作出決定派紐約時報執行主編羅松沙 (ROSETHAL) 及外國版主編侯格 (HOGE) 前往中國弄清事實真相。他倆於十九日飛抵北京，七月二十一日柏氏才第一次獲准在拘留所會見英、美使館官員、妻子、小孩及羅松沙、侯格二位。值得注意的是，羅松沙在與中國方面交涉時，公安局一位姓張的負責人告訴他到那時爲止，並沒有證據證明柏氏犯有間諜罪。柏氏在被捕後，要求見律師，被拒絕。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宣佈柏恩斯因從事中方不容許的有關活動，驅逐出境，當天他抵達香港。

中國完全開放了？

據柏恩斯自己聲稱，他此次旅行的目的，是打算沿著當年斯諾 (西行漫記) LA 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去延安的路線，進行旅遊探訪，並將終點定在鄧小平故鄉，以反映歷史和現實，為外國人了解中國近年來的變化提供更多的具體材料。柏恩斯先生雖在中國工作多年，却難以理解中國並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國家。

世界上許多人以為中國徹底開放了。外國人可去自由投資、旅遊，他們的利益能獲得充分的保證，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不要說目前外商到中國投資辦廠、辦企業仍限制重重，就是到大陸去旅遊，也頗不自由。目前中國只對外開放了二百四十四個城市和地區。外國人獲得入境簽證後，到這些開放地區、城市去無需再辦特別簽證，一般不會有麻煩。但如果想要到其他地方，就得先去省、市公安局外事辦申請特別簽證，大部分情況會遭到拒絕。如果沒有這種特別簽證而擅自到處旅遊，則很可能以違法遭控。我想這二百四十四個城市、地區加起來面積不會超過中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吧，人口最多也就是一億左右，所以說中國最多只是個準開放國家。

假如一個外國人想從廣州到北京，他有多少種旅行途徑可供選擇呢？大概只有兩種，一是飛機，二是火車。如果這位鬼佬想坐汽車就難乎其難了。要想騎摩托車、自行車或步行，則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們不得不在途中一些村、鎮投宿用膳，而這些村鎮又不是在開放名單之列，這樣這位遊客就違犯了中國的法律。

如果一個外國人既不願乘火車，又不願搭飛機，那麼在中國旅遊簡直就寸步難行。

五十年前，美國記者斯諾並沒有什麼特別簽證，但幾經周折，最終到達延安，採訪了正在為新中國浴血奮戰的中國共產黨，並受到盛情款待。但想不到中共在奪取政權三十七年

後，一位想沿著斯諾走過的路線進行旅遊和探訪的美國記者却遭到中共逮捕，並被驅逐出境，唯一的理由是沒有特別簽證。斯諾如在九泉下得知，一定會對柏氏說，誰不叫你早生五十年？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大陸目前正在實行「一國兩制」政策。百分之五的區域實行開放政策，百分之九十五的區域實行鎖國政策。

中國開放政策無法律保護

中共聲稱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國策之一，但這如同中國憲法上寫的民主、自由一樣，是得不到法律保證的。

幾年前，一位美國軍事飛行員想要完成一項畢生夙願，即想步行走完長城。第二次世界



遭中國驅除的「紐約時報」記者伯恩斯，在香港接受訪問。

大戰期間，在一次奉命對日轟炸後，這位飛行員冒著生命危險，架機飛臨長城，在山海關上空，第一次遙望長城。七九年後，他認為時機已到，不顧高齡，來到中國。買了套中國服裝，帶上行李乾糧，獨自一人從長城西部盡頭開始步行，走了幾天後，遭到警方拘捕。關了幾天，確認他別無企圖，不但放了他，還讓他繼續旅行，並提出可免費向他提供一輛吉普和一名導遊。他婉言謝絕，繼續步行。在到達終點山海關時，中國有關方面還派人到那裏熱烈歡迎他，並盛讚他熱愛中國文化，還大肆宣傳，相信不少中外人士都聽說過這個故事。

在柏恩斯騎車旅遊中國之前，實際上已有許多外國人嘗試用各種辦法在中國旅遊。中國日報(CHINA DAILY)八五年就報導過一名英國婦女騎自行車周遊中國的情況。文章對這位英國婦女大加讚賞，並引用她的話說，通過此類旅行可加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了解。八四年，一位西歐青年，騎自行車路過湖南省長沙市，當地電視台即對他採訪，成為長沙市一時人人皆知的新聞。筆者八四年春在桂林遇見一騎自行車的瑞典遊客，與之交談半小時，聽他大談沿途見聞。事實上在中國騎車旅遊的，先後總有好幾百人次了，中共對此並不是不知道。

筆者寫出以上兩段，是想指出，外國人私自闖入未開放地區者為數甚多，中共不但未加以制止，反而大肆報導、縱容，給外界以中國是完全自由的印象。柏氏在中國幾乎兩年，當然知道有許多人在華會自由旅行的情況，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什麼只抓柏恩斯一人呢？

按中國法律規定，在抓人後二十四小時內，警方應通知被捕人家屬，但第一次即七月四

日三人在四川鎮巴鎮被抓兩天時，警方就根本沒通知柏恩斯等人的家屬。這種執法犯法的事對中共來說是家常便飯，不值得大驚小怪。柏氏被捕後一直提出，他的一切東西都在中共手中，有罪就請公佈。紐約時報主編羅氏一下飛機就在北京機場對記者說，指控柏氏為間諜就像指控他外祖母為間諜一樣荒唐無稽，柏氏的行為完全是職業性的。在國際階級敵人氣焰如此囂張面前，中共却不能出示任何證據。柏氏又不是外交人員，不享有豁免權，中共完全有理由和他在法庭上見高低。

筆者在大陸時曾在湖北省外事辦工作過一段時間，對外事政策略有了解。八三年起，中國開始對長期居留華的外國人（包括外交官、教師、工程師、記者等等）發行一種證件叫「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留證」，該證為綠色，因此我們內部一般稱之為綠卡，或外國人居留證。有效期一般為一年到兩年，逾期可再申請。所有在華打算居住一年或一年以上者，都得申請此卡，這主要是方便對外國人的管理，（所有的外國專家在中國公安局都有檔案）。同時對外國人來說也有個好處，持證者可去免稅商店購物，還可在友誼商店用人民幣支付。（無證者只能用外匯券交易）。柏氏從八四年十一月起就在華工作，肯定持有此證。也就是說他有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一定期限的居留權，請問山西、四川是否為中國的領土？

中共理虧，欲加其罪，却患無詞，所以不許他見律師，草草驅逐出境了事。

柏氏並不是第一個遭此厄運的外國記者，安東尼奧尼、得·斯培格爾(1)等等都是先例。在中共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說柏氏是無辜的。

張大興的命運

值得人們，特別是我們廣大留學生注意與憂心的是，在柏恩斯事件中，被捲入進去的有一名剛剛學成歸國的留學生。

中共雖然宣佈對外實行開放政策，但開放程度是極有限的。就地區而言，只有二百四十個城市、地區，就人員而言，只有鄧小平、中共特權階層、和小部分中共信得過的人，可對外開放，可與外國人接觸。廣大老百姓莫說與外國人接觸、交談、交朋友，就是穿件有洋文字的背心也被斥責為崇洋媚外。和外國人交談稍長點，便可升級為特嫌，在這種情況下，外國人雖也有蒙冤受屈的，但大不了驅逐出境，真正受苦的還不是中國人？筆者不想提七九年前的冤案，只想略舉鄧青天天下的幾起眾所周知的事情。魏京生在和外國人聊天中提及了幾位中共黨閥的名字，一九七九年十月便以「出賣國家機密」定罪被判十五年刑（請注意，向魏買情報的外國人，中共却是碰也不敢碰）。湖南民運先鋒陶生八〇年十月和幾名香港人略有接觸便被投入獄中三年。李爽、張諄、衣錫工等看了「廬山戀」後，先後陷入國際愛情，被中共抓去關了好幾年。梁恒要不是勇敢地將官司打到鄧小平那裏，肯定也要為了美國姑娘坐幾年牢。

和外國人接觸入獄的人，今天還未全放出來，張大興同學的捲入，就不能不令我們特別焦急與擔心。柏氏已被驅逐出境，但大興的命運如何，這就不能不令我們每個留學生關心。因為中共在處理中外人士相牽連的案子中，還沒有只處理外國人而不處理中國人的先例。

既然中共能判定柏氏在進行間諜活動，那麼張大興同學就一定是脅從了，如果不是同黨

的話。一個中國人居然膽敢帶着外國間諜刺探中共情報，其罪不在魏京生之下，那麼他現在身處何地呢？

據報導，七月四日，三人在鎮巴鎮被中共攔截後，都被迫寫了檢討。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這「檢討」就是材料，存入個人檔案。那麼張大興這一輩子還能否受重用到此便已告分曉。柏氏在北京被再度關押後，張大興也再次被中共警察「請」了去，他的下落人們便全然不知了。

我本人並不認識張大興，但此事涉及到了我個人及全體留學生的利益，因此我要特別提出，以引起大家相當的重視。

(1)安東尼奧尼為義大利記者。
得·斯培格爾(DER SPIEGEL)為西德記者。一九八四年因當眾毀壞毛主席像而遭驅逐出境。

詩的欣賞學

現代詩惹人討厭

朦朧——

像飯館裏的煙草味

污染了人的胃口

還使傷風的頭痛得像感冒

現代詩不能像病人

在遲鈍的眼光下也一針見血

流動的意識裏落進那些詩句

就會一個漩渦又一個漩渦

眩暈得竟伸不直懶腰

打不出哈欠

……噢……哈氣音，先吸後噴

(中國大陸詩人) 嵐之凝

國際性

中國現代文學會議

在西德召開

(西德) 棋語

炎炎夏日的七月，來自世界各地的七十多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千里迢迢地趕到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省的一個被森林層層包圍的古堡中聚首。由東道國魯爾大學的馬漢茂教授 (HELMUT MARTIN) 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劉紹銘教授 (JOSEPH LAU) 共同舉辦的國際會議「現代中國文學的大同世界」(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光從名稱上看，就很具吸引力。從「共同體」聯想到「大同世界」，從「聯邦」飛躍到「理想國」，從「文化認同」想到「一國兩制」。名不正，言不順，是否大會題目有點匪夷所思？其實不然。這個會議的名稱之下包含了較深層次的意義。文學是超越國界的。在中國文學的大名目下

，不論中國、台灣、香港、東南亞等地政、經、社會的結構有多大差異，凡是用中國文字創作出來的文學，雖然其處理的題材和表現形式各有千秋，都應受到文學研究者同樣的關注（這其中也可包括海外作家以中文創作的文學）。正如東西德兩個國家，兩種制度，但德國文學只有一個。不僅如此，它還包含了奧地利、瑞士的德語文學創作。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文學史上還出現過一種「流亡文學」，即被納粹迫害、或不願在極權之下自己創作生命被扼殺的作家們，流散於世界各國，最有名的例子是赫賽 (H. HESSE)、布萊希特 (B. BRECHT) 和湯瑪士曼 (T. MANN) 等人，他們於戰後先後返國，可悲的是國家已二分，使他們面臨了痛苦的抉擇。布氏返東德，

湯瑪士曼返西德，而赫賽則寧可有家不歸，住在國門口外的瑞士，永遠只當個旁觀者，這不可不謂知識份子的悲劇。有此切膚之痛的德國應該更能體會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敏感和痛苦，做為東道國，似乎很合適。

大會的一個特色是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作家、學者皆應邀參加。大陸方面詩人楊煉，作家張辛欣，評論家許覺民、李子雲、李陀和來自台灣的作家李昂，學者林耀福、王德威（可惜應邀的作家黃凡、陳映真以及文化界高信疆因私人原因未能出席）和諧地共同討論，相處一週。從美加方面來參加的學者如夏志清、李歐梵、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杜邁可 (MICHAEL DUKE)、葉維廉、鄭樹森等連同主辦人馬、劉二位皆是在台灣受教育或留學訪問過的，他們跟台灣的淵源很深。

倒是歐洲的一些中、青年漢學家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比較密切，這自然是二十年來國際政治局勢改變後所產生的後果之一。歐洲老一輩的漢學家多半研究古代、近代文、史、哲學，他們跟中國當代社會沒有接觸，對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中、青年學者大多數去中國大陸留學，對中國社會、政治有較深刻的了解，相對來說他們對台灣的認識較為有限，在感情上也沒有什麼介入。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為期一週的討論會是在多瑙河畔一座白色的古堡 REISENSBURG 中舉行的，上、下午都有緊湊的會議日程，但在進餐及咖啡空檔時間中大家都熱烈地交談。從事創作，特別是學術工作時是很寂寞的。這種會議珍貴的一面不僅在於研究心得的互相啟發、交流，也更在於筆耕者之間互吐苦

水，互訴衷腸。晚餐後大家擁到小鎮 GLENZBURG 的各種露天小酒店，一邊喝啤酒一邊繼續進行「大鳴大放」，直鬧到深夜，夜涼如水，暑氣全消之際才飄然返回古堡。

會議的內容十分廣泛，從論中國當代文學的現況，如許覺民談目前文學的「當代意識及尋根意識」；新的追求，如李歐梵論中國作家意欲擺脫既有的寫實手法的局限性，進而嘗試從西方文學中汲取新技巧和格式，鄭樹森更具體論高行健作品所受貝克特及布萊希特的影響。另外李陀提出「意象」的觀念來作為評論的一個模式等等，有不少有深度的報告和意見相左的討論。台灣文學中鄭愁予的詩、黃凡、李昂的小說，旅瑞士作家趙淑俠的作品都有專題討論。大陸及台灣文學中的一個共同處——優秀女作家的大量湧現也是個有份量的議題。被視為中國文學支流的港澳文學、東南亞馬華文學、印尼的華文文學的歷史演變和發展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及形成的局限性，也引起了辯論。日本學者相浦泉就台灣海峽兩岸中國文學在日本的研究近況作了很有價值的資料性報告。歐美學者 BILL JENNER、MICHAEL DUKE 提出來中國文學的翻譯和出版問題立刻引起了熱烈的反應。顯然歐美國文化背景不同，讀者閱讀習慣大有差距，在美國英譯中國文學多半還限於在大學出版社發行，只在學術界流傳，還沒有打入商業性的出版社。歐洲方面情況略佳，中國文學的翻譯多半由一般中、小型出版社出版，間或也有在最大出版社發行的情況，然而銷路一般只是差強人意。翻譯工作不是學術研究，這是許多優秀漢語翻譯家寧可埋首於寫作嚴謹學術論文給幾個專家看，也不願去從事那種「既賠夫人又折兵」不被承認、又不賺錢的翻譯工作的原因。另外很多人認為中國

現代、當代文學中有世界文學水準的作品幾乎還沒有問世，因此在出版界鮮能有所突破。中國文學的德譯在歐洲算是走在前端的。RUTH KEEN 論文中舉出了近幾年來的德譯中國文學，洋洋大觀，令人驚嘆。馬漢茂教授近幾年來跟出版社合作推出叢書系列如「台灣短篇小說選」、「馮驥才的「啊」、巴金的「隨想錄」、白先勇的「台北人」、錢鍾書的「人、獸、鬼」、最近剛出來的張辛欣的「北京人」比中文單行本還快，這類記實文學很有可能受到德語讀者的歡迎。

會議中很生動出色的一部分是詩人、作家們現身說法，李昂、張辛欣兩位年輕女作家是性格突出，口才絕佳的人物，自然給大會生色不少。但這次大會跳出一匹黑馬可說非楊煉莫屬。這位才三十歲出頭才華畢露的詩人名氣在國內外都不響亮，他之被「發掘」，可以歸功 JOHN MINFORD 及 SEAN GOLDEN 兩位「伯乐」，他們在北京偶然結識了楊煉及他的詩，賞識之餘就開始翻譯。楊煉雖也算所謂「朦朧詩派」，但其詩雄偉而氣勢不凡，他的一系列組詩都是受到出土文物的啟發而作，他嘗試飛越時空，追根尋源，以探索人類和宇宙自然間的息息相關，把個人跟太極對立，互相觀察、摸索。他的思想以及詩的形式似乎離成熟還有一段距離，但從他言談間流露出來那種理所當然的一種天真、固執地追尋生命更深層意義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是中國詩壇上未來的一顆明星。

夏志清先生在總結大會時的發言妙語連珠，令人噴飯。他以長者的態度提醒楊煉，創作道路是漫長的，處理巨大的題材固然無可厚非，但生活中許多微末細節中也自含哲理玄機，白璧也得經過雕磨才能成材。他的一席話聽得

有些人如癡如醉，有些人目瞪口呆，還有些人義憤填膺。毛病出在中國人沒有「共同語言」這點上，夏先生一席話並非只在於內容精彩，他整個人混身是戲，帶江浙口音如連珠炮的英語令人叫絕，只苦了不通外語的大陸同胞，明聽見夏先生對自己「點名」進行批判，却一頭霧水，即使有幾位好心學者在旁個別翻譯，自然也不能得其真髓。

從這次會議可以看出一向有嚴謹傳統的歐美學術會議，這幾年有了方向性的改變，即研究者與創作者間的隔閡打破了，作家應邀參加會議，傾聽學者如何闡發自己作品的內涵，他可以現身說法，加以反駁或補充，這種情況有時也不無反效果。評論家和學者往往把一部作品分析解體，仔細推敲。沒有深度的作家常常通過評論家的啟示，才發覺自己作品中竟包涵了如此多的層次和意義，以後創作時雖然不敢掉以輕心，甚至於為了投評論者所好而寫作，但把真正的讀者和創作原意置諸腦後了，這當然犯了寫作的大忌。

中國文化當局近年來也逐漸能接受作家們被點名邀請的事實，而不堅持自己選派「代表團」以「出國訪問」的姿態赴會，這未嘗不是一個認識上的進步。應邀者到了外國也可以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了解到一個人只需對自己負責，並不需擔著國家民族的大包袱，因為誰都知道歷來這種包袱都是統治者用來剝奪個人獨立、自由意志的最佳口實。

台灣作家正式受邀到歐洲參加國際性文學討論會，為台灣文學爭取到它應有的關注和承認，力排歐洲中國學者注意焦點只放在中國大陸的風氣，從這點來看，這次「中國文學的大同世界」會議是具有突破性的意義的。

七月廿五、廿六、廿七三天第九屆「台灣同鄉聯誼會」年會在華府召開。筆者因感覺會場的台灣鄉土氣氛不夠濃厚，因此在「鄉情座談會」中建議多使用台語（閩南話、客家話）。因會場規定每人發言限兩分鐘，筆者乃以最快速度提出此建議，沒能詳加解釋，結果引起一些誤會。接下去討論問題，許多人就使用閩南話發言，少部分會員聽不懂閩南話提出抗議，造成了一點風波。

在美台灣人的同鄉組織只有兩大支系，一是「台灣同鄉會」，另一是「台灣同鄉聯誼會」，前者絕對強調台灣鄉土性，甚至創造出獨特的「台灣文化」、「台灣意識」和「台灣民族」等，並且完全使用閩南話，與台灣意識混淆不清，使得只會講國語、客語和高山語的同鄉在其會中感到相當的受排斥，因此前者實應叫做「台灣福佬同鄉會」。

許多台灣同鄉基於對台灣故鄉之和諧、團結、安定、繁榮的關懷，乃於九年前倡組「台灣同鄉聯誼會」。該會與「台灣同鄉會」最大的不同就是包容所有與台灣有淵源的同胞，以彌補「台灣同鄉會」分化、排斥、歧視的缺陷，開會時使用人人能懂的國語，用意十分良好，作風十分開明，因此至今發展十分旺盛。

筆者一向希望台灣人不必彼此大團結，相親相愛、關心故鄉及爭取在居留地的權益，因此很熱衷於「兩會」的溝通協調，盼望雙方各做適當的修正，共同走向一條愛鄉利鄉保鄉救鄉的道路。首先，「台鄉會」不應太強調大福佬（閩南）正統主義，唯我獨尊，唯我獨台，處處以己為「正港」，蔑視其他台灣人皆為「冒牌」。要給予客家人、外省人、高山人以應有的尊重，這樣才能免於分化、仇恨、對立。反之，「台誼會」却是不夠重視佔台灣人口

● 台灣專欄 ●

矯正 不要過正

（台灣作家·美國）
劉添財



多數的福佬鄉土風味，全部使用國語，未免矯枉過正。起碼在交誼餘興及開場白、打招呼寒暄等場合要多多使用福佬話、客家話等，使人

有鄉土親切感，如此才能吸引更多台灣鄉親的向心。但在正式討論問題的場合，筆者還是主張使用人人能懂的國語。不過，我仍然希望年紀不太大的外省朋友們要學學台語，這對於同胞間的團結關係重大。居住台灣二、三十年居然不會講台灣話，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這次寶島之夜晚會節目相當精彩，唯一遺憾的是台灣鄉土風味不夠濃厚，而且竟然沒有一支客家山歌，沒有一個山地歌舞。「台鄉會」幾乎每會必唱的「咱台灣」、「黃昏的故鄉」、「望你早歸」等歌，「台誼會」也可以唱。在整個年會過程中，晚會的參加人數最多，約有二千人，其影響力也最大，因此節目之安排不可掉以輕心也。

今後「台鄉」、「台誼」仍會保持「一鄉兩會」的局面，但兩會都應力求服務同鄉，和平競賽，要互相協調，千萬不要互相敵對。雙方有活動時應主動邀請對方人員參加，互相交流、溝通、切磋、改進。本著「愛鄉」的最大「共識」，終有一天會成爲「一鄉一會」的。去年在芝加哥召開的「台誼會」竟然被「台鄉會」指罵爲「冒牌」。今年華府的「台鄉會」並沒有類似的敵對表現，而且至今爲止，還未見「台灣人的報紙」對「台誼會」有所攻擊。「大家平平台灣人」，是同胞是朋友不是敵人，應以親善、容忍、友誼、關懷爲重才對。

台灣人應同時參加兩會，像筆者一樣做個「跨會份子」，親自看看它們是在「變什麼蚊」（台語，意爲搞什麼花樣）。這樣就能促進兩會的相互了解，進而團結合作完成「統一大陸」。

大家一心連心，手牽手，爲台灣故鄉的前途來「打拚」吧！

談國民黨海外遴選立監委

(美國)李目

今年年底，台灣又將進行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增額選舉。此項選舉是權宜之計，因為國民黨無法進行自一九四八年行憲以後的第二次全國性普選，而又要維持中華民國法統所採取的應變措施。

「增額選舉」辦法自一九七二年起實行。海外選選的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六年為一任。在以往十四年中，一度因中共和美國建交的震撼，推遲過兩年。

台灣方面有說不出且擺脫不了的苦衷：

一、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五權憲法為革命目標的中國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結束了訓政。一九四七年實行了全國選舉，並於選舉後在一九四八年經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實行憲政。由於剿共軍事失利，國民黨於一九四九年搬遷台灣直至今日。為維持中華民國法統，台灣局面雖小，仍需左右支撐着「中央」大架構。

二、一九七二年，亦即距離現任中央民意代表選出期的一九四七年二十五年之後，眼見歲月蹉跎，中央民意機構代表和委員們日漸凋零，開起會來，愈來愈覺淒清的現實下，台灣當局只好決定實行「增額選舉」。

「增額選舉」在台灣是以縣為單位選出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在海外則是遴選立法委員

和監察委員。這一政策的目的是：擴大民主憲政基礎，厚植海外支援和參與力量，進而凝成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向心力。

據一份台灣背景的雜誌報導：美國地區僑選立、監委的遴選工作已進入密鑼緊鼓階段。舊金山、紐約、洛杉磯三大僑社的角逐情況最受矚目。而九月十五日之前，所有申請參選的資料表格，皆應送至國府駐各個地區的協調處收轉。有了九月十五日這一個限期，按時間上算，「密鑼緊鼓」尚可說得通，但「矚目」、「角逐」就有些牽強了！

拿紐約來說，沒有幾個僑胞知道何等資格、何等標準的人士可以參與遴選「立委」和「監委」。換言之，紐約地區的立委和監委從來就沒有受到僑胞們的關注，因而也就沒有過群眾基礎。

據說，這些熱衷於戴烏沙帽的代表，根本無需動腦筋搞美國式的公開競選或者發表政見，只要他們有功可恃，只要進行幕後交易，靜待紐約協調處協調即可當選。

從中可見，由這種「程序」所遴選的海外立委、監委說得再好聽也不過是國民黨當局假國家名器對個人人士的酬庸，即所謂凝聚該人士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向心力。台灣當局期望他們來擴大民主憲政基礎，厚植支援和參與力量

的願望難道就這樣實現了？

事實上，海外遴選人士素質再高也不能在國民黨現有的國大代表中具有影響。國民黨現有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中，不少人還是一九四七年選出的第一屆代表。這批老先生、老太太們，如今的本分應該是含貽弄孫，而不是由輪椅推着，擔架抬着去投那「神聖的一票」。由於時光的推移，故鄉的捨棄，他們實際上早已是空無依傍，脫離了根源之地的「古董」。如何讓民衆去理解他們稱之為具有代表性的「代表」呢？國民黨對這些「萬年代」、「終身委」也夠傷腦筋的！由於拿不出更張之法，又要維持法統，那就只有以「增選」和「遴選」來修補了！

誠然，國民黨有較中共開明之處，在國民黨庇蔭下的台灣省，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是按期更新的。台灣省內的選情也就十分熱烈。

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充滿活力，想想中國的民意機構是由四十年前選出的老而戀棧，或者是國家藉對海外人士的酬庸而選定的人物，心裏真不是滋味。

表面上國民黨力求維持法統，在遵守法制上比中共高明些，而事實上，從國民黨現有的體制和國民黨在海外遴選立監委的過程來看，國民黨的高明也無非是一百步和中共的五十步之差而已。

曙光漸露，解「嚴」在望

談台灣取消戒嚴及制定國家安全法

(台灣旅美研究生·美國)

凌天鳳

早在本年三月底國民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曾強調：三中全會不能只顧及政治號召而無具體行動，因此對台灣社會各界關切的組黨、戒嚴、全面改造中央民意代表、地方自治化等重大政治問題，不宜在三中全會正面擴大討論，應先交由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或主管單位籌議規劃。因此，在三中全會閉幕後，國民黨中常會有一個十二人編組的小組，專司研究台灣當前最重大、也最敏感的問題。其中包括：①地方自治法制化②國家安全法令③充實中央民意機構④民間社團組織制度⑤社會治安⑥黨的中心任務等六項。解除台灣地區實施戒嚴為最優先提出研究的問題。現在，討論終於有了初步結論：即「取消戒嚴，制定國家安全法」。雖然此事距離定案尚有時日，但國民黨這種能審視潮流，廣納民意的做法，值得讚揚。對民主政治而言，無疑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開始實施戒嚴。雖然號稱僅實施了「百分之三的戒嚴」，但三十多年來，似已被誤認是一種憲政的常規，法治的常態，豈不知已扭曲了憲法的意義。而與推行民主政治，基本上相互抵觸，殆無疑義。其所實施的戒嚴與人身較有關連的大致包括如下數項：

一、排除平民不受軍事審判之規定：對凡觸犯內亂罪、外患罪……不分軍人或平民，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

二、觸犯妨害軍機治罪條例、觸犯懲治叛亂條例

等，平民於戒嚴時期亦得交軍事審判。

三、對人民自由權利的限制：國民黨憲法中保障人民有居住、遷徙、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秘密通訊、信仰宗教、集會、結社、財產等自由權。在台灣實施戒嚴時期，戒嚴地區最高司令官對以上諸權有廣泛的限制權。

台灣目前對人民自由權利的限制，也是自實施戒嚴以來執行最嚴密的一部份。相關者計有出版物管制、無線電台管制、郵電檢查、戶口臨時檢查、入出境管理、入出境查驗、取締違禁書報雜誌影劇歌曲等計有十八項之多。其中出版物管制，入出境管理、取締違禁書報，最為人詬病。究其原因，乃當今台灣黨外人士對政治訴求的管道，除少數黨外公職人員得以在台灣省、市議會或國民黨的立法院及監察院表達意見外，其他人士唯一途徑即藉由雜誌來傳達他們的心聲，也因此，國民黨對出版物之管理相對的分外嚴格。

社會乃是人類組成的一個有機體。因此，異見與衝突在所難免。如果不能正視及接受異見與衝突，將很容易走上壓抑的一途。當然，無可否認，任何一個社會體系的形成、維持及運作，都不能不遵循一定的行為規範，否則，體系功能勢將無從發揮，體系目的也不能完成。這個行為規範也就是所謂的法律。這個法律的制定及執行，必須有他的權威性及為社會大眾普遍所接受。否則必會遭遇阻礙難行之處。國民黨有一部憲法，其內涵無論在人權的保障

以及政府的組織上，大體上都能符合現代社會以及政治的標準。但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到台灣，以「國家面臨非常時期」，違背、並凍結了憲法中部份原有條款。憲法中若干基本規範不能付諸實施，如言論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即是。因此，國民黨的民主憲政原則與規範，臨時條款與戒嚴法的實施，司法獨立的維護，黨禁報禁，早為民間非議。這種在朝在野立場迥異的結果，導致民主停滯，自由不足。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人權觀念本來就淡薄與模糊。衍伸至今，愈是有關人身自由的基本法律觀念，愈難普及，相對的反易受到破壞與曲解。我們可以看到世界民主憲政成績斐然的國家，大多數都在認真尋求「保障基本自由人權」、「司法獨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充分自由與制度的確立。反觀中國大陸及台灣，在在以各種理由限制民主的成長，減低自由的保障。大陸的魏京生、徐文立、劉青，以及台灣若干黨外人士為爭民主、爭自由，如今身陷囹圄，暫時失去自由。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當年韓國朴正熙命終青瓦台，如今菲律賓的馬可仕出亡美國的悲劇，這是一面歷史的鏡子，這也都是反對民主、反對自由所帶來的後果。民主與自由是不容反對的。如果反對，那就是自絕於民主陣容；如果反對，那就是斷送中國大陸十億同胞及台灣一千九百萬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希望。

我們如仍堅持民主理想政治，就應先從人

身自由作起。「戒嚴」阻得了社會進步與民主法治工作的推展，影響了法律秩序與社會的安定。因此，國民黨應突破政治禁忌與政治教條，及早通盤檢討與憲法抵觸及不合時宜的法令。首應迅速解除「戒嚴」，回歸憲政，使民主政治能真正生根滋長。

任何法制，必須符合憲法的實質內涵。它

突然從另一個天地裡飛來的高爾夫先生降臨在中國北京市郊十三陵——十三位中國明代帝王安息之地。「叩見皇帝老爺，高爾夫向您老請安」。却無回答，只怨高爾夫到來時，這裡已不說明代的話了。既來之，則安之。跟隨高爾夫到來的是當今在中國居高臨下的東洋人。中國帝王老爺，高爾夫球，這洋玩藝術在您頭上盤旋，您都不理會，就只好由我們大日本帝國獨家享用了。

十三陵高爾夫球場，于八六年七月廿七日

●時事評論●

是高爾夫球場， 還是新租界？

(國內)
林小玲

開幕了，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酷嗜高爾夫的日本商人。

球場俱樂部的個人會費是一萬兩千英鎊一年，相當於一個中國農民一百七十七年的收入（去年中國農民的平均收入是七十一英鎊）。還有由公司肯付雙倍會費的日本潤佬。能付得起會費的人，有勇氣敢於在這全國文物保護重點，豪爽地投下一萬二千英鎊的，只有六家日本公司。

的制定應顧及憲法的權威性，及法律的從屬性。是故，我們殷切地盼望，代之而起的「國家安全法」是一個能令人耳目一新的法律。新的「國家安全法」，不能再具有憲法同等效力，或為憲法的特別法或高於憲法效力，破壞了法治觀念。它的制定，必須符合憲法精神，使自由人權受到更多保障。而不能因「戒嚴體制」

然而他們却在太歲爺頭上建起了豪華的旅店和俱樂部大樓。他們的潤氣與胆量使貧窮落後的中國人目瞪口呆。在金錢的誘惑下，中國當局又把明陵附近的農民住房全部拆除奉獻給日本商人。你們出得起錢，我們就出得起大片的土地。于是日本商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在中國北部建起了第一個具有十八個球區的高爾夫球場。

日本人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聰明？四十年前，爲了啃掉中國這塊肥肉，同中國人血戰八

年，在中國賠了大和魂，那時的日本人是生不逢時，還是智力不發達？既捨了命，又耻于人類。能在中國成功地開辟新殖民地，才是真正的日本的英雄。今天他們既不捨命，又能在中國人的注目禮下，趾高氣揚，出盡風頭。既爲自己爭得榮譽，又爲大和立下了汗馬之功。

再看看那些世世代代靠農田活命的中國農民吧，如今，他們也改朝換代了，他們世代相傳的土地，今天被東洋人花錢買下了成了高爾夫

受到台灣及海外的抨擊，才改以「國家安全法」代之。新「國家安全法」必須配合社會實際的需要與未來的發展，才能發揮預期的規範功能，建立法律的威信與秩序，而成爲每個人都樂意遵守的社會規範。否則，「國家安全法」不僅成了換湯不換藥的法律，更十足成了「民主憲政」的專制了。

球場，而他們又是奉誰之命，成了球場上專爲東洋人搗球袋，撿球的人，難道他們也隨着他們的土地一起被大日本買去了嗎？農民們！你們可不知道你們值多少錢？一個日本人打球就有兩個中國人在左右侍奉，你們這些新中國的主人，今天地位比四十年前舊中國的支那病夫又高多少？球場上，唯一能見到的中國人，就是在場內穿梭，小心地侍候着顧主的你們，也許這是你們的榮耀吧！

球場的中國經理宋先生更爲中國農民報導喜訊：「球場要買回打出場界的高爾夫球。因此，這對能拾到這些球的農民是一項意外的收益。」到場外去尋寶吧，可記得，在中國土地上唯一獲得意外之財的長陵鑽石發現者，是某地一農民，如今能降福于你們的是近在眼前的堂堂大日本人。

宋先生還指出：「對一般中國人而言，他們付不起這裡的費用」，這道出了一句真話，球場裡除了打球的人以及他們的客人以外，禁止他人入內。這個球場僅供居住北京市的極少數外國人享用。曾記否，數十年前的中國被各國列強佔爲已有的租界，洋人甚至掛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字樣。而今天，在日本人重新開辟的租界上，仍有官僚老爺們爲洋人管着門，時代雖然變了，但今天與昨天歷史還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小說「浪淘沙」 及其作者江文

(美國)卓璞



「浪淘沙」作者(上)及其著作(下)

二十二年(一九六四年)，香港金甌出版社出版了江文的小說《浪淘沙》。這是一部以中共的「反右」風浪為中心，前涉「肅反」，後及「大躍進」和大飢餓的史詩性的小說，它再現了整個五十年代災難深重的中國歷史，描寫了中共如何在中國知識份子及全國人民的血淚中強化了集權統治。書中主人公于健是四〇年代投奔延安的一個青年知識份子，僅僅由於他懺悔和反省了中共在「肅反」中的錯誤，就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份子，發配至東北的北大荒，最後死於該地。作者不僅寫了于健故事的悲慘的一面，他的無辜，他的冤屈，而且寫了于健深思、探討和覺醒的一面。因此

，兩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有幸讀到這個絕版書的複印本時，激動之餘，不禁大為驚嘆：《浪淘沙》竟然比七十年代末興起的傷痕文學早二十年問世。

最近，聽說作者為了贊助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成立，終於讓這部小說再版問世。喜獲樣本，愛不釋手；再讀之後，心情更加不能平靜，於是寫了一篇讀後感，即《中國知識份子的正氣歌》一文。然而，意猶未盡，遂起專訪江文先生之意。

訪問時間：一九八六年七月六日
訪問地點：美國首都華盛頓

被訪問者簡介：江文先生，美國華僑、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浪淘沙》、中篇小說《唐老頭》及一些劇本。四十年代末期留學美國，主修社會科學。五十年代中回國大陸，六十年代離開，現定居美國。曾任教於美國賓州州立學院，主講「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在文藝創作之外，常以秦修明為筆名發表一些時論，翻譯一些政治學及文學著作，其中包括法國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

問：讀了《浪淘沙》，特別是看到再版本扉頁上的作者簡介，感到您的經歷很不平凡，其中有一點十分吸引人，即：為什麼您在五十年代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而在六十年代又離開了大陸？

答：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中國海內外的知識份子都嚮往一個新中國，我也不例外。那時我在美國唸書，即將拿到學位，可是愛國熱情却使我放棄了所有在美國深造和就業的機會。像許許多多的同學一樣，我脫下西裝，送掉領帶和皮鞋，回去建設新中國。一晃就是十年。這十年中所經歷的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使我對中共的專制集權的本質有了切身的體驗，從而使我丟掉了所有的幻想，而決心離開這個專制王國。我是學社會科學的，我不願意讓我對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觀察停留在表面現象上，當時我就感到，中共的集權制度是「橫堅」空前絕後的。橫看世界範圍，它超過了希特勒、斯大林的專制集權統治；縱看中國歷史，秦始皇、漢武帝全比不上毛澤東的專斷和殘暴。套用他自己的詩詞，可以說「數」專制集權，「還看」毛「朝」！我熱愛中國，我熱愛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所以我無法忍受中共的殘暴統治而堅決離開了大陸。

問：您是否一離開大陸就開始寫《浪淘沙》

《的？能否請您談談寫《浪淘沙》的經過？

答：離開大陸，到了香港，像成千上萬脫離中共集權統治的人們一樣，我開始了難民生活。當時我覺得，不管我的前途如何艱險，我在大陸十年的經歷一定要寫下來，這才對得起我們的時代，這才對得起仍在集權統治下的中國老百姓。最初的計劃是寫一個年輕人、一個老頭和一個小孩。年輕人寫出來了，就是《浪淘沙》。老頭也寫出來了，是《唐老頭》，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下層社會的人物，但他的愛國心很典型。小孩呢，動了筆，可是沒寫完。我是在床板上動筆寫《浪淘沙》的。不寫不行嘛！那十年的一切，積壓在心頭，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場景，都推動着我寫。我一面為生存奮鬥，一面堅持寫《浪淘沙》。寫完我生了一場大病，但我覺得，我盡了我的義務。

問：我一直十分讚嘆《浪淘沙》的廣度和深度，我驚訝該書當年的「沉寂」。似乎「一沉」，二十幾年就過去了。為什麼當年那樣「寂寞」呢？為什麼現在要重版呢？

答：《浪淘沙》一出版，有的朋友一面高興地讀它，一面意味深長地對我說，《浪淘沙》也許出世太早了。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六十年代的特點，在文革發生之前以及文革發生之初，海內外對中共的認識都還不太清楚，中國老百姓也對中共的本質缺乏深刻的理解。一九六五年年底我來到美國。當時美國正經歷着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等等運動，美國的激進派，包括某些到美國留學的台灣愛國同學都在重新評估現代時代的文化、社會和各種制度，都在批判西方社會中的不合理的地方，其中很多人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地來認識中共的專制集權的真相。因此，當時《浪淘沙》沒有引起人們及時

的和足夠的注意是很自然的。直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的暴亂結束，傷痕文學出現並開始傳到國外，這時，很多朋友又向我提起這本書。他們對這本書的愛，甚至超過我，有的還到過書中描寫的地方，如北大荒。這樣，我才把書校閱一遍，連同部份稿費，作為捐獻，交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重版。

問：您認為您寫的《浪淘沙》和「傷痕文學」中的那些作品有哪些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

答：先要聲明，近年來國內出版的文藝作品我看的有限。像大家所稱頌的《巴山夜雨》、《苦戀》、《天雲山傳奇》、《人啊，人》、《靈與肉》、《如意》等，以及劉賓雁一系列的報告文學，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是寫得很好、感人至深的。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墓》，以及流亡海外的冬冬的《反修樓》、海楓的《重陽》，都是描寫在中共的專制集權下，人怎樣沒有被當成人，也沒有把別人當成人，互相鬭爭、殘害。《浪淘沙》和這些作品一樣，都觸及了人性在中共統治下被扭曲、抹殺及復甦這個主題。所不同的只是出版較早，而且出版在海外，至今尚未能跟大陸的讀者見面而已。

問：這次重版，您把「尾聲」一章改成了「第二十章」，這是否表明您有意要繼續寫下去？

答：是的。前邊我談到我有義務寫。如果說，把我所看到的、想到的，藝術地再現出來，我已經寫了《浪淘沙》的話，那麼現在我發現，我的天幕更大了。在我心潮中翻騰的人物，不但正在力圖打破集權專制，爭取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而且正在步入廣闊的全世界。（此文經江文先生親自過目）

● 文藝園地 ●

小路

（國內）林島

哦，那綠蔭的小路
可是我打開的詩頁
讀著：淚的濕漬，腳印的吻
我，宛如秋風搖落的梧桐子
撒嬌地偎著你，追尋
夕陽的夢，枯葉的摩語。
也許，在那遲來的暖季，還會憶起
稚拙的歌，童心的頑皮

思索

那是宇宙，迷茫的天體
畢加索的思維，色彩的領域
我尋覓，讓我執拗的靈魂
沿著一條朦朧的曲線游弋
山巒、太陽、母親鼓眼的乳房，
柔雲和淚漬溶在一起，
黃沙和綠葉疊影
冰凌與熔岩相互撞擊
鮮血、葡萄、蜜蜂的翅膀
……
驟然！止息了，一切都是混沌，
凝固飽和的融體。
緩緩地，冥冥中一絲星光游近
劃過我的睫毛匆匆離去
於是，我猛撲，用強力
繃緊我伸出的雙臂。

「不再偉大的會見」

獨幕狂想劇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江文

八十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十一月中旬某一天的午夜。列寧山的地下鐵道站。

車站位於莫斯科河雙層大橋的底層，四面全是玻璃。舞台從左到右，放著兩排有靠背的長條候車椅。台頂吊著若干華麗的水晶燈。四周豎立著一些大理石雕像。這是候車室。左右兩面，是車站的出入口。

天寒地凍。天幕前的一面大玻璃牆上，蒙著水氣。台內燈光透過玻璃牆，在天幕上若虛若幻地映照著河上的寒霧，投射出一段結了冰的河面。

幕啓時，由近而遠，有地鐵車輛離站的聲音。幾個裹著冬裝的乘客，提包攜袋，從左而右穿過候車室，零落地走出車站。

停頓片刻。懸掛著的大鐘，猛敲十二響。台上燈光逐漸趨暗，顯出一片撲朔迷離的景象。

過了半晌，兩個莫斯科大學研究生，推推搡搡，嘻嘻哈哈，抱著書從右跑進候車室。

男學生：(一隻手放在嘴上哈氣) 啾啾，今晚外頭好冷。(從皮帽邊拉下護耳，使勁捏緊皮衣領口)

女學生：(同樣抓緊衣領，踩著長統靴取

暖) 這站裏也不暖和——準是過了半夜，減少輸送暖氣。(先是怕冷，繼而發覺候車室裏空無人跡) 哦，這兒怎麼這樣安靜，簡直靜得出奇！我們別錯過了凌晨的班車才好。

男學生：別怕。(踮起腳尖，朝左遠望) 瞧，那邊彷彿有一列車開來了。(低頭吻女生老遠的，可車頭燈開得很亮。……)

女學生：(在抱吻下順勢坐到一張長椅上，過一陣才警覺地抬頭) 哎呀，你不是說，車快進站了嗎？

男學生：(急抬頭) 可不是，該上車啦。

(張望良久) 真是活見鬼！剛才明明來了一輛地車嘛。怎麼一下子就不見啦？(越來越詫異) 不但沒燈，連點聲音都沒有。

女學生：(開始著急) 莫非我們剛才只顧擁抱取暖，把車錯過啦？台左隱隱傳來一些聲響。先是像地鐵車輛在停穩前煞車。接著，又有車門噹噹地自動開關的聲音。兩個研究生驚得目瞪口呆，四目相視。

左移時，有人在說中國話，聲音越來越大。台左升起一團迷霧。隱隱綽綽，走出五個人來。

女學生嚇得撲在男學生懷裏，手上的書，

一齊跌落在地。

男學生：(搜索式地盤問) 喂，你們這群東方人，「你」呀「我」的全講中國話。(漸漸壯起膽，提高嗓門) 半夜三更，跑到這兒來幹嘛？

迷霧慢慢消散。五個隱身人漸漸露出全貌。最矮的一個，三腳兩步，跑到男學生面前。

翻譯員：(照例打前鋒) 哈，達瓦里席，同志，你懂中國話呀？這太好了。我們正要找人幫忙。

男學生：(猛吃一驚，竭力定神) 什麼達瓦里席？我在莫斯科大學專修中國語言，都快唸完博士學位了，怎麼不懂中文？(開始打量五個中國人) 你們是中國外交人員？你們可知道，從六〇年代起，中國外交人員不許亂跑。翻譯員：(笑著解釋) 我們不是來辦外交——我們是跟隨毛主席，路過莫斯科，來拜望斯大林同志的。

女學生：(定神後拾起書本，移到男學生身邊，聽完再度吃驚) 你說什麼毛主席？毛澤東不早死了嗎？(屈指計算) 都快十年了吧？翻譯員：(有如他鄉遇故知) 哈，這位女

達瓦里席，這位女、女同志，你也懂中文，而且說得這樣流利呀！

女學生：(覺得問得多餘) 我爸爸媽媽都是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我還生在北京的蘇聯賓館裏呢。(抱怨地) 哪知道，我剛剛幾歲，我們一家就被毛澤東趕回來了。(有些悵悵) 到現在，我爸爸媽媽還常懷念在北京的舒服日子呢。

翻譯員背後的四個人，移近舞台中央。身材最高的毛澤東站在最後，臉上經過防腐化妝，衣著與天安門紀念堂水晶棺中相仿。左手由女護士攙扶，右邊站著警衛員。女護士手提醫

療袋。政治秘書、警衛員和翻譯員，手裏都拎著大包小袋。

政治秘書：（笑容滿面地最先走上前）這位女同志，話不是這麼說。你不知道，當年是赫魯曉夫大搞修正主義，批判斯大林，破壞中蘇友誼。你爸爸媽媽和所有的蘇聯專家，都是赫魯曉夫撤走的。

女學生：（不相信）你說撤走？大家都說是逼走的！

政治秘書：（依然滿臉帶笑）我們怎麼會逼走或趕走蘇聯專家？中蘇之間的偉大的、永恒的、像磐石一般鞏固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怎能容修正主義破壞？（唸得吃力，嚥了幾口唾沫）我們要像保護眼珠一樣保護中蘇的團結。

男學生：（插嘴制止）不許亂喊口號！我們這裏現在不興這一套了。（用手攬住女學生）毛澤東當年反蘇是事實。

警衛員：（聽見有人罵毛，孔武有力地舉起一隻胳膊）誰敢污蔑我們偉大的舵手、領袖、統帥、導師？！：我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兩個蘇聯研究生，沒有料到這一著，不由得一愣。毛澤東由女護士攙扶，上前拍拍警衛員，然後在一張長凳上坐下。

毛澤東：陳永忠，早就教導你，別再提什麼「保衛」、「保衛」——「保衛」得我心煩！文化大革命中，哪一派不叫喊「誓死保衛毛主席」，結果文攻武衛，鬧翻了天，打得稀巴爛。那些人高呼「誓死保衛毛主席」，不過是怕死，想保衛他們自己而已。汪東興不比誰都要「誓死保衛毛主席」？到頭來，爲了保衛他自己，還不是抓了江青、王洪文，許許多多口口聲聲要保衛我的人……

政治秘書：（過來幫腔，教訓警衛員）你剛才高呼「偉大的舵手、領袖、導師」

，這幾個偉大稱號，「導師」應當放在最前，偉大稱號，有一個排列次序問題，不能夠亂喊。

警衛員：（接受毛的訓誡，不服政治秘書）算了，你跟我談什麼排列次序？林彪過去就把「偉大導師」，放在主席稱號的首位。難道你要我跟著林彪去反對黨，反對主席？

男、女學生：（同時不解地問翻譯員）他們在吵什麼？他們叫喊的不是同樣的幾個中國口號嗎？爲什麼要對罵？

翻譯員：（表示此中有奧妙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政治口號代表階級立場、觀點、路線，必須一分爲二——

吵嚷聲驚動整個車站。遠遠地，從左面走來地鐵車站的老值班員。

毛澤東坐得不耐煩，站起來走動。女護士替他整衣，同時哄勸安慰。

老值班員：（睡眼惺忪，哈欠連天）你們這班醉鬼，又在酗酒吵鬧啦。難道不看禁令：半夜以後，誰都不許帶伏特加進站。

男學生：這是群古怪的中國佬，不是醉鬼。有一個自稱毛澤東，聽說要找斯大林。

老值班員：（又一大哈欠，噴出滿口酒味）找誰？要找斯大林？（不感興趣）死了都三十多年了，還找他幹嘛？

翻譯員：（振振有辭地解釋）我們毛主席，已經在紅場周圍，找了好幾天。聽說斯大林不留在列寧墓裏。有人告訴我們，斯大林夜間常來列寧山這一帶遊逛——也不知他是不是來找列寧？

老值班員：（呃的一聲，打了一個酒嗝）列寧肯見斯大林？——真是人間說鬼話。你們這些人根本不懂什麼叫做布爾什維克！（用手捋鬚，舌舔著唇，口渴似地叭嗒叭嗒地啣嘴）

政治秘書：（靈機一動，拎著一個大提包，竄上前來）你好，站長同志。我們湊巧帶了一些名酒。（開包介紹存貨）瞧，這是貴州的茅台、四川的大麴，還有紹興的花雕、山西的汾酒——都是內部供應、外邊買不到的精品。（別有深意地瞅瞅老值班員）聽說斯大林同志夜裏常來你們這個地下鐵道站。大家回來乾幾杯，那才好呢。

老值班員：（兩眼望著酒，滴溜溜地轉）這些玩意，喝起來多半像汽水。要有伏特加，還差不離。

政治秘書：（正中下懷）哈，你說伏特加？我們也特地備了一些。（從包底翻出兩瓶）喏，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低聲向毛）早就知有用，入境就買來攔著。

老值班員：（接過伏特加，審視一番，慢慢笑開了嘴）喂，中國佬，剛才你說什麼來著？（漫不經心的口氣，但又不等對方回答）你們要找斯大林？

政治秘書：我們毛主席一九四九年第一次來莫斯科，那時斯大林很高傲，等了十幾天才給見面。一九五七年再來莫斯科開會，斯大林已去世，而且在蘇聯挨批判。我們毛主席主動搞反修，竭力維護他。這次是去見馬克思，順道來看斯大林。

老值班員：（完全不感興趣，不耐煩地低頭問男學生）他囉囉咕咕說了一大套，儘講些什麼？要見斯大林，用得著從盤古開天地，社會進化，猿變成人，囉嗦一大堆？

男學生：（不一般見識）不，他既然說了一大套，我們倒要問問他。（向政治秘書）喂，中國佬，你們要見斯大林，有沒有通過外交途徑，事先安排約會的時間地點？

老值班員：（笑嘻嘻地拍拍男學生肩膀）

算啦，小伙子。這些年，斯大林那裏還有這些考究？他都死了三十多年，在紅場上受冷淡，再也不能擺當年的威風啦。在他老家喬治亞的戈里城，倒有人在附近山頂一座舊廟裏替他蓋了個紀念館。可他怎甘寂寞，回鄉隱居？（舉起兩瓶伏特加，注目搖晃）平日沒有多少去處，他只能來這裏喝酒打發時間。（實在忍不住，擰開一瓶，咕嘟咕嘟連灌了幾口）不瞞你說，依我猜想，此刻他準在站長室內。（用手抹嘴，越來越肯定）對，八九不離十，準在裏頭。（向政治秘書打個招呼）喂，中國佬，我這就去把斯大林請來，也替你們把燈光搞亮點，把暖氣搞暖和一些，免得摸黑受凍。

翻譯員：（望著老值班員朝左離開候車室，忍不住回頭對政治秘書耳語）真想不到，斯大林也酗酒啦。

政治秘書：哼，還是我們毛主席偉大，從不貪杯。

警衛員：（對政治秘書好像前嫌盡棄，也湊過來耳語）你說得對。我們毛主席呀，醇酒、美人、美人、醇酒，這兩者之中，寧要美人，不取醇酒。

政治委員：（又翻臉不認人）陳永忠，你又在瞎說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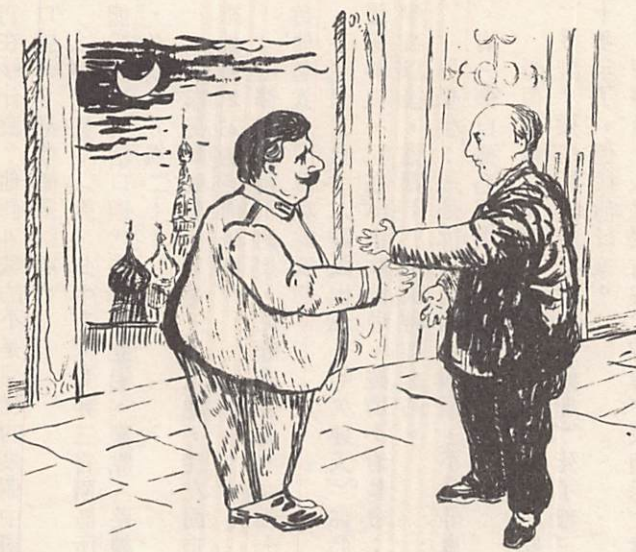
警衛員：（不認輸）說「美人」不行，說「女人」總不錯吧。難道美人、女人兩個名詞，又有排列的問題——呸！

女學生：（見中國人再度爭吵，又怯生生地躲進男生懷裏）聽，他們又吵架了。

男學生：（安慰地）不要緊，他們在爲酒和女人爭辯。這班中國佬，動不動就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大批判」——吃了飯，沒事幹。（停一停，抬頭思量片刻，禁不住抱著搖女學生肩膀）嘿，

你想想，我們多幸運，今晚能參加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會見。這班中國佬固然愛吵愛鬧，他們講的可是純正的中國話。比起我們莫斯科大學那班「中國通」來，誰敢說這些中國佬的中國話不地道？

站上燈光突然通亮。候車室內，氣溫升高。兩個研究生脫除寒氣威脅，互解領口，親著脖子，俱得更緊。



警衛員除衣，比其他的人敏捷。舒筋活血，練了幾個把式。

女護士：（溫存地替毛澤東減裝）主席，快除掉這條圍巾。裏面暖和，出去再加。來，把手套也脫下來收著。

毛澤東：（趁勢舉手招來政治秘書）你的兩瓶伏特加起了很大的作用，立即收到統戰效果。

政治秘書：（謙卑地）都是主席思想戰無不勝的威力，偉大戰略部署的正確。沒想到，蘇聯「走後門」，光天化日，明目張膽……

女護士：（看他受寵，偏找麻煩）這是白天嗎？哪裏是光天化日？恐怕已經是凌晨一兩點鐘了吧。

翻譯員：（突然指著左方）報告主席，那邊來了一個人！（踮起腳尖）嘿，看樣子，活像斯大林……

警衛員：（早已已注意）可不是嗎？他從老遠的站長室出來，我就盯住他了。錯不了——是斯大林的把式。頭髮、服裝、嘴上的鬍鬚，跟相片上一模一樣。就是個子矮一點。

女護士：（帶著欣羨的神情）瞧，手裏還捏著那支煙斗呢——樣子真帥。

毛澤東：（不屑地）你懂什麼？你想學江青，去寫樣板戲？（忽然想起）怎麼？你們都忘啦？快把帶來的錄唱機開起來。

翻譯員、警衛員：（同時）請示主席，放哪一首歌？

政治秘書：傻瓜，這還要主席操心？當然是「全世界人民心一條」。現在要強調中蘇友誼嘛。

一陣手忙腳亂，錄唱機播出五〇年代初中國大陸相當流行的一支歌曲：「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千萬人的呼聲，地動山搖。毛澤東，斯大林——斯大林，毛澤東——像太陽，在天空照。紅旗在前面飄，全世界人民走向路一條。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條。」

斯大林：（步履滯重地來到錄唱機前。聽完歌曲，用手敲一敲唱機。先詢問似地看看衆人，然後嘴角帶笑地轉向毛澤東）這是一首什麼歌？裏面講些什麼？爲什麼既唱斯大林，又

唱毛澤東？

男學生：（飛跑過來，站在斯大林身側）斯大林同志，我來替你當翻譯。

女學生：（步子不比男學生緩慢）我知道這首中國歌，斯大林同志。那時我剛生在北京，後來也會唱。（得意地睇男學生一眼）有一段歌頌：「毛澤東，斯大林——斯大林，毛澤東——像太陽，在天空照！」

斯大林：（嘴角的笑帶上嘲諷，眯著眼抬頭仰望）兩個人都像太陽？——天空居然容得下兩個太陽？（舉起煙斗，揮一揮手）難怪蘇聯中國要鬧分裂。

毛澤東：（走上前來，距離一尺之遠，矜持地伸手）斯大林同志，你好。

斯大林：（不經意地輕輕握一握手）你下地大概有十年之久了吧。那次你來莫斯科看我，也有三十多年了。

毛澤東：（沒聽清楚，轉問翻譯員）他說我「下放」有十年了？

翻譯員：主席怎麼會「下放」？誰敢下放主席？他說的是「下地」——「入土」，其實你老人家也不會「入土」……

毛澤東：一九四九年，我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勝。我來莫斯科，你讓我足足等十幾天，才接見我。但我們到底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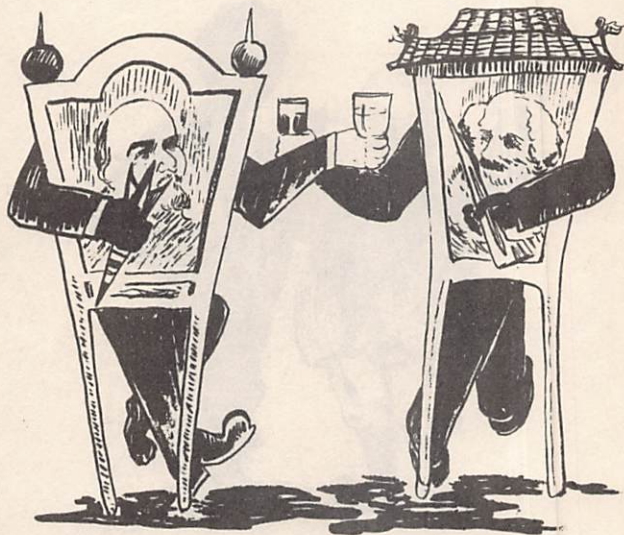
斯大林：（微笑著回憶）那時你口口聲聲「一邊倒」，倒向蘇聯老大哥。現在，中蘇同盟已成廢紙，你又倒向哪一邊啦？

毛澤東：（見斯來意不善，反而更加從容）中國當初倒向的是馬列主義的蘇聯。斯大林同志，你逝世後，蘇聯已經墮向修正主義。（像平時演說一樣，平伸出右手，左手將右手袖筒一節節地往後捲）我這次去拜見馬克思，正

想沿途組織一個國際反修統一戰線。

斯大林：（忍不住笑出聲來）你廢止了中蘇軍事同盟，正在跟美國建立軍事合作，比誰都更是修正主義！

毛澤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你還跟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時進兵瓜分過波蘭呢。（哈哈兩聲，坐回原位）我們為什麼不能跟美國和好，爭取技術援助？



斯大林：（正言厲色）一九三九年，我們是利用一批帝國主義去反對另一批帝國主義。

毛澤東：（以牙還牙）今天我們是在利用資本帝國主義，反對社會帝國主義。

斯大林：（有些吃驚，面帶慍色）什麼社會帝國主義？馬列主義的字典中，根本沒有這個詞彙。這是你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杜撰——男學生：（忍不住插嘴）所謂毛澤東思想

，西方翻譯成 MAOISM，等於是在馬列主義之外，另豎毛澤東主義。

斯大林：（對毛提高聲浪）我們早知道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者。你先反對鐵托，高唱「一邊倒」。現在，你反對蘇聯，污蔑蘇聯是什麼社會帝國主義，比鐵托還要反蘇。

毛澤東：（見斯大林落座，反而不甘示弱地站起）二十年代，你一上台，就把受傷的列寧撤在一邊，端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列，名之曰馬列主義。從此，「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為什麼不許我們提倡？

男學生：（聽不慣毛的長篇大論）這種教條式的談話，今天應當錄下音來，放進歷史博物館去。

政治秘書：（不屑於跟年輕人爭辯，排解式地逕自走向斯大林）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並沒有絲毫放鬆對馬列主義的堅持和學習。斯大林同志，你沒有去過北京——不，你根本沒離開過蘇聯——所以你不知道。我們在天安門城樓上，一直懸掛著馬、恩、列、斯的巨幅畫像，對你們這四位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同樣尊重。在北京，你們四位革命導師平起平坐，我們一視同仁……

女學生：（忍不住插嘴）你說馬、恩、列、斯在北京平起平坐？在北京待過的蘇聯專家，早就注意到你們在馬、恩、列、斯之上，掛著一幅更高、更大的毛澤東畫像。居高臨下，君臨一切。

斯大林：（坐著聽得有味，慍色消除，臉上綻出笑容）毛澤東同志，你生前大吹大擂毛澤東思想，你死之後信徒們還信奉毛澤東思想嗎？

政治秘書：（認為不需毛來回答）堅持毛澤東思想，作為「四項堅持」之一，已經寫入了中國新憲法。

斯大林：（覺得無聊地揮一揮手）中國新憲法？那是什麼玩意兒？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還是我在一九三六年頒佈的呢。（裝好另一袋煙，站起踱步）大家都在說，目前在中國共產黨內，當權派是在推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或者，不如說，是在撇開毛澤東修改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略帶譏嘲）這不稀奇。他們是在學你，斯大林同志。像你當年一樣，推行沒有列寧的列寧主義。

男學生：（轉向毛澤東，口氣像蘇聯新一代的中國通）我們遠東研究所，有一份中共建國後的「歷史決議」，批評你晚年的重大失誤。

女護士：（終於有了出頭露面的機會）那些都是江青和四人幫的過失。要算賬，得算在他們頭上。「江青之壞，是無法形容的。」

毛澤東：（嫌她多嘴，牽到台邊低聲數落）一直叫你別引鄧小平這句話，你總不聽。鄧小平接見一個義大利女記者時，就罵「江青之壞，是無法形容的」。他還貶斥周恩來，不以周恩來為然……

女護士：（不服氣）江青就不能罵？（形同撒嬌）哼，我偏要點她的名！你知道，老幹部當中，有多少人恨死她！

毛澤東：（息事寧人）唉，其實我何曾虧待她。文革之初，我扶林彪，放江青出籠，無非爲了奪權。兩人都不爭氣。

警衛員：（早已隨侍，來到台邊）林彪搞陰謀，鬼膽謀刺主席，活該摔死在蒙古沙洲。斯大林：（聽到林彪的名字，踱到毛面前

）你會指定林彪作爲你的繼承人，對不對？

翻譯員：斯大林同志，在中國我們已不用「繼承人」這個名詞。我們管它叫做「接班人」。還有第二梯隊、第三梯隊——

斯大林：（不耐煩地又揮一揮手）好，就用接班人這樣的字眼吧。（轉向毛）你不但指定林彪作爲接班人，還把這個決定寫進了你們九大的黨章。在世界革命史上，再沒有一件事



比這更加荒唐。（透出同情）但是，你看，接班的既非林彪，也非四人幫，更非華國鋒。原來的接班人劉少奇被整死了。原來偏不要他接班的鄧小平，反而成了接班人。據說，鄧小平一面否定你，一面還在堅持和發展你的思想呢。

男學生：（又顯出中國通面孔）我們研究所，最近來了一本新書，說鄧小平在政治、經

濟、文化、軍事和哲學各方面，都在發展你的思想。

毛澤東：（略有感觸，獨自踱向舞台中央）鄧小平怎麼會堅持我的思想？由他發展我的思想，不正是修正主義？當年我們批判「海瑞罷官」那齣戲，我倒是真的罷了鄧小平幾次官。

女學生：（同情地）嘿，毛澤東同志，你讀過西方的報導嗎？有人說，今天中國實際上是在建設資本主義。

毛澤東：（領情地笑笑，拍一拍女學生肩膀）「大參考」、「小參考」，我還看得多少？多少外國東西，一出來，就翻譯給我？我們的出版，有內部外部發行之別。印刷有大字本特供高幹，小字本供給平民……（漸漸越談越遠）

女學生：中國現在雖然有「四項堅持」，會不會成資本主義？

毛澤東：（振振有詞）按照蘇聯經驗，這也不是沒有可能。正因如此，我才強調反修，永遠不能忘記階級鬥爭。每隔三五年，必須進行一次或大或小、類似文化革命的革命。

斯大林：哈，提起文化大革命，這正是你反馬列主義之處。（像抓住了毛的錯處，但並無多大惡意）你的不斷革命論，跟托洛斯基的大同小異。

毛澤東：（憤懣地）你居然敢罵我是托派？這頂舊帽子，我們幾十年前給陳獨秀戴過。只能由我們給別人戴帽，焉有你來給我們扣帽子的道理？（激動地在舞台左面兜圈子）

斯大林：（毫不讓步地在台右繞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還鬧革命，豈不正是反革命？

毛澤東：（停步瞪眼）這要看，是誰專誰的政？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搞

右傾機會主義。當時我曾聲言，如果彭德懷還當國防部長，我就上山打游擊。如曹操所說，這叫做：「寧可我負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負我」？（鬆一口氣，回到女護士和警衛員周圍落座）

斯大林：（不完全明白，找翻譯員和男女研究生瞭解一番，笑著點一點頭）原來如此。你又在那裏搬弄中國歷史，玩弄字眼。難怪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造反，強調奪權，教唆紅衛兵打、砸、搶，還要利用軍隊，進行什麼「三支兩軍」——

毛澤東：（打斷對方指責）難道你沒引用過列寧的話，「革命的 centre 問題是政權問題」？難道你在實踐上，不曾依照「槍桿子裏出政權」辦事？你這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斯大林：瞧，你又來啦。如你們俗語所說，你這是在「舞文弄墨」。（抿嘴沉思）第三國際早有你的材料，說你從年輕時起就愛吟詩作文，曾學騷人墨客把毛澤東三字拆散，署名「二十八劃生」。在詩裏，你特別貶低過去的中國皇帝。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你的話下。你還胡吹什麼「欲與天公試比高」——

毛澤東：（不容對方再翻舊賬）難道你心中就有一刻忘記過彼得大帝，還有你們俄國短幾百年歷史中的那些沙皇？

斯大林：（不受打岔）唯其因為你一心想當中國文人，去壓倒別的中國文人，在當權之前沒有受別的文人尊敬，所以你特別嫉恨中國知識份子。第三國際早知道你是一個紅皮蘿蔔，外紅裏白。你從來就不知道做一個嚴肅實幹的布爾什維克——

毛澤東：（暴跳地站起）誰希罕做你的什

麼布爾什維克？當年第三國際培養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給我們送回中國來，一個個早給我們用整風等等運動整掉了。

斯大林：（笑笑）我們早知道你怎樣分化、排擠和打擊從蘇聯回去的中國革命家。陳紹禹——王明，當然不用說。一九三五年，你利用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把中共黨的總書記秦邦憲拉下來，從此掌握大權，同時還趕



走了共產國際給你們派去的軍事顧問李德……

毛澤東：（笑出聲）多謝你給我們派來的草包李德。不趕走他，我們的長征早就失敗了。（在一張候車椅上坐下）

斯大林：（繼續自己的話）可是，張聞天和王稼祥跟了你一十五年，在廬山會議上依然挨整，到文化大革命都給清洗掉了……

毛澤東：（警覺地向政治秘書招手，附耳

吩咐）你聽，蘇聯一直在整我們的材料。「來而不往非禮也」，快找康生，搞一套蘇聯的黑材料回贈他們。（回頭反駁斯大林）我們中國黨，從來不主張亂殺。我們一向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不像你，趕走了托洛斯基，還要派人去刺殺他。三十年代，你清洗了多少人？連你的第二個妻子也嫌你殘酷，偷偷自殺了。

斯大林：（針鋒相對）你的「和風細雨」式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下子把人殺掉，而是慢慢把人折磨死整死中國經過那場和風細雨，倒退了好幾十年。一九四九年以後，蘇聯給你們的偉大無私的國際主義的援助，全白費了。

毛澤東：（胸中升起無名烈火）你居然吹噓蘇聯「偉大、無私的國際主義的援助」，這才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你趁火打劫，進兵我們東北，搶走多少廠房機器，搬走多少物資設備？一九四九年，我們解放戰爭就要取得全勝，你不要我們過江。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本來說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可是我們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拚命，你們却在莫斯科大發戰爭財。放的一槍一砲，後來都得鈔票必究，連本帶利地歸還。

警衛員：（在一旁壓不住激憤）主席說得對。為了償還那些驢打滾的債，我們勒緊褲帶，把上好肉類食品，裝進罐頭，打成箱包，運往蘇聯。（漸漸越說越傷心）自己吃不飽，穿不暖。天災一來，一個村子剩下幾家？無爹無娘（好漢掉淚）……

斯大林：（用手指毛）誰不知道，都是你的所謂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還有什麼「超英趕美」造成的全國大飢饉？

毛澤東：（不服）我們在嚴重壓迫下償還蘇聯的債務，又碰上特大的自然災害。餓死幾百萬人，等於繳付學費，學習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只有右傾機會主義者，才說我們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以攻為守，口氣咄咄逼人）難道蘇聯革命初期，沒有餓死過人？難道你們農業集體化時期，不是一度飢殍遍野？難道——

斯大林：（揮手打斷毛的談話）你根本不懂經濟，又缺少行政經驗，全憑興之所至。你的「彭大將軍」批評你「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你恨不得把他折磨至死。其實，你真有點像你們中國古書中描寫的項羽。（找來男學生，比劃討論一番）對，那個項羽是怎麼一個人？「學……學書不成學劍……學劍不成學……」因此，你在經濟大躍退之後，又出來大搞馬列主義理論……

毛澤東：（見斯大林苦背中國故事，不由驕傲地失笑）算了吧，你要讀中國書，我那裏多的是。「二十四史」、「三國」、「水滸」，再加一部「資治通鑑」——不讓你讀得「天花亂墜」、「醍醐灌頂」、「七竅生煙」才怪！（政治秘書、翻譯員陪著大笑）

斯大林：（不為所動）我很清楚。一九五三年我一去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一個真空。你立即發現有機可乘，想要登上世界馬列主義的理論舞台，奪取世界無產階級導師的席位。

毛澤東：歷史給我們中共黨員的教訓是戒驕戒躁，尤其要吸取你的經驗，防止大國沙文主義——

斯大林：（咯咯笑了兩聲）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上

，你居然批評我缺乏辯證思想，公然說「關於辯證法，需要作廣泛宣傳」，還建議「要在各國黨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談這個問題，要在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上談這個問題。」哈哈，你這個以讀線裝書為榮的中國文人，竟自充馬列主義大師，想要教導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人怎樣讀書了。

毛澤東：（不為所動，一臉正經）要反對



修正主義，就必須「加強和改造我們的學習」。

斯大林：（不答理，繼續講）不但如此，在一九五七年那次國際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上，你還大談物理。你告訴大會代表：「原子核子、質子、中子裏頭都充滿矛盾的統一。」你還說什麼：「一分爲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笑破肚子，用手帕擦眼

）啊，我的可愛的毛澤東同志，你幾時學過物理？中國在一九五七年有原子彈？

毛澤東：中國在一九五七年還沒有原子彈，所以受蘇聯的詭詐。可是，我們在一九六四年不僅有了原子彈，還有了氫彈。像陳毅所說，我們不要褲子，也要核子。

老值班員在斯大林、毛澤東討論原子時，醉醺醺地從台左回到人叢之中，四處亂轉，探索食品。忽然，若有所悟地走到大玻璃牆前站了一會，踮起脚尖仰望天幕。

老值班員：（跑到舞台中央，拍手要大家注意）哎呀，你們這個科學討論會要開到幾時呀？夜都快過盡了。（轉向毛）喂，毛澤東同志，你們不是要去見馬克思嗎？天一亮，就走不成啦。

斯大林：（微微吃驚地問毛）怎麼，你還要去見馬克思？

毛澤東：（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要連夜兼程，前往倫敦高門公墓，去拜望他老人家。

老值班員：（又拍幾下手）喂，同志們，今夜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會見，總不能不乾幾杯吧。（不由分說，翻包倒筐，取出酒杯酒瓶，分遞眾人）

政治秘書：（靈機又動，拉著翻譯員）主席這次跟斯大林見面，應當稱爲另一次「偉大的會見」。

女護士：（擠上來）說得對。這樣的一偉大的會見，應該載入史冊。我看過一幅「偉大的會見」的名畫。我要用攝影藝術來表達它。（急忙握住警衛員）小陳，快，快取出我的相機和鏡頭。快找那兩個蘇聯學生幫幫忙，把三角架支起來。

斯大林：（一直在若有所思，第一次伸手牽毛走向台邊）毛澤東同志，你真的要去見馬

克思？

毛澤東：（不解問題所在）哦，斯大林同志，你沒唸過「紅樓夢」，難怪不理解。馬克思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有如「紅樓夢」中的賈母，是大家的老祖宗，都得尊重他。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不說死亡，免談上帝。壽終正寢，都說自己是去見馬克思。

斯大林：（聽得出神，嘴角又綻出微笑）你想去看馬克思，他肯見你？

毛澤東：爲什麼不肯？

斯大林：連列寧都被馬克思視爲旁門左道，何況是你！

毛澤東：（半信半疑）難道你也沒去見過馬克思？

斯大林：（搖一搖頭）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社會發展學說，都是以西方爲基礎。「亞細亞生產方式」，一向被列爲特殊範疇。

毛澤東：特殊範疇既非正統，豈不遭受歧視？

斯大林：怎麼不是？一九五七年，你來莫斯科大談「東風壓倒西風」，馬克思要不認爲你是旁門左道才怪？！

毛澤東：這裏面頗有點民族主義的味道。斯大林：豈止民族主義？還有種族主義。

毛澤東：無怪乎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去巴黎看戴高樂，在塞納河上衝動地抱著戴高樂討好說：「原來我們都屬於西方。」

斯大林：這些年，我跟赫魯曉夫一樣，都在蘇聯退休了。

毛澤東：我們中國，現在只談「離休」，選得爭房子、汽車、津貼、待遇和子女安排：

斯大林：退休後，我回喬治亞倒還受人尊敬。

毛澤東：離休後，我還回不得湖南。你知道，彭德懷等我算賬。劉少奇，跟我只一山之隔。湖南騾子，脾氣暴躁。當初有華國鋒在韶山當地委書記，他辦事，我放心。現在，他早失勢了。所以，我只好周遊列國，到處旅行。你倒好，沒有女人一身輕。我還有個江青，在秦城監獄，住得一點也不安身。

斯大林：我的女兒，跑印度，到美國要求政治避難。好不容易回到蘇聯，恢復國籍。可是，最近住不慣，又帶著她的女兒跑到英、美去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性，無法解釋這些。

毛澤東：民族主義，也非階級性所能解釋。起先我罵你「大國沙文主義」，其實我也不是「小國沙文主義」。

斯大林：你還有兩點相同。「個人崇拜」與「個人迷信」，本來相差無幾。陰謀陽謀，也是一個銅錢的兩面。

舞台上，相機已經套上三角架。酒杯已經斟滿。衆人陸續前來邀請斯大林和毛澤東回到中央。

毛澤東：（遠遠瞥見女護士拿著相機，向前輕聲埋怨）你這又是幹什麼？——又想學江青？我可有言在先：當年江青在廬山照仙人洞，要我題詩。這次我可不願浪費筆墨。

政治秘書：（像置身外交宴會）同志們，朋友們，今晚毛澤東同志和斯大林同志——

男學生：（插嘴）應該說，今晚斯大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

政治秘書：（繼續唸唸有詞）——在這裏相會。這是另一次「偉大的會見」——

男學生：「偉大的會見」？（環視候車室）不，應該說「不再偉大的會見」。

政治秘書：（堅持）應當說是另一次「偉大的會見」。

男學生：（堅持）應當說是「不再偉大的會見」。

老值班員：（端著酒杯，一直在大玻璃牆前注視天幕，驚惶地跑向中央）哎呀，你們還在爭論「偉大」「不偉大」呀。天快亮啦。誰不乾杯，活該口渴。

天幕上露出一絲曙光。

毛澤東：（問斯）怎麼樣？這不是一次偉大的會見嗎？

斯大林：有什麼辦法？你已聽見，有人在說這是一次「不再偉大的會見」啦。

老值班員：（看見天色漸明，嚇得手中酒杯落地，大聲驚呼）清場！所有的人，不許留下一個！

整個舞台，一片漆黑。吊鐘清晰地響了五下。燈光慢慢復明，人去台空，所有什物俱已不見。大玻璃牆外的天幕，呈現出淡淡的魚肚色。只有男女兩個研究生，各自捲臥在一張候車的長條椅上。

遠遠有了地鐵行駛的聲音。

男學生：（慢慢醒來，用手搓眼）這是怎麼回事？（撐起半個身子觀望）剛才這裏明明站著許多人——原來是在作夢呀？

女學生：（睡眼矇矓，一下醒不來）啊，剛才這兒好熱鬧。我好像一直在作夢。

男學生：（開始收拾書本）真的嗎？我彷彿看見斯大林和毛澤東……

女學生：我不但看見他們，還聽見你說這是一次「不再偉大的會見」呢。

男學生：嘿，車來了。

女學生：（躍起拉著男生的手）快走吧。別再趕掉車啦。

兩個大學生牽著手，從台左跑出車站。幕落。

支援民運活動

請協助往國內郵寄、攜帶中國之春簡訊

中國之春簡訊每月一期，選登中國之春月刊重要文章及民運信息，體積小，容易攜帶，可隨信件郵寄。您若願為民主運動盡一份力量，請協助往中國大陸內郵寄或攜帶中國之春簡訊。經驗表明，過去往國內寄的大量簡訊，大都可以收到。

- ▲請來函說明您每月能寄的份數；
 - ▲我們向您提供國內的郵寄地址。
- 中國大陸人民渴望民運的信息和理論。
您的貢獻將記錄在中國民運史冊上！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本刊徵稿 稿酬從優

中國正處于大變革之中，十五年内，必有巨變。新一代的留學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國未來的命運。請大家拿起筆，加入到探討和變革中國命運的運動中來。

本刊近期擬組如下專題，請大家圍繞這些專題寫稿：

- ▲評論文革、毛澤東及「五·一六」問題；
 - ▲後鄧小平時代中國演變方向及模式的研討；
 -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採取和可能採取的步驟；
 - ▲民主內涵的探討；民主有階級性嗎？有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分嗎？
 - ▲中國留學生和新移民在海外的新成就。
- 另外，人文學科研究生的論文，習作，本刊也有興趣刊登。
- 凡探討中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報導中國現狀內幕及留學生生活的稿件，本刊均表歡迎。

新同學，您尋求精神的伴侶嗎？

歡迎您免費訂閱中國之春

一批新的中國留學生又來到了海外，我們歡迎你們！

在國內時，您大概已經聽說過《中國之春》。您一定好奇；《中國之春》到底講了些什麼？

來到海外，您才能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愛國。夜深人靜之時，您難免產生憂國思鄉的心情。這時，《中國之春》就成了您最好的精神伴侶，她告訴您家鄉最近發生了什麼，明天可能發生什麼，其他留學生是怎樣想的，她與您共同探討中國的出路，她也會給您送來各地留學生的信息。

承蒙愛國華僑的捐助，我們尚有一些贈閱名額，請各位新同學盡快寫信給我們，申請免費訂閱《中國之春》。

中國之春編輯部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 79047 號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0)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442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T. P. Lee #3437 34-37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